



无畏的战士 伟大的旗手

江青在她的时代（下）



中流社编写组

江青在她的时代

（根据《江青同志》《红都女皇》改写）

中流社编写组

“哪怕是在睡梦中，我都常常梦见中国大地插满了我们自己的红旗。并且坚信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遍地都会插上共产主义的红旗！”

——江青

我从未跟外国人谈及过我的过去。你是第一个。

——江青

下部

目录

第九章 暗流涌动.....	3
第十章 冰雪红墙.....	85
第十一章 红楼新梦.....	134
第十二章 基础奠定.....	170
第十三章 水中学泳.....	226
第十四章 逆流勇进.....	310
第十五章 折戟沉沙.....	351
第十六章 戏剧革命.....	368
第十七章、豪情壮志.....	436
第十八章、任重道远.....	490
第十九章、谁人评说.....	512

第九章 暗流涌动

1

1949年，是中国革命苦尽甘来的一个神奇的转折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中华民族苦难的过去，迎来了美好的未来。

通过江青同志的讲解，我能理解这一天对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她从乡下搬到了首都；从借来的窑洞搬进了皇城。

从她与毛泽东住进红墙绿瓦的紫禁城那一刻起，这座富丽堂皇如同迷宫般的建筑物连同它的主人——中国的皇帝及他那成千上万的奴仆便走进了历史，一起成了古迹。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江青从台前走向了幕后。

一开始很少有人注意，整个五十年代没有任何文章或媒体关注过她。

她就像空气一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然而，事实上她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政治舞台，离开过她所热爱的事业。

她只是暂时地离开了中国领导人的身边，来到了群众之中。

她离开了皇宫，来到了乡村。

3

她领导了有争议的“武训”调查；参与了土地改革和婚姻制度改革这两大早期的革命运动。

武训（1838—1896），清末行乞办学的典型。

堂邑（今聊城西）人，原名武七，亦称武豆沫，清廷为嘉奖其兴办封建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

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

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

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

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

光绪十四年（1888）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

山东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

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

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并曾一度将原堂邑县改称武训县。

1945年，冀南行署在柳林创办武训师范。

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冠县柳林人武训靠着乞讨敛钱，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有人称颂他是“千古奇丐”（冯玉祥语）。

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虽有人质疑武训受赏黄马褂一事的真伪，但武训为朝廷隆重嘉奖、为时人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

清王朝当时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这使得武训和他的事迹倍受当世瞩目。

根据《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

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除了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外，梁启超先生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兴学节略》，以资表扬。

梁文中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毕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

文中最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

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他的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瞩目。

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

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

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

两次纪念活动前后呼应。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

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

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

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

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

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

“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

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

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

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 1951 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

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

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

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

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

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

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

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

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

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

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

有一本书，名为《武训先生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

《武训先生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 1938 年绘制而成。

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 1943 至 1945 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

1944 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

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国共相争时期，孙瑜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

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

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

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

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

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

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

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

“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

“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电影开始的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1949年）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这个小学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底下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解武训老人的故事。

遵照领导的指示，影片必须“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做了一番总结陈词：

“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调定了以后，影片里的各种艺术形象也做了改动。

武训在清末的社会里原本是一个苦大而仇不深的贫苦乞丐，在《武训传》电影里，武训完全变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

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戏份，另外还特意增加了武训被地主阶级的帮凶“狗腿子们”毒打的情节。

后来在中南海给领导放映的时候，周恩来特地要求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尽量符合武训当年实际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荧幕形象周大，这个周大和《洪湖赤卫队》里那个头脑简单、只会蛮干的游击队长刘闯有些相象。

周大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

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条农民起义道路。

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周大对武七说：

“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

周大告诉武训，

“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

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农民起义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败亡的结局，武训说“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

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周大被武训说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

这段对话和情节很自然的成为后来《武训传》受批判时非常重要的罪状之一，这里且按下不表。

电影里还有一段重要对话。

参加农民起义后的周大对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同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会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则是排满。

可见不同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解读者的时候，会被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涵义。

同样，武训和周大的这个对话在后来被认为是发轫于社会底层的改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一次交锋，影片“错误的鼓励了兴办义学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意义竟然远远高于受压迫民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

3

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

根据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

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

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

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历史飓风起于青萍之末。

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

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啻是一个旱地惊雷。

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

《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

《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

《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

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

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旧貌换新颜”。

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

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

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说：

“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

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

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

“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

他还说：

“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

“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

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

“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

《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

“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

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

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

江青虽是武训调查组的领导人之一，可她哪里知道那些调查对象全都是被县委领导打过招呼的人呢？

但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更不是靠“乞讨”可以成功的！

调查组的工作结束后，江青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土地改革和新中国婚姻制度改革运动之中。

土改，前文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婚姻，是人们唠叨了数千年而乐此不疲的话题。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也随之被彻底废除。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婚姻法》，废除了以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特征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确立了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4

当毛泽东、江青及另一些领导同志和他们的军队与1949年3月进了北京城之后，很快便占据了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心点——紫禁城。与中国历代皇帝有所不同的是，共产党将整个皇城分成了若干段，他们占用的只是中部和南部的一个湖泊，并取名为“中南海”。

江青回忆道，根据她当时的身体状况，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坚持到1949年3月革命胜利的最后阶段的。

鉴于她的身体状况，一些领导同志（当然不是毛泽东）建议送她去莫斯科“疗养”。

“为什么……？”

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如果她真得病得很厉害，干嘛要跑上几千公里到外国的首都去看病呢？

她回答说：

“连年不断的战争，摧毁了国内大多数的医院。不仅缺医少药，而且医疗设施相当落后，管理一片混乱。”

据说，为此事曾咨询过斯大林的意见。

几天之后，几名护士和卫士陪同江青登上了北上的国际列车。此行的目的地——苏联，莫斯科。

这也是江青唯一的一次到过的外国的国家。

一辆救护车准时等候在莫斯科车站。

她被送去了指定的医院（由中国方面付费）。一个由苏联医生和医学教授组成的医疗小组，为她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检。

检查结果表明，疾病的根源是由于长期发热导致的身体机能衰弱所致。

江青的身体已十分消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连皮带骨总共不足 42 公斤（约九十二磅）。 ”

江青不懂俄语，但从医生和教授们交谈时的面部表情及语气中，她完全能感受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

波尔首依教授是她的主治医师。他的名字听起来与“莫斯科大剧院”很相似，俄国人的名字很难记，所以江青干脆就叫他：“‘大剧院’先生”。他是江青在苏联治病期间唯一的一个可算得上是朋友的医生。

江青发烧的病因是扁桃体炎。

感染首先从右侧开始，并迅速扩散到了左边。

当医生宣布将首先为她进行扁桃腺切除手术时，江青从病床上“爬”起来，勇敢地走进了手术室。

护士后来跟她说：

“看起来，你就像是一个英勇的将军！”

这话，江青爱听。

手术比预计的要困难得多，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首先，医生切掉了右边的扁桃体，紧跟着左边的也切除了。

接下来摆在苏联医生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快速”地增加她的体重？

医生们决定安排她去数千公里之外的雅尔塔（黑海南部的一个度假城市）疗养。

那儿气候温和，设备齐全（奢侈）。是昔日沙皇首选的度假地，也是今天苏联权贵们的最爱。

4月，她带着两名苏联保镖和一名俄罗斯厨师重返莫斯科。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苏联人送给了她一份特殊的“礼物”——半导体收音机。

从收音机里，她了解到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一艘英国军舰袭击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这消息让她不安了好几个晚上。

而当她听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突然大声地哭了起来。

她的情绪失控，引起了一阵子不小的骚动。

从雅尔塔回来后，斯大林第一次邀请了她。

当她和她的同伴们到达克里姆林宫时，斯大林的助手闹出了误会，将他们一行人误认为是随毛泽东来莫斯科谈判的代表团成员。

直到 1949 年秋天回到北京时，她才将这个“笑话”讲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是 12 月 16 日抵达莫斯科的，1950 年 3 月 4 日返回北京。

1949 年 10 月，江青被特许为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该协会的主席是刘少奇。

她说，当共产党 1949 年春天进北京城的时候，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地方被解放，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土改。

由于土改运动中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刘少奇主张“依靠富农”的路线受到了党内的批判。

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江青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她想要到农村去，到土改运动的第一线去锻炼。

当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毛泽东时，一开始毛并不同意。

他俩为此争吵了起来。

最后，毛还是同意她去了。

1949年秋，当她准备下乡的时候，其他一些女同志也想跟随她一起离开首都去乡下锻炼。

这些女同志都是中共领导人的妻子。

对江青而言，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而且她也并不是一个新手。她跟随毛泽东这么多年，各种运动经历多了，无论是言传身教也好潜移默化也罢，她好歹也算是“吃透”了毛有关土改的精神。

她选择的地方是中国东部。

她坐火车去了上海市——离别这座她熟知的城市已经整整12个年头了。

她非常兴奋。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高兴。尤为欣慰的是当她看到旧中国的大上海刚刚回到人民的手中，如此短时间内就有如此大的改变，她更进一步地深切领会到了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真正动力！”

火车驶入车站时，在站台上迎候的人群中她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康生和饶漱石。

他俩分别掌控着中共东北和华东管理局，主管东部地区的一切事务。

显然，他们已事先得到江青要来上海的消息，早早便到了车站迎候，以尽地主之谊。

康生前文已有交待，想必读者并不陌生。

饶漱石(1903-1975) ，曾用名梁朴、赵建生，1903年9月出生
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
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中央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她十分友好地将手伸向了前来上海车站迎接并等待已久的饶漱石
同志。

她向他袒露了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

“我想到农村去，直接与农民接触，调查土地改革的相关真实情
况。”

饶漱石委婉地加以阻扰：

“现在上海特务闹得很厉害，我是担心您的人身安全……”

饶漱石果然说到做到，无论江青走到哪儿，都脱离不了他的眼线。

一天，江青决定到市区看看。

没等她下车，就看到饶漱石已在一家百货商场的门口等候她了。

她想一个人逛逛街的“自由”都没有。

此后，无论江青走到哪儿，身旁总跟着一个人。要么是部门主管、
要么是公安同志、要么是饶的秘书，要么便是饶漱石本人。

外围还有一些拿枪的同志在“保护”着她。

江青并不领情。她不需要这样的保护，反面觉得自己像是遭人“绑
架”了似的。

在如此严密的保护措施下，江青她哪里有机会下基层调查？如何
完成毛泽东交待的：“我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的任务呢？

由此可见，饶漱石及其同党解放以来的确是将华东局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饶漱石给江青安排住的饭店是“胜利大厦”。

房间也是事先给安排好了的。

刚开始给她预定的房间是朝南，有中央供暖系统。最后她住的是北边最里面的一间，而且没有暖气。

那年（1950）冬天，她说，上海特冷。本来她身体就不好，瘦弱多病。

“为了保暖，我将带来的所有衣服都堆在自己身上，裹在被窝里。”
结果还是没能扛住。

她病了。

头痛，而且发烧。

当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喝水，大量地喝水来退烧。

“快去看医生！”

得知江青病了的消息后，饶漱石劝说江青上医院。

可饶漱石关心的并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如何封锁她与外界人士接触。

当然，他不是明目张胆故意这样做的。

江青如果感到不舒服，她完全可以选择离开。

江青忿忿地说：

“他（饶漱石）的行为就像一个伪君子！”

江青没有临阵脱逃。

她坚持了下来。

最后，饶漱石不得不让步，重新给她换了一间带暖气的房间。

仅此而已，华东局再也给不到她任何帮助。情急之下，江青决定去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上海市以及她的家乡山东省都是在陈毅的手中解放的）。

见面江青就老实不客气地倒了一肚子的“苦水”。完事陈毅给她支了一招，让她改变一下策略，先不忙着下乡。并鼓励她到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圈子里走走，那是她从前的阵地，一定可以打好“翻身仗”。

陈毅太忙，没时间陪她。

于是特意安排了副市长潘汉年专程陪同她去剧院、电影院或参加其他什么的文化活动。

日子过得很充实，江青的心情也变得开始舒畅了起来。

实话实说，潘汉年是个不错的“向导”。陪同期间十分尽职尽责。

江青并不知道传言说早在1930年他就是王明的“亲信”，现在是饶漱石的“同党”，后来又发现他是一个“叛徒”，1955年被开除出党并收监入狱。

饶漱石虽然“反党”，但他对毛泽东还是非常敬重的。在上海期间他并不是刻意要为难江青，相反他是不知道要如何来“招待”她。

有一天，他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华东党委的扩大会议，并提前向她说明了会议的主题。

考虑到所有与会者都是“男同志”，为免她感到尴尬，饶漱石让自己的妻子也列席了会议，并安排她坐在了江青的对面。

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江青冰冷的心底温暖了许多。

另一件小事是，当江青要离开上海时，饶漱石亲自开车送她“礼送出境”。

也正是因为这件小事，江青再也没有在人前人后说过饶漱石半句“坏话”。尤其是她从未在主席面前吹过“枕头风”，落井下石。

她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往西七十公里去了无锡。

无锡市江苏省的一个主要工业城市。

在这儿她参加一个县委会议时，第一次遇到了华东地区著名的“右翼人士”。（一种特殊的术语，有别于“右派分子”。）

在无锡，江青主要是想通过了解历史背景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她了解到，早在 1850 年至 1864 年间由于娼盗肆虐，民不聊生。县政府规定：农民可以永久性地租赁土地。但僧多粥少每户佃农能“租”到手的土地不足一亩。农民们必须精耕细作，大量施肥。（主要是有机肥——“粪便”，狗粪也是最好的肥料。）

由于农业规模小，不足以养家糊口。农民们被迫开发各种副业以补家用。

当地的大多数农民都种植茶树和桑树，故该地区的茶叶和丝绸昌极一时。

调查发现，无锡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茶叶和丝绸产业在日本侵华期间都遭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

抗战结束，即便是到了解放后的 1950 年，无论是茶农或是桑农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他们对食物的需求是如此的大。一个农民至少每年要补助二百公斤的大米和五十公斤的蚕茧。

1937 年至 1945 年，日寇占领江苏期间，为了修筑一个通信系统，大肆砍伐原生态桑林，导致无锡地区的丝绸工业陷入瘫痪。

江青说：

“即使现在（1950 年），无锡地区作为中国丝绸行业的一个整体，仍未完全恢复。”

另一方面，茶业却基本上得到了完全的恢复。

江青接着说：

“桑树的生长期是五年，而茶树需要十年或二十年，甚至更长。因此付出的劳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江青从无锡回到上海后，几乎没有休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北京。

事实上，刘少奇主张的“富农路线”在土改运动中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毛泽东虽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与其展开了斗争，但如何解决争端，并不是一蹴而就便能解决的问题。

江青继续说，她在土改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对外公开过。她很烦恼。多少年来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已经将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公众形象给扭曲了。

当她在无锡地区搞土改的时候，用的是化名。可是自从她的照片被人偷拍了之后，她的身份便招致了许多人的怀疑。

不过，这些被偷拍的照片后来却成了难得的真实史料。实实在在地证明了她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先驱者。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说着，江青打开了二个已经脱色了的牛皮纸袋，取出了里面封存已久的照片。

一张是她在脱粒，另一张拍的是她在挥鞭犁田。

这些照片在中国国内从未被允许公开发表过，不过，我可以拿去国外发表。

我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歡这些照片呢？

或许是千百年来耕田犁地都是男人们干的活儿，江青一弱小女子根本不是下地干活的主儿，明摆着“作秀”而已。

即便是文革期间，在江青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这些照片仍未被解禁。

江青不这么认为，她打着官腔：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斗争中，妇女同志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是五四运动（1919年）和一二九运动（1935年），在整个抗日战争（1931~1945年）和解放战争（1946~1949年）中，妇女们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有的女同志直接参加了战斗，在前线象男同志一样英勇杀敌；有的女同志在后方担负起了大部分的乡村基层工作和支前工作。”

江青挥了挥手：

“可以说，解放战争是我们女同志用肩膀扛过来的！”

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

江青端起茶杯，喝了口水：

“变化是巨大的。1951年当我去另一个地区进行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时，那里的男人不是在赌博就是成天泡在茶馆里打发时间，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妇女同志去做。如果家里的女人敢出来叫他们回家，等待她们的是‘用拳头说话’，非打即骂。但有一点，很奇怪。那里的女同志可以干任何农活，只是不许犁田。该地区在国民党时期曾是一个“先进县”。我就不信这个邪，到了那儿挽起裤腿就下了田。我从未犁过田，而且从小就怕牛。但我是一名文艺战士，我会照相。现在那里的女同志也可以下地犁田了。”

话说得有点儿长，但大概意思我还是记住了。

“不要只看今天的进步。尽管妇女同志在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有的女同志在更为重要的国防工业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仍有落后的方面。决不可掉以轻心！”

我想，此刻在江青的眼里，我一定不是记者。更不是一名外国记者。

5

一提到国际形势，江青立刻来了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最大的威胁是“外国侵略”。说白了就是美国佬已经侵略了朝鲜，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鸭绿江边。

江青搬出了好几本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好些数据和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朝鲜战争原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韩之间的民族内战，后美、苏、中国等分别支持朝韩双方的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得到苏联默许不宣而战入侵韩国，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

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

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朝鲜战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

中国大陆称之为“朝鲜战争”，对其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部分称为“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称其为“朝鲜祖国解放战争”。

韩国称其为“韩国战争”或“六二五事变”。

美国称其为韩战（KoreanWar）或韩国冲突（KoreanConflict）。此外，由于此次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之间发生而不被重视，在美国亦将其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ForgottenWar）。

香港、台湾等地经常称之为“韩战”。日本称之为“朝鲜战争”或“朝鲜动乱”。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就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而且是连败两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难道真的如林彪所说，美国有原子弹，中国有“精神原子弹”？

原子弹是美国人手中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威慑武器。

早在 1950 年 7 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提出，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在朝鲜参战，美国应该使用原子弹，并认为这可以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

11 月 20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应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内陆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他们认为倘若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干预，那么使用原子弹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美国有关部门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

最后，停战谈判阶段，面对美国的核压力，中国领导人表示蔑视和怀疑，美国根本不会真正使用核武器，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对中国大陆。

首先，敌人若使用原子弹，会引起全世界人民公愤和反对，会受到全世界的人民的谴责。

其次，由于志愿军处于宽正面作战，当时敌人的原子弹不多，可能不敢运用。

再说，原子弹已经不是美国独家所有，美国的人口、工业密度集中，真打起来，苏联原子弹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

原子弹就是一个吓唬人的东西。

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

我问江青：

“中国人真的不怕美国人扔原子弹吗？”

“怕！”

江青十分肯定地回答：

“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怕，就可以高举双手，任由他人宰割吗？再说，主席判定美国佬不会，也不敢在朝鲜扔原子弹。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战。”

“您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有可能发生吗？”

“主席说了，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险就一天不会消除。”

“何时？何地？”

“主席说了，战争的导火索在中东，点火人是日本。什么时候爆发？那就要看中国人争不争气了。总之，中国越强大，发展的速度越快，战争的机率就越小。”

“您真的以为将来中国能超越日本和美国吗？”

“怎么？你不信？！”

江青反问道。

接着：

“你真的以为十几亿中国人只会躲在家里‘搓麻将’或做‘白日梦’，就没有人在干正经事吗？”

江青的话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名言：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

中国人就是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做梦，而且是做美梦。难道不是吗？

这时，我也用上了反问疑问句。

不过，话可没敢说出口。

我突然注意到江青在我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一些数据和毛主席发表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同时，我还注意到这些数据与官方的说法有一些差别。

比如，正式公布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日子是10月25日，而江青本子上写的是10月19日。足足提前了一个星期。

有关志愿军的伤亡数字也比官方公布的大得多。

还有一组数据，我怎么看都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江青道。

“志愿军回国时，有一部分人‘自愿’留在了朝鲜。”

江青答道。

“……? ! ”

我脸上的表情，惊叹号明显大于疑问号。

“三年打下来，朝鲜的男人差不多都打光了。金日成提出来，想让志愿军给他们留点儿种。老彭不同意，官司打到了主席那里。最后，主席还是点头了。”

结果，志愿军归国时，有的部队整团、甚至整个师成建制地留在了朝鲜。

我不敢公布这组数据，恐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

毛泽东说了一句：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就这样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国土上。留下一些家里人陪伴他，以解儿子的寂寞和思乡之愁。或许，这就是当年毛泽东的一点儿“私心”吧。

彭德怀的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

这点，我亦早有耳闻。

“听说彭德怀经常顶撞主席，是真的吗？”

我想亲自从江青的口里得到证实。

“不对。极少！”

江青的回答十分肯定。

“第四次战役本来是可以不打的，打也没有胜算。主席没有强迫他，只是拍了封电报给他，征求他的意见。”

主席的诚恳，使彭德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证明主席是对的。

彭德怀领着二十万志愿军用血肉之躯为主席赢得了在国际上斡旋的空间和时间。

但第五次战役彭德怀为何不乘胜追击？将美国佬赶出朝鲜半岛？我还真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说彭德怀跟金日成也吵了一架，差点儿没搧他两耳光。是真的吗？”

“真的。”

江青没加思索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打不赢的仗，他偏偏打赢了。眼看就要胜利了，可他为什么又不打了呢？”

“他肚子里有火，憋屈！”

我知道，这件事与毛岸英之死有关。

原本是金日成打电话叫彭德怀去开会的。可到了那儿，金日成什么正事都没谈。不到十五分钟，家里就出事了！

“为什么不将毛岸英带在身边？”

彭德怀当时肠子都悔青了。

从此以后，彭德怀就再也没有给过金日成好脸色看。

当毛泽东问及此事时，彭德怀照样亮起了粗嗓门：

“老子把人都打光了，只怕他连个‘谢’字都不会说！”

毛泽东默默地挂断了电话，算是“默许”了。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拒绝遣返在朝鲜抓获的战俘，并将他们直接送去了台湾。

另一方面，却恬不知耻地向中国方面要求遣返美国战俘。

台湾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

可是，你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江青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毛泽东当年发出的这句庄严的口号。

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是啊，毛泽东说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想，重点在“一定”，而文章却在“解放”二字。

如果将来共产党的接班人不是“解放”而是“统一”了台湾，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了，我发觉中国话特别有意思。简直就是人类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

比如说：

“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

加起来就是七十年。

还有：

“风水轮流转。”

历史上国共合作了二次，二次都是共产党尝尽了甜头。如果七十年之后真有第三次合作，这风水会不会转到国民党那边去呢？

现在中国人越来越不听毛泽东的话了，但愿我的耽心不会成为现实。

一不留神，我发现我的思想跑题了。

江青仍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朝鲜战争的辉煌胜利，并罗列出了一系列的数字：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共歼敌 1,093,800。其中美军 400,000；联合国军 397,000 人。都是一些从其他国家东拼西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三年下来，我们共缴获了 10,000 架飞机、560 艘炮艇和 3,000 多辆坦克。”

以前，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是蒋介石。现在，这冤大头轮到美国佬来做了。

战争的唯一区别在于“正义”或“非正义”。

朝鲜战争，正义在中国和朝鲜方面。

在朝鲜的每一个志愿军战士都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

“你们要珍惜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他们做到了。

真的做到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其实是个爷们！”

江青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一时间让我愣住了。

“竞选总统时，他承诺要结束朝鲜战争。作为总统，他付诸了行动。他的‘空军一号’降落在了朝鲜半岛，虽然只是签定了一个停战协议，但他的意愿是真诚的。”

记得毛泽东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问江青：

“现在，谁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和朋友？”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江青十分巧妙地用毛的一句话，将这个问题搪塞了过去。

见我不语，江青接着补充道：

“我们三个敌人，但朋友只有一个。”

“哪三个？”

“日本、印度和苏联。”

我明白了。

中日之间是血仇。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这笔血债迟早是要清算的！

沙皇俄国霸占了多少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子孙后代一旦有了出息，难道不想再“要”回来吗？

中印之间，争的是“口粮”。记得主席说过：“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二十亿印度人和十五亿中国人难免不会有一天因吃饭问题而大打出手。

至于朋友，毛泽东为什么认定是美国呢？

江青笑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嘛。再说，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美国人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过中国人的。不仅是飞机大炮，还有他们的血肉之躯！”

我知道，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血浓于水”。中美之间这种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而缔结的友谊，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别看美帝国主义喜欢管闲事，爱做世界警察。但美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朋友！”

江青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

6

朝鲜战争结束时，中国将所有的战争物质以及部分志愿军战士留在了朝鲜，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诚然，正如毛泽东所说，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

这几天，江青给我上的这一课，我又学会了四个中国字：

“唇亡齿寒”。

而中国的老百姓则更多的是通过报纸、电影和其他的表演艺术来了解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那场战争的。

京剧《奇袭白虎团》，表现的便是抗美援朝时的一个小故事。后来成了江青主抓的八个样板戏之一。

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抗美援朝中奇袭“白虎团”的故事。

但是，如果进一步问及此次奇袭“白虎团”中，勇敢的志愿军官兵顺手斩得“小楼兰”，全歼美军“555 榴炮营”，并缴获该营营旗的事情，却少为人知。

时至今日，这面美军“555 榴炮营”营旗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该旗宽 76 厘米，高 50 厘米，整体呈长方形，尾端为内缺的倒 V 字形，底色为红色，上面印有黄色的“OH”、“555”字样及交叉轴图案。

1953 年 7 月 13 日，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西集团在突破前沿阵地后，迅速向纵深进攻。

为保证主攻部队顺利发展，第一梯队各师组织的渗透迂回支队，均迅速向敌纵深穿插前进，以打乱其指挥系统及炮兵阵地或断敌退路。

第 68 军第 203 师以第 609 团 2 营为主组成该师渗透迂回支队，于主力攻击敌第一线主阵地的同时，实施迂回渗透。

渗透迂回支队在副团长赵仁虎带领下，于 14 日 0 时 3 分由白杨里地区开进。

在通过 415 公路时，歼灭在此警戒的南朝鲜军 1 个班。部

队迅速通过炮火封锁区，绕过公路口的雷区，沿 522.1 高地以东公路跑步迅猛向纵深穿插。

行至三南里以北时，遇南朝鲜军前来增援的约 1 个连兵力。渗透迂回支队发起突袭，将之击溃。部队继续向前发展，在到达三南里时当即展开。

主力插向二青洞，另以 5 连由三南里以北沿山梁向注罗峙、上枫洞前进。

渗透迂回支队主力在到达二青洞时，遭遇正向第一线增援的南朝鲜军机甲团第二营的 40 余辆汽车，志愿军官兵便乘其不备，首尾夹击，将南朝鲜军大部分歼灭。

渗透迂回支队 7 班在截尾过程中，还击毁坦克 2 辆。

与此同时，先头的第 607 团侦察班在消灭了该敌人的尾随车辆后，在副排长杨育才的带领下，迅速脱离战斗，直捣南朝鲜军“白虎团”。

渗透迂回支队主力则迅速向“白虎团”团部附近的 421.2 高地发展前进，途中歼灭南朝鲜军一个多管火箭炮连，缴获火箭炮 4 门。

等该部正欲攻占 421.2 高地时，发现前方有数处灯光，并伴有轰鸣声。

黑暗中，渗透迂回支队主力当即迎面分兵迂回，包围设伏。

待敌近到眼前时，发现原来是正在向前运动支援的榴炮部队，而且还是美军部队。

志愿军官兵来了精神，没想到在这还能有机会包一顿美军馅的“饺子”，一个个都是跃跃欲试。

第一枪终于打响了，志愿军官兵以锐不可挡之势迅速将美军切割包围。

慌乱中，美军叽哩呱啦地吵吵嚷嚷，也听不懂说些什么，大概是万万没有想到志愿军官兵如神兵神将一般出现。

于是，顷刻之间，美军大部被歼灭，除了在黑暗中因行军不便没有跟上来的5门榴炮外，其余19门均被围困，成为志愿军的战利品。

在清扫战场时，志愿军战士收缴了一面精致的旗帜，即美军“555榴炮营”营旗。

至此，志愿军官兵才知道，他们“一不小心”竟歼灭了美军一个王牌炮营。

这正是顺手斩得“小楼兰”，缴得营旗（美军“555榴炮营”营旗）伴团旗（南朝鲜军“白虎团旗”）。

14日2时40分，渗透迂回支队主力占领421.2高地，控制梨实洞、北亭岭以北421.2、400高地一线阵地。

该支队在3小时半的时间内，穿插前进9公里，进行大小战斗11次，打乱了南朝鲜首都师的防御体系，对西集团进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征集文物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将美军“555榴炮营”营旗随同南朝鲜军“白虎团旗”一并送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它们曾在1958年“抗美援朝战绩”展览中展出，1959年被正式移交军博，作为历史文物收藏。

陪同我观看了京剧《奇袭白虎团》之后，第二天上午江青又安排我观看另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平原游击队》。

故事叙述的是在 1943 年秋，我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与敌人机智巧妙地周旋，并最终克敌制胜的故事。

这部影片同时塑造了两个极具特点的人物角色，一个是游击队长李向阳，另一个是日军中队长松井，他们的出彩演出为本片增色不少，不但增加了影片的艺术真实感，还使本片具有久远的影响，堪称佳作。

影片构置了紧张、惊险、扣人心弦的情节，敌我斗争形势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结构安排也疏密有致，张弛得当，惊险而不荒诞，有较强的可观赏性。

1955 年上演的电影《平原游击队》改编自邢野和羽山合作的话剧《游击队长》，剧中的人物李向阳深深的打动了几代人，影片中的许多经典台词至今仍让许多观众记忆犹新。

影片采用惊险片模式，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丛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人物塑造也较成功，主角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草莽英雄的影子，也融合了罗宾汉、夏伯阳的特色，方化塑造的反角松井更是突破了当时把敌人简化为极端愚蠢、残忍的做法，形象较一般反角复杂，也更有趣味。

谈到朝鲜战争，有一个既让人痛心又让人难以忘怀的名字——毛岸英。

毛岸英本名远仁，字岸英，初名永福，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与其妻子杨开慧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8 岁时，由于母亲杨

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

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

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是从来没有因自己是领袖的儿子而欺压百姓，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美军4架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枚汽油弹。

已躲入防空洞的毛岸英等四名参谋见敌机飞走，便跑回来。

谁知紧接着又飞来四架敌机，扔下无数汽油弹，毛岸英等再向外跑，为时已晚。

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

“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

彭德怀忙问：

“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彭德怀一边说着就往外跑。

“这时出去太危险了！”

警卫员景希珍死命抱住彭德怀，不让他跑出去。

彭德怀火了，大声骂道：

“放开！快放开，再不放老子毙了你！”

景希珍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彭德怀用力挣脱后，就直冲司令部的木房。

当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

“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

但是，毛岸英再也听不到喊声了，他已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

彭德怀气得直跺脚，立刻掏出手枪来，面对敌机逃跑的方向，对着天空“砰砰”地放了两枪。

枪声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痛苦的喊声，在朝鲜前线上空回旋。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德怀。

彭德怀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綦魁英说：

“保管一下。”

毛岸英牺牲了！毛岸英是中华民族的骄子，为世界和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0 年底，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不久，江青陪同毛泽东暂时离开了北京。

有很长一段日子毛泽东似乎都不愿回到北京的那个家，那个随时都能引起他无数回忆与怀念的地方。

江青一边休息一边还写作一点儿东西。

闲来无事便看看电影。

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才开始真正步入她的人生的政治舞台。

早在 30 年代江青就已经投身电影事业，解放后她又重新回到了她所热爱的电影事业中。

不同的只是角色的更换而已。

过去，她只是一个演员，一名普通的演员。

今天，她成了一名审查官，而且是主审。

中国电影诞生于 1905 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

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

20 年代拓荒时期，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

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

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电影《清宫秘史》，以戊戌变法为主线，讲述了上自中日甲午战争，下止义和团运动。光绪帝立志维新变法，整顿朝政，抵御外侮，重振国威，却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

眼看维新变法失败，光绪接连下两道密谕，令康有为等人应变。

然而，慈禧得到袁世凯的禀告后，提前行动向维新派下毒手，并从光绪手中收回朝政，变法惨败。

慈禧在次垂帘听政，光绪和珍妃被囚禁。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城临危，慈禧挟持光绪出逃，临行前逼迫珍妃跳井自尽。

马车徐徐西去，光绪只剩下了流泪……

《清宫秘史》以电影艺术形式，大致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实际，对维新派和支持变法运动的光绪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对慈禧等封建顽固派给以鞭笞和揭露。

息影多年的江青调看后，向毛泽东汇报说：

“《清宫秘史》是部坏影片”，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同时毛泽东还指出：

“《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此时，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部长们并没有积极合作，胡乔木副部长说：

“‘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不能批判！”

后来毛泽东又批评了胡乔木，胡乔木等不得已承认错误，并在5月3日被迫通知停止《清宫秘史》的放映。

由此，《清宫秘史》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遭禁演的影片。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指出：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后又一次指出：

“《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1963年，程季华在其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对《清宫秘史》作了批判：

“《清宫秘史》同《国魂》一样，也是用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表现历史的……更为荒谬的是，他以光绪皇帝、改良派和帝国主义为矛盾冲突的一方，而以慈禧和义和团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这样就一方面美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本质，同时也夸大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而另一方面，则歪曲和丑化了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把义和团和慈禧、保守派等同起来，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的爱国行动写成一种野蛮排外运动。这显然是对义和团的污蔑，对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污蔑，对中国历史的污蔑。”

1965年12月21日于杭州，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又一次说：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先后五次提到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

看来《清宫秘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

1967年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的，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戚本禹署名的洋洋大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4月1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的报刊及造反派小报都纷纷转载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

文章最后用了八个为什么，阐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八大罪状”，明确了刘少奇的“问题”已超出内部的范围，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从此，在报刊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专用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也掀起了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高潮。

事过境迁，今天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年毛、刘之间的《清宫秘史》之争，依旧不敢将矛头指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没有错。

一个多愁善感软弱无力的皇帝，一个望着徐徐西去马车，只会流泪的皇帝，无论他的内心多么善良，也无论他的人格多么高尚，他依旧只是一个丧权辱国的皇帝。

其实刘少奇也没有错。

电影就是电影，本来就是用来娱乐人民陶冶情操的玩艺儿，用得着无限上纲小题大做么？

他只是暂时忘记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罢了。

于是，善良的中国人只好将寻找替罪羊的目光再次转到江青这个“坏女人”身上。

谁叫她看了电影之后乱说话呢。

8

1949年新华社香港分社将年度最佳影片奖颁给了这部颇具争议的电影。

虽然这部电影在大陆遭到了共产党的封杀，在海外却受到了众多影迷的追捧。

不知是电影审查制度的不健全，又或是中共领导人之间已经停止了有关清朝皇帝的争论？

1954年越剧《康熙皇帝与珍妃》在上海首次公演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很在意思，中国的越剧中所有演员全都是女性。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南京、成都等地又相继将此剧改编成了当地的地方戏。

这部戏 1957 年重新在北京上演，并受到了刘少奇的肯定与褒奖。

在 1957~1958 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毫无疑问这些剧目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公开演出。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 1957 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右派分子”身份。

反右运动为中国 1957 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

1956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 1957 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

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针对这种情况，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极右分子标准：

1.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1956年，以当时中国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等人为首的一些人，借助于开门整风之际，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之路。

这本身就是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

为了让我们明了这一切，还是从一个最典型的标本：储安平的四十八个句子谈起。

这应当说是右派的政治纲领：

“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

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

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

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

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

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

他尖锐地指出：

“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

欧美的政党都是以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

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

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

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

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在这个似是而非的文件中，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只字不提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应当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社会主义阶段都是如此。

显然，在这里，完全混淆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蒋介石家族独裁专制统治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

显然，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而它总是时时替他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着想和打算。

而决不是抽象地代表所谓的人民。

因为，人民中是有阶级划分的。

而这种划分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否认政党的阶级性，实际上就是企图把资产阶级政党冒充无产阶级政党，企图蒙混过关，搞暗渡陈仓那套政治欺骗手段。

所以，五七年反右运动，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开门整风运动中民盟领导层对中共发起的政治战争的继续；如果说责任的话，首先应当怪罗隆基张伯均等人。

如果没有他们首先开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反右。

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共在开展开门整风的运动中早就明确地指出，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向共产党多提意见，但罗隆基张伯均等人大大地超越了这个界限。

这就等于公开宣战。而今天那些企图替右派翻案的人，首先把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只字不提，罗隆基张伯均储安平等人首先向中共开战这一事实。

从这一点上来说，那种所谓的“引蛇出洞”说是多么无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中国民盟所结成的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

是在面临着共同的强敌而临时结成的。而他们的阶级基础是完全对立的。

当这个强敌完全消失不见后，随着阶级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

然而，这一点未能被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所认识到。

因而没有事先采取措施。

这才是反右运动中最大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更是糊涂，他竟然说剥削有理。

实际上是等于把大门开向那些对中共持有敌意的同盟者们。

由此导致中共在突然出现的政治宣战面前被打了个溃不成军。

而仓促上阵的反击，则打了个稀里糊涂。

不仅把真正的右派打了不说，连带着把一大批并非真正的右派，而是提了些正确意见的，甚至与开门整风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打成右派。

更重要的是，受右派欺骗的一大批人，他们或多或少犯了些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盲目跟风。

是可以经教育改正过来的人民的一分子，都被打成右派。

从这一意义让说，57年反右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反右。

它导致的结果是很不好的。

右派思想没有被真正打掉。反而使人民受到冲击。

这就不得不联想到，今天那些仍然主张民主宪政的人，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这是值得警惕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反右运动结束后，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姚文元旧话重提又一次猛烈抨击了这部电影，文化部的负责人周扬也紧随其后口诛笔伐。

作为文革小组的成员之一，江青也没闲着。她谴责是刘少奇在背后支持了这两部电影。

1967年5月，毛泽东的一句话让这部电影又一次成为了“反面教材”。

此后，电影不再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娱乐项目，而真正成为了教育人民端正思想的宣传工具。

江青说，不仅是影界，在文化政策上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解放后，香港电影原则上是被禁止进口的。

但不久文化部好像是忽略或忘记了这一条禁令。竟然允许香港电影公司继续在中国市场倾销“极其腐败”的电影。

江青说，在这些电影中根本就看不见马列主义理论，毫无政治教育意义。

她还刻意点名批评了香港昆仑影业公司：

“只留意形式，不关心政治。”

解放后，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众多的早期国产电影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英雄儿女》。

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残酷的朝鲜战场变成了教育基础，并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英雄儿女》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一部经典电影，讲述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战场，王成在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以哥哥的精神为榜样，为战士服务，最终她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了。

片中英雄王成的形象深入人心，插曲《英雄赞歌》也流传甚广。

这是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片，它描写了广大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国土上的流血奋斗，并借助父子、父女、老战友之间的生死离别、劫后重逢来渲染气氛、结构故事，表现了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

影片在巴金原小说的基础上，充实了王成的故事，以细腻的笔触突出了这个英雄战士的成长过程以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

人物关系的情感内容和炮火连天的战场气氛的营造，使影片既洋溢着革命激情，又深蕴着亲情与道德力量。

片中昂然一曲《英雄赞歌》，通过在故事内外空间的巧妙处理，使之具有动人的魅力，从而流传甚广。

江青陪同我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

小礼堂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其实用不着翻译，我也能看懂故事情节。只是不明白江青为什么要请我这个美国人看这种中国军队与美军作战的电影？

或许她是想通过我的嘴教育当代的美国青年：

“前车可鉴！”？

散场时，我无意中瞥见江青摘下了眼镜。

她在擦拭眼泪。

江青动情地说了一句话：

“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

建国初期毛泽东因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暇顾及电影。

江青说，主席实在是太多的工作要关注，没法分心。只有在主席带着她外出时，她才能找到机会说说电影中的故事。

毛泽东似乎对电影情节并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政治问题”，以及在土改中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

江青当时还很年轻，爱说话。

可她说的话，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人听”。

为什么呢？

江青虽然身份特殊，却没有“名份”。中国人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她说的话除了招来一阵子冷嘲热讽，等于“放屁”。

然而，在那些年里，她也曾两次下基层。当然，她用的是原名——李进。当地群众只当她是“领导同志”，没人知道她的“第一夫人”的真实身份。

第一次，她持续在下面呆了八个月。

是关于十九世纪的乞丐教育家武训的历史背景调查。（详情前文已有交待。）

第二次，时间较短。在下面搞了三个月的土改。

1951年春，江青去了山东省的西部武训的故乡。其实，这也是她的出生地。自然，当地的方言一点儿也难不住她。没有人知道她童年时的名字，更没有人知道她是第一个下基层进行社会调查的领导同志。

提到这件事，她心中一直充满了自豪感。

没有人知道她的《调查报告》是在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帮助下完成的。

没有人知道毛泽东一开始是反对江青做这件事的。

人们知道的是，周扬派出了他的秘书崇天飞带着《人民日报》的一名姓元的记者紧跟着也到了山东。

他们的任务也是下来写《调查报告》的。不同的是，他们的报告对象是北京局。

显然，他们不是下来帮助自己的。

他们三人带着各自的助手乘火车到了山东西部。然后在堂邑县换乘吉普车。

因气候原因他们中许多人都患上了感冒。很严重，眼泪鼻涕一块流。

江青将自己带来的青霉素给了他们，帮他们治好了感冒。

在堂邑县出面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党委书记田春青同志。田同志和当地的老百姓一样都非常崇敬武训，并试图说服她改变自己的观点。

房东和房东的儿子都是武训的坚定的支持者。

后来调查时才发现，老房东解放前曾拥有比大恶霸地主黄世仁更多的田地。

江青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并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

《白毛女》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1944年除夕，抗日战争尾声。

冀中杨各庄的老佃农杨白劳在外躲债，到集贸市场买了白面鲜肉准备回家包饺子过年，他没有钱给独生女儿喜儿买化妆品和首饰，就给她买了两根红色的橡皮发箍扎头发用。

晚上，杨白劳回到家里，喜儿已很长时间没见到爸爸，扑到爸爸怀里哭了。

爸爸从怀里取出红色橡皮箍箍，把女儿长长的黑发扎成辫子，父女俩准备包饺子过年，要知道那时候穷人一年难吃一回饺子！

这时喜儿哪里知道，就在年三十这天，当地日伪保长、黑恶势力头子（当时的叫法是汉奸恶霸地主）黄世仁带着恶奴家丁找到杨白劳，逼还杨白劳借黄家的高利贷！

杨白劳跪在地上求黄世仁宽限几日，等过完春节想办法筹钱还高利贷。

黄世仁哪里肯依，从怀中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卖身契，将爱女喜儿卖给黄家做婢女一丫鬟！

原来喜儿是当地十里八村的美女，黄世仁一直垂涎三尺，想霸占喜儿。

杨白劳誓死不从，黄世仁竟打昏杨白劳，强行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下手印，等杨白劳醒来，给他两块大洋算是“找零”，杨白劳买过节物品的钱就是卖出喜儿的找零钱。

吃完年夜饺子，喜儿在节日的花炮声中入睡。

杨白劳想着明天一早，黄世仁就要来带走喜儿到他家做奴，心如刀绞，已不想活了，拿出剧毒的卤水喝了下去……

第二天大年初一，喜儿一觉醒来，爸爸已不在人世，杨各庄的众乡亲赶来为杨白劳收尸。

这时，黑恶势力头子黄世仁闯进杨家，拿出喜儿的卖身契要抢走喜儿，村民奋力反抗，黄世仁竟开枪弹压，抢走喜儿。

村民中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大春——喜儿的男朋友，他怒不可遏，当晚他闯进黄家欲救出喜儿没得手，杀死一个家丁，纵火烧了黄家的厢房逃走。

喜儿到了黄家，受尽屈辱和打骂，黄世仁的母亲是典型的母老虎，她挑剔喜儿给她泡的茶，竟用发簪扎喜儿的脸。

喜儿捂着脸在佛堂痛哭，这时黄世仁悄悄进来，竟扒掉喜儿衣裤，强行奸污了喜儿！

那时女孩儿的贞洁就是性命，万念俱灰的喜儿也曾幻想反正身子已被黄世仁糟蹋，就嫁给黄世仁做小老婆。

谁知一天中午喜儿无意中发现，黄世仁已准备把她卖给妓院。

晚上，喜儿乘人不备逃进了深山，在一个山洞里藏身。

自此人们再也没看见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在河边洗衣服唱歌。

喜儿在深山里风餐露宿，没吃没穿，渐渐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一头乌黑的头发变白了，喜儿在水池边看见自己的头发也痛不欲生，想着家仇未报坚强地活了下来。

因遭强奸怀孕，喜儿还流产生下一个未足月死于腹中的胎儿。

一个大雨之夜，喜儿正在一个破庙里吃香民上的贡品，这时忽然看见两个人闯进庙门，一道闪电，喜儿看清正是仇人黄世仁，到乡下要债碰上大雨进庙躲雨。

黄世仁也看见了一身白色的喜儿，不知是人是鬼，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命。

自此黄世仁进庙躲雨碰上白毛仙姑的传说不脛而走。

出逃的大春为报国恨家仇，参加了八路军，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

这年八路军解放了杨各庄，黑恶势力头子——汉奸恶霸地主黄世仁闻风而逃，大春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带着战士和乡亲们追逃。

晚上，黄世仁跑到曾经来过的那个破庙，还想着找白毛仙姑显灵救他一条狗命。

谁知真的又碰上进庙觅食的喜儿，喜儿发现仇人抄起佛龕上的香座朝着仇人扎去，黄世仁见状抱头鼠窜，被赶来的八路军和乡亲逮个正着。

大春发现喜儿——白毛女，认定是个苦人儿就跟着追到喜儿藏身的山洞，喜儿藏在洞里不敢出来，在人们的呼唤下，喜儿借着火把的光看到那个英俊的士兵正是自己朝思夜想的恋人大春，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大春——就昏了过去。

人们救出了白毛女，大春找到了喜儿，一对爱人终于团圆。

回到村里第二天召开公审大会，喜儿控诉了黑恶势力头子、汉奸恶霸地主黄世仁残酷迫害她们全家的滔天罪行，还有其他乡民也控诉了黄世仁汉奸卖国的罪行，经过共产党政府批准，枪毙了恶霸地主黄世仁。

不久以后，大春和喜儿在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

故事是真实的。

老百姓的感情也是真实的。

老百姓对地主的仇恨更是真实的。

老房东是地主。

老房东喜欢武训=地主喜欢武训。

一道简单的算术符号，揭露了武训的真实面目。

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10

1952年9月初，武训事件结束后江青回到了北京。

没过多少日子，她又呆不住了。

当时正值二次土改的高峰期，她决定到农村去，亲自参加土改。

这一次毛泽东不但没有反对，而且非常支持。

不过，也有其他人反对。

反对她下去接触人民群众。

文化部副部长反对得最起劲。

理由是：“她不够资格。”

反对无效。

最后江青胜出。

66

她参加了一个小组，包括一些领导人，其中便有政治局委员李先念。

他们一行人乘火车到了武汉。

武汉，中国湖北省省会，副省级城市，中国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

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武汉市区，将武汉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故素有“江城”的美誉。[

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中部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是华中地区的金融、商业、贸易、物流、文化、科教中心。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武昌起义的发生地。

当火车驶抵武汉火车站时，她突然被告知：“请她及其护卫随从在此站下车。”

其他人继续前行。

这让她很窝火，却也无能为力。

李先念甩开江青，在长江南岸——武昌扎下了阵脚。

江青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似乎是四处碰壁。

也难怪，她的土改工作团队——除了她，所有的护卫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

按照上面的指示，她的团队的工作范围被限定在武汉地区。

并且不允许他们住在农民家里，甚至不允许他们主动接近农民——除非江青一意孤行非要这么做的时候。

警卫员对土改的意义并不太重视，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保护好李进同志的安全！”

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不仅如此，中南局党委还另外派出了一名警卫，携带手枪寸步不离地跟在江青的身后。

每当江青走进农民家，不等她坐下，凶神恶煞般的女警卫早已瞪圆了眼睛紧贴在她的身后。

有了这座“保护神”，无论江青走到哪里，老百姓就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而远之。

江青再蠢，此刻也早该明白，这是李先念对她的特殊照顾。

有一次，一位与当地的民兵发生了口角的妇女找江青“告状”。没等江青开口，女警卫就像“铁柱子”一样杵在她俩之间。

忍无可忍之下，江青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无名之火：

“作为警卫，你应该做的是协助我，而不是妨碍我的工作！难道你想让我脱离群众吗？！”

冲着她大声吼叫了起来。

其实江青心里明白得很，这不是她的错。一定有人在背后“撑”着她。否则，她也没这个胆。

江青还没有弄明白的是，这幕后人究竟是周扬？还是李先念？

实话实说，到后来江青还真是喜欢上了这个“尽职尽责”的女警卫员。

在生活上，她对江青照顾得十分周到，尤其是在饮食上。

“困难时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江青的伙食标准自然也不能例外。

为了能让江青吃得好点儿，她将自己和丈夫的配额大都“悄悄地”用在了江青身上。

除了江青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警卫之外，她和工作组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李进”的真实身份。

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当地的农协主席。

工作中，江青接触到的最多的人也是他。

虽然临近武汉市，可该地区仍然是个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落后地区。

解放都已经两年了，该地依旧是匪盗猖獗。

潜伏在地下的黑社会势力，解放前曾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多次褒奖。

该地的土改工作也迟迟难有进展。

一些落后群众甚至是顽固地公开抵抗土地改革。

所以，警卫员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们不仅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还要协助好首长们的工作。

当时的公安部门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便乱抓人。他们必须通过合法途径才能逮捕，或者是拘留某人。

然后还要通过法律起诉等一系列繁琐的手续，才能给人定罪。

只有地主和杀人犯，另当别类。

因为他们属于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推翻“三座大山”上面来。

一个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中国的屈辱史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先从根本的内因说起。

当时的中国即使康乾盛世之后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一切的政事都由皇帝亲自料理，但是纵观整个大清朝还未能有一位象雍正帝一样亲政的君主，也决定了雍正之后的皇帝如同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不行，下面的八旗子弟也不会好，贪污腐败横行，这一切导致了清朝的没落，而归根结底都是封建主义高度发达的标志——中央集权制的完善惹的祸，那么清政府就真的不思进取吗？

1840年是道光年间，中国面临了近代史上的第一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这次的失败让清政府进行了第一步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建立了号称排行世界前五名之一的北洋水师，结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海战之后，圆明园被烧，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证明了什么，清朝子弟不努力吗？

错了，满清贵族也是有好男儿的，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后，满清王爷僧格林沁率两万骑兵迎敌，结果被几百英法火枪兵打的只剩下六个人。

这不是我为清政府说话，这是史实，不过败了毕竟是败了。

紧接着便是清政府的第二步改革，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戊戌变法开始了，百日之后失败，西方的政治制度进来了又如何？

紧接着便是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完全沦为了“双半”社会，清政府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学习西方的法治宪政思想，开始实行立宪，颁布了号称中国伪宪法之鼻祖的《钦定宪法大纲》。

我们不能说清政府不努力，可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烂泥扶不上墙了。

因为什么，封建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对待封建主义不能采取改良的方式，而必须完全的消灭，从中国的历史上清除。

毛泽东做梦也没有想到辛辛苦苦领着全国人民好不容易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家里有六个半亲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青的前半生即文革前无论怎么说都是清清白白彻头彻尾的革命者，至少也算得上是半个“烈士”。）他刚闭眼没多少功夫，中国人民又让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了头上，而且压得更沉重……

11

在农村，主要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他们只处罚那些罪证确凿且罪大恶极并欠有血债的首恶分子。

贫下中农，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

最难办的要数中农了。

不上不下。

11

又可上可下……

一切都要看执行者掌握政策的尺度和水平的了。

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是清查“土豪劣绅”，他们通常也是当地的地主组织中头头脑脑。

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他们不仅控制着大批小地主，而且自己手头也握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一小块一小块分散在各地的，十分具有隐蔽性。查处起来非常困难。

江青领导的工作组决定先拿下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的大土豪，并以此为突破口，撕开土豪劣绅布下的防线。

工作组决定先拿“陈麻子”开刀。

他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背后控制着一个十分庞大的黑社会组织。

这些被称之为“秘密特工”的黑社会成员，大多戴着不同颜色的袖章和普通的农民一样——都是土改工作者。一时间让人好坏难分，真假难辨。

工作组采取了“外围突破，中心开花”的策略，逐步揪出了一些名声狼藉的恶霸地主，并绳之以法。

当然，一切都是根据《土改工作法》进行的。

那时的人，头脑都很简单。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并严格呵护着“党的生命”。不象现在的人，懂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红头文件，没等下发到地方，一级一级地就变了味。

毛泽东和党中央将权力下放给了省政府，由地方掌握“生死大权”。

人民法院根据土豪劣绅和地主分子所犯下的罪行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量刑的尺度。

江青回忆说，老百姓的愤怒有时是空前的。她的工作组有时不得不出面干预。否则那些被批斗的地主就极有可能被人当场打死。

民兵在被批斗者和愤怒的人群中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

江青和她的团队的其他成员，有时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挡箭牌”，以免审判后的恶霸地主被狂怒的群众撕裂成碎片。

当群众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人民法院才宣判被批斗者的罪行。立即执行的枪声一响，愤怒的群众转而变得欣喜若狂起来。

只有将那些罪大恶极的“坏分子”绳之以法，才能消除群众内心里的恐惧，进而才能推动土改工作的开展。

江青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终生难忘。

当地群众一直搞不清楚江青及她的团队成员的实际身份。

从她们的衣着打扮来看，这些人无疑是吃国家粮的“公家人”。

江青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她有一架照相机。

在农民的眼里，照相机可是个稀罕物件，只有当官的或有钱的人才摆弄得起。

他们据此猜测，江青一定也是一个“官”。

说不定还是县里来的“大官”。

于是，农民们对她又多了一层敬意。

土地改革总体方案分二步而走。

首先是划分阶级和成分，第二步是土地的再分配。

每一步大约都需要花十到十二天才能完成。

这是江青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当土地再分配工作开始时，由工作组负责划分谁是地主、富农或中农。

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土改工作法》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工作中，武汉地区下属的两个区都曾发生过错误地将富农划成地主、将中农划成富农的事情。

无疑那些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没想到一旦热情过了头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竟然会有如此之大。

江青领导的工作组，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

首先，她不允许在工作中使用“暴力”。

其次，她强调做事一定要“认真”。

毛泽东说过：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

初步调查完成后，她还要亲自打电话向当地官员核实情况，并征询他们的处理意见。

根据上面下达的指标，16至20%的当地人口将被划分为地主或富农。

江青认为不妥，打击面过大。并经常与上面下来的人发生争执。

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所以也就没有人将她当一回子事。

有的地方因土地资源不足，甚至强迫中农交出他们的土地进行再分配。

他们的做法也很简单，将凡是有土地的人统统打成“土豪劣绅”，一切便迎刃而解了。

上面下来的人不听她的话，于是她就找上面或上面的上面的人反映情况。

有时，她竟然会将电话直接打到了省委。

省委的人知道她的身份，自然也就知道她说话的分量。

不过，她总不能每件事都找省委吧？

即便是这样，她虽然为几户中农主持了“公道”，却也因此得罪了上面或上面的上面的人。在上面落下了一个“飞扬跋扈”的恶名。

武汉的天气也如同上面的人一样喜怒无常。

1951年的11月格外寒冷。

江青虽然“全副武装”将所有衣物和沉重的外套全都套在了身上，依然冻得战战兢兢嘴唇发紫。

毛泽东送给她的一件质地很好的大衣被她忘在了北京。

她是故意忘记携带的。

一是这是主席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情深意重。

二是大衣质量太好，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严寒使得她的睡眠更加不好，每晚都不会超过二、三个小时。她开始咳嗽，由于没及时看医生，拖成了支气管炎。

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她来武昌看病。

她去了。

可医生开的药没什么效果。

不能责怪医生，当时就这样的医疗条件。

不久之后，她又回到农村去了。

李先念特意给她送来了一车木炭。

让她着实感激了一段日子。

女警卫员整夜为她烧着木炭，睡眠有了明显的改善。可她仍在咳嗽，一时间也很难治愈。

江青每天都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步行几个小时，常常弄得她疲惫不堪。

看着“萎靡不振”的江青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仍在四外奔走，当地的农民有人佩服、有人同情，也有人冷嘲热讽嗤之以鼻：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让江青觉得苦恼甚至沮丧。但她仍然咬牙坚持了下来。内心里，她常常勉励自己：

“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斗地主，二是斗自己……”

决不能临阵脱逃当逃兵！

在土地的再分配阶段，她和她的团队都在跟自身的软弱作斗争。

当阶级成分划定之后，土地（不动产）及其浮财（动产）就要拿来被重新分配。

有钱人开始惊惶起来，不知道怎样隐匿自己的财产，闹出了不少荒诞无稽的笑话。

有的财主打开衣柜，将几十件西服和长袍全都套在了身上，以至根本就动弹不得。

不仅是地主，土改中每个人的想法都在缓慢地改变。

江青回忆说，她记得有一位穷得没有衣服穿的贫农，当他分配到一床被子和一件长袍时，他不敢接受。他害怕工作队一走，地主又会重新夺走这些原本是属于他们的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农民很贪婪。

他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更好。

服装、床上用品、农具或家具？

有些东西他们从未见过，看得他们眼花缭乱。最后干脆抓住什么是什么，也不管它有用没用。

“为什么选这么大的一床被子，你真的需要它吗？”

她抓住一位贫农问道。

江青解释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一位单身汉。当地的青年人大多是单身汉（因为太穷，没钱结婚），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拥有过一张床。

光拿床被子又有何用？

不如拿件农具，生产自救。

在土地的再分配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些农民拒绝接受靠近沼泽地的稻田或土地。担心容易遭受洪水或其他风险。

工作组的人只得不厌其烦地说服他们，这些“湿润”的土地，其实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因为是按人头分配，有些家庭得到的土地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分散得到处都是。

这也是让人头痛的问题。

还有一些更让人头痛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游牧民族从来就没有住过房子，却分配到了房屋。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房子。

他们更喜欢牲畜。

哪怕是能分到一头水牛的一、二条腿，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毛泽东曾经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在土改工作中江青越来越体会到毛所倡导的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江青一边工作，一边研读社会主义理论。

通过实践，她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土改工作的下一阶段——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地主政府尤为重要。

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在极度的兴奋过后，随即心中又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希望。

工作组要走了。

农民们聚集在他们周围，一边敲锣打鼓，一边流着眼泪。

江青也哭了。

江青自己也没弄明白，泪水中是依依不舍的成分多些？还是被眼前这些质朴的农民所感动的成分更多些？

工作组走后的第二天，小镇上进行了民主选举。

一位年轻的寡妇被选了新的农协主席。

工作中江青与她有过接触，印象不是很深。只是没有想到后来她被揭发出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土改工作队撤回到了武汉，并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总结报告》。

总体来说，土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工作中也难免会发生偏差，理应由具体执行人负责。

有的地方搞土改左倾思想严重，结果导致许多地主受罚。也有的地方，带队的领导思想比较右倾，工作作风保守，不敢得罪地主。

所有的工作组都回到湖北省省会武汉后，其他地区的代表有人问江青和她的团队：

“你们倾向于哪一边？”

江青回答说：

“中农。”

当他们去武昌开总结大会时，省委书记就在大会上明确地喊出了：

“别碰中农利益！”的口号。

这等于是肯定了江青的思想是正确的。

接下来他们在汉口休整了一段时间。

当时负责农村事务的是邓子恢。

土改中江青还参加了另一项建国初期的社会活动——宣传推广《新婚姻法》。

江青说，这项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可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

应该说《新婚姻法》适合于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即便是这样，可主要受益者——青年人依然抵制它。并且经常使用身体暴力。

一个血腥的融事件就发生在她工作的社区，至今仍让她记忆犹新。

一天，一些村民发现一具尸体漂浮在池塘里。

死者双臂被绑定在身后，身体已经开始腐烂，面目全非已无法辨认。

显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溺水事件。

死者生前遭人殴打，尔后才被抛入水中。

很快这件事被当成了鬼怪故事在村民中流传开来。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恐慌。

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江青决定插手此事。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她得知村里有一对夫妇不和的情况。女的管男的叫“癞子头”，《新婚姻法》颁布后，她曾主动要求离婚。

男方不同意。

于是，女方便伙同他人（情夫）将丈夫绑了起来，活活打死。然后将尸体扔在了山中偏远的池塘里。

为了转移村民的注意力，于是她便捏造了一个鬼故事。

掌握到了这些第一手材料之后，江青和她的工作队决定单刀直入直接与疑犯面对面地交锋。

当工作队将她的情人带到她面前时，她的精神防线便被彻底摧毁了。

她坦白交待了作案动机及其细节。

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贫穷的工人阶级的成员，插足的第三者也是劳动人民出身。

三人都非常年轻。

她有二个小孩，其中一个还在襁褓之中，尚未断奶。

她的丈夫过去曾经是一名军人，解放后复员回家的。失去了他的军饷，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

现在她年纪轻轻地就成了杀人犯，很快地便受到了公审。

江青回忆说：

“诉讼期间，她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孩子，如果她没有做错事的话。”

她和她的情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我想，要是现在就好了。

要是现在，他俩就不用死了。

现在没人讲法律，只要“坦白从宽、反戈一击。”就行。就像王立军反咬薄熙来一口，自己也就解脱了。

还是江青她们那个年代的人朴实，懂礼懂法。

江青接着说道，这个悲剧故事很快便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在全国推广。

杀人是表象，根子却在旧的婚姻制度上。

在旧的婚姻制度的束缚下，一旦夫妻双方有了矛盾，没地方讲理，他（她）们只能选择自杀或谋杀。

事后，江青找到那个区的区长，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一定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的生活和疾苦。

区长很紧张，一瘸一拐地向她承认错误：

“我没有宣传好《新婚姻法》，尤其是对妇女同志关心不够。”

至于公众舆论，当地几乎所有的人都想让这对奸夫淫妇死！人们用舆论来阻止青年夫妇离婚。

尤其是老人，他们最不愿意接受《新婚姻法》中保障夫妻双方离婚自由这一条款。

后来，省政府出面“酌情”免除了这个女人及她的情夫的死刑。改判为：“强制劳动！”就在当地劳动改造。

“总而言之，”

江青接着说道：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是啊，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自然，上级让谁死，谁才能死。反之亦然。

江青还给我讲了另一个女人的故事。

一个寡妇和她的几个孩子。

工作中江青曾与她有过接触。

不想她突然患上了疟疾和急性肺炎。

当江青想去“拜访”她时，遭到了自己的助手和警卫的极力阻扰。

他们担心她会被传染。

江青没有听从他们的劝阻，坚持要去！

当她走进寡妇居住的茅屋时，发现躺在床上的女人已两眼无光，呼吸几乎已无法察觉。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唯一的声音是院子里的孩子们的哭泣声。

江青给了她一些西药，并亲自喂她服下。

在江青的悉心照料下，寡妇的身体渐渐地康复了起来。

同样，在江青的帮助教育下，她的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便成了一名“积极分子”。

她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江青的真实身份。她只知道是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江青接着说，在农村即使颁布了婚姻法许多地方依然是我行我素，仍在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彩礼和嫁妆也水涨船高，张口就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收音机）。

新娘的负担也不轻松。光铺盖和新衣裳就得吸干父母亲多少年的积蓄。

豪华的婚礼和婚宴更是社会主义社会无法容忍的奢侈和浪费！

再说，土改中女性和男性分得土地虽说是同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土改政策能够被贯彻执行。

妇女的权益每每都得不到保障。

她们得到的也每每只是一些较小的或劣质的土地。

更可悲的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竟然会逆来顺受、毫无怨言。

尽管政府坚持的原则是“男女同工同酬”，可共产党的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总是要打折扣的。

一般来说，在农村男人垄断了农具，并且拒绝女人使用。在许多地方，女人是不允许下地犁田的。

同工同酬，在农村执行起来要比城市困难得多。

江青再一次强调：

“理想和现实之间不能混淆！女性在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十章 冰雪红墙

1

江青又开始了讲述她的故事。

与几年前她在乡下搞土改或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所不同的是，这段时间江青一直呆在毛泽东身边，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处理一些国外和国内的事务。

1951年冬天，中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

建国初，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

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

在 1951 年 10 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

中共中央于 12 月 1 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1951 年 12 月 8 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 年 2 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1952 年 3 月 5 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

多数从宽，少数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工业从宽，商业从严；

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1952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

根据文件的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并纠正了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偏差。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

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

刘青山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为满足其极端腐化的生活需要，竟凭借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人民币旧币）的巨额，借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

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 14 亿元之多。

刘青山在获取非法暴利、大量贪污后，则任意浪费挥霍，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

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自己供述，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节日开支及送礼即达 3 亿多元。

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亲手一次焚毁单据 378 张。

刘青山的贪污罪行是在 1951 年 11 月中旬，在河北省委召开的第三次党代会上被揭发出来的。

根据刘青山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对此事极为关注，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刘青山大贪污案的处理，下决心坚决予以严惩。

他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

毛泽东对刘青山的处理是坚决的：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 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的决心，无疑决定了刘青山的命运。

2

黄敬——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浙江绍兴县一个世代官僚家族的后代。

俞家是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但少年黄敬并没有在如此丰厚的生活环境中沉溺下去，过上一种命运似乎早已给他安排好了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恰恰相反，清末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却使他生出一种“反骨”——他早早就有一种鲁迅所说的那种“下等脾气”，偏偏与当时的“下人”们亲和。

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

那是一栋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

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

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

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

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

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宗晖本名谢伟棨，中共地下党员。

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1930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彦（1909—1984），河北衡水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学生，时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青岛大学的学生也成立了反日救国会。

他们上街抗议、宣传，要求市民抵制日货，同时揭露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在青岛大学的革命思想和行动，还影响了另外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更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当时名为李云鹤的江青。

江青，山东诸城人，早年曾在济南山东省试验剧院学习，而当时的试验剧院的院长则是后来担任了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戏剧家赵太侗。

1931年，通过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老师赵太侗的关系，江青到了国立青岛大学，任图书馆的管理员。

我们已经知道，赵太侗的夫人，乃是黄敬的姐姐俞珊。

通过赵太侗和俞珊夫妇，黄敬自然就认识了江青。

对此，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是这样回忆的：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侗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

俞启威（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

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李云鹤（江青）也参加了。

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俞启威、李云鹤外，还有王彦。

海鸥剧社成立以后，在青岛大学的小礼堂里进行了首次演出，剧目是《月亮上升》和《工厂夜景》。

《月亮上升》是爱尔兰的一出名剧，写的是爱尔兰一个民族革命志士的爱国斗争故事，由王东升扮演警察，张福华扮演革命志士。

《工厂夜景》是一出反映上海工人苦难生活的戏，易扬编剧，由黄敬、李云鹤主演。

当时青岛大学的教务长赵太侗是留美学习戏剧的，剧社成立时曾邀请他指导，排戏时也曾邀请他导演，赵太侗没有参加。

但对剧社活动没有制止，因此才有可能在大学礼堂公开演出。

公演时，《月亮上升》中那个被通缉的爱国志士的命运与当时“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很类似，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效果很好。

1932年5月份“左联”的刊物《文艺新闻》以《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为题，报道了“海鸥剧社”的活动。

但不久，由于青岛大学学生闹了学潮，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包围青大，指明要逮捕时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的王彦。

黄敬等也闻风逃离青岛到了上海。

1932年7月，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后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赵太侗任山东大学校长。

一切似乎又风平浪静了。这时，黄敬又从上海回到山东大学继续上学。

但到了1933年夏天，因叛徒出卖，黄敬被捕。

经过家庭多方奔走，找国民党上层关系营救，他才在当年秋后出狱，暂回上海家中治病。

在上海呆了两年后，1935年秋，黄敬又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以读书作掩护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在北平，黄敬参加了由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

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爱国组织，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长是姚依林。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日益严峻。

这一年5月，日军借口“塘沽协定”被破坏，调集大批日军入关。

蒋介石政府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使华北名存实亡。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指使下，各种“自治运动”各种汉奸组织，或则公然挂牌应市，或则加紧阴谋筹措，准备出笼。

殷汝耕首先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老牌汉奸王克敏、曹汝霖等则酝酿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

这一年，黄河大水成灾。

河南、山东大批灾民逃至北平，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予救济，激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义愤。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不分党派，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响应党的“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都参加了。

他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北平的具体情况，决定以请愿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上旬，传闻汉奸“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将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在12月9日成立，企图进一步使“华北特殊化”。

这个消息极大地激怒了每一个爱国者，于是党不失时机地立即决定在12月9日举行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12月9日，爱国学生队伍先在新华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未遂，发展为游行宣传，由中南海前门转到西四、护国寺大街、北海后门、沙滩，到达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

正当学生代表据理力争，要求通行时，竟遭到反动军警用木棒、皮带和水龙头的冲击和埋伏在三条胡同西口北警察所的便衣侦缉队的拦腰突然袭击，使沿途扩大的爱国游行队伍顿时乱了起来。

这时，黄敬等振臂高呼：

“不要乱，到北大三院开会去！”

于是，爱国学生们又齐集北大三院网球场内。

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当场决定组织全北平的总罢课斗争。

由于地下党、学联的推动和学生先进分子的奔走呼号，北平大、中、小学校立刻形成同盟罢课运动。

12月14日报又载：“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16日成立。

党组织便针锋相对地决定在16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5日晚，在王府井拐角的长安饭店，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董毓华等举行秘密会议，研究“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具体部署。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规模比“一二·九”更大的示威游行。

16日上午11时许，各路游行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三万多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

黄敬攀在一辆电车上，由宋黎、王炎等支撑着，发表了简洁有力的演说。

他慷慨激昂地带领着群众高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收复东北失地”！

“反对广田三原则”！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市民大会结束后，数万群众由南而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

当队伍到达正阳门前时，军警林立，开枪拦阻。

游行指挥部决定分三队入城；

一队由黄敬带队，由正阳门冲入，

二队绕道宣武门进城；

三队留守原地，待第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三队，共赴“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的外交部街扩大游行。

但是，黄敬带领的第一队冲入了内城，第二、三队却被军警、大刀队阻于外城。

第一队行进到西单南的绒线胡同西口时，也被军警拦住了前进道路。

双方僵持到太阳快落山时，反动警察和大刀队、侦缉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冲杀过来，手无寸铁的学生多人受伤。

黄敬组织、指挥被冲散的第一队出险后，又担心被阻于外城的第二、三队遭到同样的冲杀，于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军警戒严的宣武门城墙，爬在垛口上向城外游行队伍高声喊道：

“一队被大刀队冲散了，你们可要注意呀”！

被阻于宣武门前的学生队伍在城下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及时互相激励，更紧地团结在一起，警惕着军警的动向。

黄敬从宣武门城墙下来，又绕道正阳门出城，寻找被阻于外城的游行队伍。

鉴于天色已晚，冰天雪地苦斗终日，饥寒交迫，又听到了黄敬在城墙上的警告，乃决定主动收兵回校。

不料反动当局强迫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分散，却在中途暗伏军警。

当爱国学生通过时，伏兵四起，突遭袭击。

经学生纠察队奋勇抗争，始得突出重围，各自分散回校，负伤者较西单尤多。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紧密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阻击了国民党和汉奸傀儡政府的进一步卖国阴谋，原定在12月9日、12月16日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一再延期。

“一二·九”运动后，黄敬彻底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36年，黄敬任北平学联党团成员，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学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部长，区党委书记，1938年调中共冀中区党委任书记，参与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42年后改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兼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军区政治委员，和杨得志等扭转了冀鲁豫的困难局面，巩固发展了根据地。

1945年到延安养病。

1946年冬，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经办事处主任，不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

多年的革命生涯，已经把黄敬锻炼成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天津工作。

1952年，黄敬又被调任中央政府政务院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次年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被任命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为发展我国的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材做出了贡献。

不幸的是，1958年2月10日，黄敬患肺动脉栓塞，医治抢救无效，那颗勤奋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时年四十六岁。

在所有介绍黄敬的正式材料里，都看不到他与江青有什么关系。

但在江青的履历上“入党介绍人”这一栏中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黄敬”二字。

黄是江的入党介绍人，是江的革命引路人，没有黄就没有江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没有江同毛泽东的关系。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江青成为毛夫人，并随丈夫进城后，可能对主席说过，年青时在青岛大学旁听过梁实秋的课，也可能为黄敬唱过赞歌。

不管江同毛说没说过她的入党介绍人，但遍查有关资料，青岛大学可能是毛执政后唯一去过的一所大学。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早期革命经历，也可说是对江青年轻时的经历还是十分“在心在意”的。

这或许是伟人毛泽东对“爱”的另一种诠释吧。

没有爱，毛泽东能与江青共同生活几十年而始终不渝吗？

换句老百姓的通俗说法，江青如果是只“破鞋”，毛泽东穿了十年就不怕臭脚吗？

真搞不懂中国人在津津乐道地对江青说三道四的时候，难道就没人想过这也是在亵渎他们敬爱的领袖吗？

难道中国人真的如同黄西所说“只管大胆胡说，从不小心求证。”的吗？

难道中国人真的脑子全都进了水吗？

这是真的吗？

共产党革命几十年，却越来越没是非标准、越来越真假难辨。更别说江青的那个年代了。

黄敬当年不仅在山东青岛，在北平、天津地下党内亦非常活跃，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37年，江青进延安时，黄已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书记。

中共进城“赶考”不久，党内首开惩治腐败，就是拿黄敬的下属刘青山、张子善开的刀。

黄曾托薄一波向毛求情，未果。也不可能果。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

薄一波说：

“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

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

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中共进城，刚打开考卷，问题就提出来了。

毛泽东的回答只一字——杀。

黄敬虽然替下属替大贪污犯求情，可老百姓并不知道，知道的，也没人敢领他的情。

黄敬的夫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妹妹、前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回忆说：

“那一段时间，每逢连阴雨天，老黄就耸立不安，夜不能寐，想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家属都还住在破漏的窝棚里，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一家老小挤在炕上等天亮。有的工人甚至无房可住，一家人分散睡觉，白天吃饭才聚在一起。老黄感到非常内疚，横下一条决心，一定要解决这一问题。”

1956年，黄敬已是中共中央委员，1957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应该说黄敬进步的不慢了！

1949年至1957年，8年时间里江、黄有无联系无人知晓，也无处查证。

只是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不管江、黄有没有再联系，黄活到1957，离死也不远了。

随着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所有人（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到了江青身上。

然而，此时江青的身体却糟糕透了。

她不仅经常发高烧，而且体重也在迅速下降。

经专家小组诊断，妇科医生的意见是“宫颈癌”。

“1955年……”

江青回忆说：

“1955年，我被再次送去苏联体检。结论是‘虚惊一场’。那个年代，苏联医生不相信‘细胞理论’，完全推翻了我之前在中国所做的体检结果。”

直到1956年，她的中国医生才注意到异型细胞即将突破子宫颈膜。

专家小组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

一是外科手术；

二是放射治疗。

江青之前手术治疗肝脏疾病时曾导致腹部粘连，那种痛苦至今难忘。因此，她拒绝手术治疗。

那么，只剩下放射治疗这一条路。

使用的是两种镭和钴60。

令江青始料不及的是，镭治疗太痛苦，而钴60则更难以忍受。她实在是无法再继续忍受这种痛苦。

医生们不得不停止治疗，并建议她重回莫斯科。

这时，江青才知道她得的是绝症。

既然活不了多久了，那就活一天算一天吧。早在她参加革命的那一天，就已经看破生死了。

她之所以不想离开中国，一是耽心在她离开的这段日子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二是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她想在主席身边。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江青开了一次“后门”。

毛主席“指示”中央委员会安排一名女医生陪同江青出国治疗。

“抵挡”不住集体决议，她投降了。

江青第四次踏上了俄罗斯之旅。

抵达莫斯科时，她又开始发烧了。

而且烧得很厉害。

经检查，苏联医生拒绝接受她住院治疗。

因为她的白细胞已下降到不足三千，放疗的副作用使她受到了严重的感染。

她的妇科医生和助手告诉医生，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特殊”的病人！

医院“被迫”接受了她。

同时，医院也破例地同意了让她的中国医生留在她的身边，用中药来中和放射治疗宫颈癌时使用“过量”的钴 60。

放射治疗使得她的骨髓也遭受到了损坏。

接下来，首先必须给她输血。

可她正在发烧，整个治疗“被迫”停止了下來。

在这段日子里，苏联医生决定将她送到空气更为新鲜的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去休养。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疗养院的医生对待她的态度更加“寒冷”。

医生对她的治疗方法同样是寒冷。

疗养院的医疗人员试图“治愈”她的疾病，让她进入一间特别病房，室内的空气骤然降至零下二十度。

她身上所有的毛孔突然被打开，竟然会“汗”如雨下。

她的视力也开始出现了错觉，她看到的所有图像开始变得模糊和扭曲起来。

她的腿开始发抖，越来越无力。

江青咬咬牙试图坚持下去。

可是她失败了。

她的意志力最终没能抵挡得了极端的物理变性。

她记不得她是怎样在疗养院里从冬天呆到春天，再到夏天的。她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一天，她的医生郑重其事地向她“宣布”说：

“您得的是‘佝偻病’，我们这儿治不好这种病。”

“哈、哈哈……”

江青突然大笑了起来。

江青回忆说，1930年至1940年间在陕北我们有许多的同志都得了这种病。那是因为当时条件不好，缺乏碘和钙。

这下好了，她总算是找到借口可以离开这“该死的”疗养院了。

莫斯科的医生决定采取最有力的方法来对付癌症。

第一，采用钴进行放射治疗；

第二，继续用钴进行化疗；

第三，还是用钴化疗。

超剂量的化疗严重损伤了江青的机体健康。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以至于需要供氧才能呼吸。

第四个疗程时，她戴着氧气罩昏迷在了病床上。

在江青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能体会得到一个即将死亡的病人的心情是何等的哀伤与无奈。

江青怕死吗？

“怕！”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为了真理，为了理想，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她又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多少年之后，在打倒“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的表现是所有的中国人有目共睹的。

就算是“四人帮”，也只有二人是为了理想而“结党营私”的；王洪文与姚文元的软弱表现，连我这个美国人看着都觉得恶心。

问题是，现在的8026.9万名中共党员中，还能有50%的党员可以为真理，为理想，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吗？

可是，作为“个体”时，江青依然是“怕死”的。

而且“怕”得要命。

在个人意志还很清醒的情况下，她向院方提出了二点要求：

第一， 停止钴放射治疗；

第二， 送她“回家”。

要求是一回事，结果又是另一回事。

苏联的医学院，是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如果连江青的病都治不好，这话传出去，只怕是“好说不好听”。

好在江青的“要求”惊动了上面的人，给她换了一名主治医师。

新来的医生除了对江青表示出了多一点儿“同情心”之外，依然无力也无权满足江青的要求。

江青在苏联治病的这几个月时间里，主席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病情。

当毛泽东得知江青想要“回家”的消息后，马上调阅了苏联医生提交的医疗报告。

不久，周恩来总理就到了莫斯科。

总理来到了医院，当面向江青转达了主席的“指示”。

让她安心留在莫斯科，直到身体好转。

另一方面，周总理与苏联政府交涉后亲自到医院查阅江青的医疗档案。并找了前后两名主治医师谈话，了解情况。

江青回忆说，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变得愤怒了起来。

总理直接找了赫鲁晓夫。

不久以后，事情开始有了新的转机。

江青回忆说，能在莫斯科医院见到周恩来总理，最让她喜出望外的不是总理看她来了，而是她可以“借机”向总理打听一下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周总理原本准备了好多的话要对江青说的，可是当总理了解到江青的病情及她目前的真实“状况”之后，就只剩下一句话了：

“转移！”

总理要尽快带她“回家！”

一天，周总理将两个人领到了江青的病床边。

他们是鲍罗丁和程砚秋。

他二人都是文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打那之后，除了他二人之外还经常有另外一些人来医院探视江青。

周总理不常来医院，他得劳神费力与赫鲁晓夫周旋。

没想到程砚秋最拿手的是演哑剧。

他一人扮二人的角色，惟妙惟肖地模仿中共领导人的动作。每每逗得江青捧腹大笑。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之后，江青的病房便热闹了起来。

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却不得不离开医院去别的地方“用餐”。医院不负责给江青的客人提供食物。

那天晚上，周恩来带着几个人再次约见了赫鲁晓夫。

据说，谈判的激烈程度今人难以想像。

赫鲁晓夫顽固的态度连总理都曾一度感到绝望。

江青并不知道这些情况，此时的江青不仅“绝望”而且尴尬。因为她同样没有食物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

她没有卢布。

黑面包、鱼和鸡蛋也都是每天按定量发给她的。

周总理这次来苏联，也没给江青带吃的东西。不过，却给她带来了另一件“礼物”——信。

他妻子邓颖超大姐写给江青的亲笔信。

邓大姐的信犹如雪中送炭，给寒冷的莫斯科送来了一股暖流，也温暖了江青的心。

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但江青告诉我，这封信她一直带在身边。

她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周恩来因国事经印度回国了。

周总理走后，江青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记得刚到苏联时，她的血小板计数是 240,000。自抗癌开始，在放疗过程中不断下降，目前只有 70,000 了。

奇怪的是，每次输血后江青都觉得发冷。然后是麻木，身体无法动弹。

眼看就要成为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了。

这下，可吓坏了苏联医生。

就在江青感到头骨破裂、钻心疼痛，即将爆发的时候，在她再三地“恳求”（为了怕伤中国人的面子，这里我使用的词汇是恳求而不是“哀求”。）下，苏联当局才最后不得不放她走。

在返回中国的航班上，江青的皮下组织开始出血……

5

1951年冬季，江青从中国中部返回北京。

经历了土改运动和宣传贯彻《新婚姻法》这二大运动，江青成熟了许多。

接下来她被安排了更重要的工作，在党中央办公室担任机要秘书。

这种行政工作虽然没有下乡跑基层那么辛苦，精神压力却比她原先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的多。

长期的工作压力加剧了她的疾病。

她开始发高烧，并引发了肝痛。

时任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得知江青的病情后，建议她辞去手头上的工作安心养病。

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中也有人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由，好言劝慰她注意身体！

为了革命的本钱，从那一刻起江青不得不同时辞去了手头的一切工作，包括她在电影管理局、宣传部以及中苏友好协会里的兼职。

有领导人建议她去莫斯科治病。

苏联的医疗设备和医术水平都比建国初期的中国要先进得多。

她别无选择。

但她还是设法推迟了起飞的时间，直到 1952 年的冬天。

初到莫斯科治病的那段日子，在她的记忆中留下的并不全都美好的东西。

她肝痛得厉害，苏联医生决定先做外科手术，可又解决不了胆囊里的胆汁外泄问题。

只好撤销手术方案，改用保守疗法。

于是，她被再次送到南部的雅尔塔。

她经常发烧，医生给她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

结果使她感觉更糟糕。

她的主治医师好象对自己的患者——新中国的“第一夫人”的感觉并不怎么“在意”。

江青的“抗议”也是无效的。

雅尔塔的冬天是单调乏味的，江青越来越想“家”。但是，医生不让她回国。

江青知道苏联人不放她走，并不是想留她多做几天客，而是羞愧于没能治愈她的病。

最后，她被送回了莫斯科，被安置在一所普通的医院里。

终于有一天，幸运之神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她被送进了克里姆林宫的“皇家医院”。

她补充说：

“这是苏维埃政府的高干医院，无论是医疗设备还是医务人员的水
平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天（1953年3月5日），她被转送到了郊区的一
所疗养院。

这里的其他病人，大多是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们更关心的是斯大林的病情，而不是自身的疾病。

人人都表情凝重地“围”着收音机，直到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
领袖逝世的噩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领袖的感情激荡了好几天。人人都沉浸在悲
哀的气氛中。

负责保护她的安全的两名俄罗斯警卫，还有她的主治医师和护士，
好心地给她出了不少“主意”。

让她动员毛泽东来莫斯科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参加斯大林的
葬礼。

她无奈地告诉他们：

“我没有这样的权利。只有中共中央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斯大林葬礼的那天，莫斯科的气温骤然降到了零度。

毛泽东没有来，只发来了一封唁电。

江青仍在重症监护室，和其他病友一起为斯大林守夜。

站在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场上行进着的为斯大林送葬的队伍。

队伍很长，首尾都不见头。

送葬的队伍笼罩在一种极度悲哀的气氛中，人们的哀恸不是伪装出来的，是出自一种对领袖真诚的爱戴。尽管这种爱戴在斯大林逝世后并没有维持多久，但的确是真诚的。

望着缓缓而行的送葬的队伍，江青此刻竟然有了另一种天真的想法：

“将来，我死的那天要是有这么多人为我送行，哪怕他们眼里没有一滴眼泪，我也就可以瞑目了。”

多少年之后的“将来”，江青静悄悄地死了。

没有葬礼。

没有一个人为她送行。

江青眼前突然一亮，将她从遐思拉回到了现实中。

前来向斯大林致以最后的敬意的世界领导人的队伍，正从窗前经过。

她看到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

1896年11月23日—1953年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他领导了捷克著名的“二月革命”。

1948年2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在捷共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的反革命阴谋。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就在这一天，政府中资产阶级政党的12名部长借口内务部长对布拉格公安机关进行改组一事不满，突然提出辞职，企图引起政府危机，迫使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由他们另组新图。

但是他们的阴谋最后失败了。

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总罢工和武装游行示威，针锋相对地跟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

捷共就在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清洗了各政党各群众团体中的反动分子，建立了新的民族阵线，并要求总统同意这 12 名部长的辞呈，由新的民族阵线中推举新的部长来接任。

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阴谋最终彻底粉碎了。

这次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现代史上又称为“二月革命”或“二月胜利”。

接着出现在江青眼前的是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

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1892-1956），波兰工人党创始人之一，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前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无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贝鲁特，他俩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时身体都是好好的，没一点儿毛病。

可能是受了苏联恶劣天气的影响，才病症缠身的。

不仅是他俩，还有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威廉·泽布朗·福斯特。

一个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另一个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美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他俩也同时被莫斯科的严寒击倒了。

江青说：

“主席没有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也就没让病魔缠身，算是逃过了一劫。”

俗话说：

“人算不如天算”。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叫：

“福星高照。”

江青第二次访苏，从1952年冬天到1953年的年末，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点儿时间是不可能让她对这个国家有所真正的了解的。更何况苏联人处心积虑地切断了她与苏联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文化活动是不可能有机会参加的，她也没有其它的娱乐项目。所有阅读材料都是经过官方“精挑细选”的，并且仅限于中国的外交使节。

除了俄罗斯医生、护士和警卫，她接触不到任何一个苏联人。

好在江青身边的这些苏联人都是“好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她）们也喜欢金钱。

一位俄罗斯护士悄悄地告诉她，著名的作家和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的稿费比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部长都要高。他的妻子穿戴的都是一流的服装和珠宝。

护士小姐说：

“他才是真正的首先富裕起来的极少数苏联人中间的一员。”

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 К О Н С Т А Н Т И Н М
и х а й л о в и ч С и м о н о в, Simonov, Konstantin
Mikhailovich (1915~1979)，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生于1915年11月28日，卒于1979年8月28日。曾任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新世界》月刊主编和《文学报》主编。

西蒙诺夫的成名作是头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接着又创作了表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俄罗斯人》。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任《红星报》战地记者。

1943~1944年西蒙诺夫完成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

此外，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

50年代后西蒙诺夫致力于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

代表作为战争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

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是无可争议的苏联军事文学第一人。

他的诗作《等着我》、《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一带的道路》、剧作《俄罗斯人》、小说《日日夜夜》、《洛帕京札记》以及《生者与死者》长篇小说三部曲等作品已经永久载入史册，成为伟大卫国战争的“文学的纪念碑”。

随着战争期间创作上的多方面成就，西蒙诺夫在苏联社会上和文学界的地位越来越高，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初，他已成为苏联文坛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被选为全苏作协副秘书长。

西蒙诺夫用十二年的功夫写成了反映战争题材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

在这三部曲中，西蒙诺夫以切身的战争经历和长期的写作经验，把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策到前线具体的战斗活动，把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苦难同苏军指战员的坚强、勇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一个侧面较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国的全过程。

三部曲获 1974 年度列宁奖金。

护士小姐对他的作品并不感兴趣，她羡慕的是他妻子脖子上的珠宝。

江青说：

“珠宝，其实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人类的一种习惯。珠宝可以价值连城，也可以一文不值。我就不喜欢戴这种东西。”

说着，江青将仅在宴会上露过一次脸的一条项链送给了这位女护士。

于是，她与这位女护士之间结成了牢固的“中苏友谊”。

在与为数不多的几个她所认识的苏联人的接触中，江青开始体会到了金钱的重要性。

尤其是政府人员及其助手，他们要求（索取）礼物的技巧非常“高明”。

由于消费品物资供应短缺，就连病人的“定期服务”也在大打折扣。

“但是……”

江青刻意地停顿了一下：

“责任还是在领导身上，是领导干部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这种歪风邪气。”

虽然 1953 年中苏关系依然是友好的，但她已经开始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有一天傍晚散步时，江青悄悄地溜达到了大街上。

她惊讶地听到附近有人在唱中国《国歌》。

唱歌的人是一位普通的俄罗斯人，一个路人。他并不认识江青，也不可能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当她也是一位普通的中国人。

他非常友善地走到江青跟前，向她问候，并请她转达他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问候。

想不到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竟然会知道“毛泽东”，并对中国充满了敬意。

更让江青想不到的是，话没说完就有一名便衣上来抓住了他，把他拖走了。

“在文化方面……”

江青继续说道：

“苏联早期（1950年）更亲美、亲欧，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苏联的“权贵”似乎更崇尚法语。

无论是在医院或是在疗养院，这种“崇洋媚外”之风无处不在。愈演愈烈。

即便是普通人也比中国人更讲究所谓的“风格”和“颜色”。

有一天，当她站在医院的窗口向下凝视街景时，她注意到一位女士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帽子，与她身上所穿的服装很不协调。而且她还注意到有许多男人都喜欢戴绿色的帽子。衣服也是绿色的。看起来就像是囚服一样。

“绿色，是今年的流行色吗？”

江青心里有些纳闷。

要知道中国的男人是极少有人中意绿色的，尤其是“绿色”的帽子。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江青的眼里闪过一道“狡黠”的亮光。

“不知道。”

我老实作答道。

最终，医院里的其他病患开始注意到她的病号服的颜色与他人稍微有些不同。

虽然同样都是绿色，但的确有些不同。

江青告诉他们，她的衣服包括礼服都是斯大林同志特意为她定做的。

尽管医院定期在为她更换病号服，但还是赶不上她消瘦的速度。

江青微笑着说：

“那些为我定做的衣服的颜色基本上都是以绿色为基调。在苏联，别人不仅羡慕深绿色，也羡慕我苗条的身材。”

俄罗斯的女人婚后一般都会发福，站在她们中间有时江青的确会产生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只是，江青的“苗条”并不是她刻意追求的，而是病魔缠身所造成的结果。

我能听出江青话语中自嘲的口吻。

7

1953年6月15日，当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江青仍滞留在苏联。

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江青是通过外交信件得知这些消息的。

苏联仍然不允许她回国，直到这年的深秋。

经过差不多一整年，著名的苏联医生也没能真正治愈她的疾病。

回到北京后，她仍然饱受急性腹痛的折磨，有时连路都不能走。

她的中国医生发现她的白细胞异常高，而苏联医生恰恰“忽略”了这点。

重新检查的结果表明，她的胆囊、肝脏和肾脏都有毛病。

江青“如数家珍”似地向我陈述着她的病史。

多名中国医生会诊后，决定采取“内外结合”的疗法，即外科手术加特殊饮食的治疗方法。

她愉快地接受了专家的建议，在切除了患有炎症的部分肝脏之后，她的身体逐渐地康复了起来。

江青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见鬼，在中国就能治好我的病。干嘛要跑到苏联去受那一年多的洋罪！？”

从1953年的冬天开始直到1958年，这段日子在江青的生活中是最困难的时期。

她一直卧床不起，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

另外，在这五年时间里她仍旧去过苏联二次，请俄国医生为她作“定期检查”。

1953年冬，江青将她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卧室中。她将书桌搬到了床上，再加一上床被子抵御冬天的严寒。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完成了比去年一年还要多的工作。

她广泛地阅读，特别关注“政治斗争”和“阶级敌人”之类的文章。也就是说，是关注“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

她不断地用收到的来信和新的书籍充实着自己的图书馆，并从中选择一些她认为有用的材料让主席圈阅。

毛泽东喜欢坐在她的床边，听她读报。

有时，电报也拿给她读。

江青有个“坏毛病”，喜欢在读报时加上自己的观点，主席只是笑笑，未加置否。

有时，江青天真的点评还能逗得毛泽东开怀大笑。

1954年2月，躺在病床上的江青同样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主要批判高岗、饶漱石分裂中央。

高岗原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原任中共华东局书记，19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会后，高岗又到华东、中南地区游说，寻求部分高级干部对他的支持，散布所谓“两党论”、“军党论”。

并称“党是军队（即他高岗）创造的。”

同时，他还把私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补充人选传播出去，妄图由他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12月，毛泽东休假，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主席，高岗极力反对，并试图谋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代刘少奇。

12月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

1954年2月6日—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军委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2人列席了全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在会上发言。

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

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

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对高、饶问题的讨论和批判。

1954年至1955年，苏联老大哥变得越来越不“友善”，许多大型援建项目眼看就要无果而终。

江青说，斯大林逝世后，是赫鲁晓夫开创了中苏关系的新纪元。主席对这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毛泽东对他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太好。

毛主席给斯大林来了个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对赫鲁晓夫而言，恐怕连五五开都够不上。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三次访问过新中国。

第一次是1954年9月29日至10月2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

第二次是1958年7月30日至8月3日，没有特殊的意义，只是一次“普通”的访问；

最后一次是195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建国初期赫鲁晓夫对新中国的帮助是巨大的，但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创伤同样也是巨大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 1894年-1971年）苏联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于 1956 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

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文艺领域获得解冻。

同时他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得到改善。

江青因治病虽然去过几次苏联，但唯一的一次见到赫鲁晓夫却是在自己的祖国——中国。

当时的情景，她至今仍记忆犹新。

江青正站在天安门城楼和其他领导同志们一起观看游行。当国庆五周年的焰火冉冉升起的时候，周恩来陪同赫鲁晓夫缓缓地走到了江青面前。微笑着向赫鲁晓夫介绍这位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

赫鲁晓夫很有礼貌地向新中国的第一夫人表示敬意之后，友好地与她寒暄起来。

见他俩有说有笑，毛主席站了起来，缓步走到江青面前，加入到了他们的说笑之中。

随后主席一直陪着江青一起观赏焰火，检阅游行队伍。

据史料记载，在公开场合，主席几乎从未与江青同时出现过。

这成了江青一生最难忘的记忆，也是最珍贵、最幸福的记忆。

最坏的天气过去了。

江青陪同毛泽东一起到了南京。

在那里主席接连开了好几个会议。

正值盛夏，南京的酷暑依然猛烈。

他们小住了几日，便去了青岛。

青岛的气候并不尽人意，每个人都感冒了。当然也包括江青。

担心她的健康，毛泽东让她先回北京。

在毛的再三坚持下，江青最后还是先回北京了。

毛泽东在离开青岛前总结了一下当前的情况，决定将反右运动转换成全国性的运动。

8月8日，在中央委员会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五天后，该运动随着整改活动的开展在全国推出。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

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

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

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

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充分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

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3.9%的单位开展了“社教”运动。

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

四清运动，大体分成：发动和试点；铺开和深入等几个阶段。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开展四清运动的主要原因有：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从认识这一危局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

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 1958 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

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

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

1962 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

“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说：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

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

他说：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

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

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

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

他说：

“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

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

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

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

他明确说道：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

“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

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中国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

因之，此时各地的社教运动部署大多未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而且许多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5]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

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

为进一步了解运动的进展，毛泽东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同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说：

“不是有10%到20%的大队很坏吗？我们真正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

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至少三到四年，不要着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活动猖狂；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了一整套国际国内纲领；此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

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自1963年下半年后，中国的周边形势严峻。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中美两国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

中国国内四清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除“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等问题外，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

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

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1966年5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第十一章 红楼新梦

1

我是在江青的再三“怂恿”下，才匆匆找来英文版的《红楼梦》“扫描”了一遍。

说实话，我看不懂其中的“门道”，更读不懂其中的“玄机”。

不过，江青的诚意还是感动了我。

我决定听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将《红楼梦》读它个三、五遍。不达目的——读懂它，决不罢休！

决心虽然有了。

一个外国人要想真正读懂《红楼梦》——谈何容易？

不过，了解了此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经历后，倒是让我凭空生出了许多的感慨和嘘叹。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

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锦绣”之乡生活中长大的，少年时代过着富贵奢华生活，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

《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

可惜，在他生前，全书没有完稿（也有人认为已经写完，但 80 回后的内容散佚了）。

今传《红楼梦》120 回本，其中前 80 回的绝大部分出于他的手笔，后 40 回则为高鹗所续。

据说，曹雪芹出生后三天，正是久旱逢喜雨，他的父亲曹颀很高兴，就给他起名为“沾”，这个字取自诗经上的“既优既渥，既沾既

足，生我百谷。”，意思细雨溟溟濛濛，那水分如此丰沛足量，滋润大地并沾溉四方，让我们庄稼蓬勃生长。

《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历史上的所谓乾隆盛世，其实在王朝鼎盛的背后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也隐藏着重重的危机。

或许是造化弄人，同样身为作者，曹雪芹爱憎分明，疾俗愤世，为统治者所不容。

而我虽也爱憎分明，却并不疾俗愤世，只是想尊重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第一夫人”。

中国的新的统治者能容得下我吗？

曹雪芹的书虽被人又改又续的，但好歹保住了前八十回。

我只是担心当我的作品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恐怕早已被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人见人憎。

我只想留给亲爱的读者们一句话——用你们的脑子，而不是用膝盖思考问题。

江青请我到北京包吃包住的，临了还送了几幅千金难得的毛泽东的亲笔书画给我。

想想，我能用我的笔丑化江青？

套用一句中国人常说的话——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

良心——中国人现在做事还讲“良心”吗？

江青不懂外语，所以她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她通过读翻译文本竟然对十八或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十分熟悉，并且还能将外国文学里的主人公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微妙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分析。

外国作者中，她最钦佩的人是马克·吐温。

江青称他是敢于暴露社会的不公平的“进步”作家。

即便如此，她接着又批评说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攀爬。

马克·吐温，美国幽默大师、小说家、著名演说家，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作品风格以幽默与讽刺为主，既富于独特的个人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

主要的代表作品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长篇）、《百万英镑》（短篇）等。

他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最知名人士之一，被推崇为“美国文坛巨子”，擅长写具有讽刺意义的小说。

狄更斯是江青嘴里常念叨的外国知名作家之一。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英国作家。

1812年2月7日生于朴次茅斯市郊，1870年6月9日卒于罗切斯特附近的盖茨山庄。

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

江青尤为倾心的是狄更斯晚年作品《孤星血泪》。

《远大前程》，又译《孤星血泪》，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晚年写成的教育小说。

故事背景为 1812 年圣诞节前夕至 1840 年冬天，主角孤儿皮普（Pip）以自传式手法，叙述从 7 岁开始的三个人生阶段。

此小说贯彻了狄更斯文以载道的风格，透过剧中孤儿的跌宕起伏，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看法。

该小说自 1860 年 12 月到 1861 年 8 月连载于作者制作的周刊《一年四季》，百年来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舞台剧。

跟江青呆在一起的日子长了（其实总共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她还是一个性情中人。无论是陪她看电影或是谈论小说，每到动情处，她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每每弄得我这个“冷血”的美国人鼻子也常常是酸酸的。

记得陪江青一起流眼泪流得最多的要数《红与黑》了。

《红与黑》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1830 by Stendhal (Marie-Henri Beyle, 1783 - 1842)）。《红与黑》，司汤达 1830 年著（司

汤达原名玛利亚-亨利-贝尔），1783-1842 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1999 年入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书目。1986 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个人理想藏书之一。

江青说她一直以来特别喜爱的另一部经典小说是《金瓶梅》。在山东省的一个小镇上，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偷偷”地接触过这本书了。

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是不被允许读原文的，他们只能看到删节版。

尽管如此，江青拒绝阅读删减版。

她说：

“我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文学掺假！”

《金瓶梅》是明代长篇小说。成书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 3 种身分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暴露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价值。

《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荒淫无耻、贪婪无厌、骄奢糜烂、勾心斗角的林林总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

“我是半个‘红学’专家。”

江青毫不掩饰地说道。

值得回顾的是，早在 1950 年有关《红楼梦》的争论在新中国的文学论坛上就已经开始了。

1954 年，江青正在家中休养。

当她翻阅期刊杂志时，碰巧注意到刊登在 9 月《文史哲》期刊上的一篇小说。

《文史哲》是上海大学的一份出版物。

文章的作者是李希凡和蓝翎。

两个名不见经传却很有才华的学生。

江青读了他俩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直接推荐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读后，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李希凡，男，1927 年 12 月 11 日生于北京通州，祖籍浙江绍兴，原名李锡范，字畴九。195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4 年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上个世纪 40 年代，北京郊县通州，李希凡是一个普通人家 6 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重病，家境衰落，13 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继而是印刷厂的童工。

逃难、遭师兄欺侮、半饥半饱、投亲靠友……经历着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砺。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

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

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篇文章。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首先，毛泽东看到了，发话了：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

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题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压制革命力量”、而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这是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始料未及的，所以最后他们“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也是正常不过。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辉，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

“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这回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

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

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

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接下来，李希凡的遭遇虽然谈不上特殊惨烈，但又红又正的地位显然罩上了阴影。

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

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的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

“李希凡来了没有”？

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 1976 年“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换大王旗’啊……”

成也江青，败也江青。

几十来来，李希凡始终坚持着他的原则：

骂“四人帮”可以。让我写文章骂江青，“力不从心”！

在李希凡兴衰毁誉参半的故事后面，还掩映着另一个，当初令其一举成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蓝翎，的起起落落。

只不过，二人的境遇似乎总有些“此起彼伏”的对照的意思。

而从一开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笔，最终让两个年轻时的密友到了老年势如冰炭，笔墨开战，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间。

4

多年前的那次有关《红楼梦》的辩论展开之后，江青曾自己进行过调查。

她知道了李希凡第一次将文章提交到《人民文学》的时候，曾遭到胡风和丁玲的拒绝。

接下来，他寄给了《人民日报》，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直到江青亲自出面以主席的名义质询了相关编辑之后，他们才同意转载。

为什么《人民日报》一开始会拒绝刊登李希凡的文章呢？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了另一个“大人物”——俞平伯。

李希凡和蓝翎是二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俞平伯却是顶顶有名的知名人士，并且与文学泰斗胡风和丁玲关系很“铁”。

“大人物”既然发了话，“小人物”的文章自然必遭封杀。

俞平伯(1900年—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

俞平伯拒不服从党在1953年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命令，于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坚持他在20年代初得出的观点。

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

党与俞平伯发生冲突，不仅因为俞平伯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特殊，还由于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那篇文章的草稿送交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些意见，并要求他重写。

俞没有修改，径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并在该杂志发表。

这表明，党的宣传部还没有完全控制各种杂志。

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学刊 1954 年第 9 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1954 年 10 月 10 日的《光明日报》和 1954 年 10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大量的文章和社论对俞进行攻击。

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并引起他的关注。

10 月 16 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压制“两个小人物”很有生气的文章，表示了愤慨，并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之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质问〈文艺报〉编者》和李希凡、蓝翎的新作《走什么样的路？》等文章。

一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始了，俞平伯成了众矢之的；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的矛头也不只是俞平伯了。

客观地讲，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堪称是一位红学家，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也有批注，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

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比如：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视角》一文的作者刘仓是这样评论的：

“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

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自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据当事人回忆，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导性批判文章的作者并不是红学专家，为文只是奉命行事，署名也是上命难违。

因此，出现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倾向是在所难免的。

俞平伯带着老伴去了河南息县，住在东岳集农家。

日后俞平伯先生作诗回忆那段时光，很有情趣：

其一，

茅檐绝低小，一载住农家。

倒映西塘水，贪看日西斜。

其二，

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

塘看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在逆境中能够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于直言，勇也。这的确的确是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的确是位“勇”者，敢跟毛泽东唱对台戏。

但要说俞平伯是位“智”者，未必。

无论是“智商”还是“资质”，俞平伯怎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呢？

这点儿自知之明，相信俞平伯还是有的。

只不过他在某个特殊的时候，说了某句特殊的话，结果被某些特殊的人，推到了浪尖上，稀里糊涂成了时代的“勇”者。

5

俞平伯是个“勇”者，另有一人比他更“勇”。

此人便是江青，只不过她的勇气有一多半是毛泽东给的。

她身体尚未痊愈仍在养病期间，可她却拖着病体“闯”进了《人民日报》办公室，让他们安排刊发李希凡的文章。

《人民日报》就算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违抗“圣”命。

为保险起见，江青直接又“闯”进了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中宣部的负责人周扬和胡乔木却没将她当回事。

嗤之以鼻：

“这是小人物写的东西。这么小的小人物怎么可以批评另一个大人物——俞平伯呢？”

江青虽很生气，却没有将《人民日报》已经同意刊出的消息透露给他俩听。

在她的提议下，毛泽东向政治局提议召开一个专门研究“红楼梦问题”的会议。

江青也列席了会议。

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江青已不记得了。

不过，这部小说已经上升到了“小资产阶级压迫人”及“新兴资产阶级压迫人”的高度，其“伟大”意义也就不难掌握了。

即使俞平伯和胡适之流这样的学者站在了“资产阶级压迫者”的立场，只要文化部以及中宣部的领导人周扬和陆定一的立场不出问题，就出不了大问题。

早在 1920 年胡适和俞平伯就已经“关注”上了这部小说，并将十六章回和八十章回的“原版”搞到了手。

如此珍稀的文稿本应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而他俩却“占为己有”。

解放后，八十章回版本的原稿保存在了北京图书馆。

一次，江青想要借阅，却遭到了拒绝。

此事，一直让她难以释怀。

关于“《红楼梦》问题的研究”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一阵子，见仁见智一直没有定论。

有一位名叫周汝昌的评论家写了一本《红楼梦的新证》的书。

这是一本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涵盖三方面内容：

一、考证了曹雪芹的籍贯、出身、家世、生平等问题，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曹学”；本书征引详博，举凡通史、政书、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等史料无不包涵，以此使读者明了《红楼梦》成书之背景。

二、结合“曹学”对《红楼梦》进行考释。

三、对脂砚斋批、《红楼梦》各版本进行考证，对《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的读者接受给予评价。

本书初版于1953年（棠棣出版社），一纸风行，为海内外所瞩目。

之后于1976、1998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华艺出版社增订再版。

本次再版以1998年版为基础，收入初版第七章“新索隐”内容（2004年修订），仍称“增订本”。

虽然他的观点与胡适有异曲同工之处，书中却大量引用了许多清史中尚未对外公布过的佐证史料，故此书仍值得大家一读。

文革中当周汝昌身陷“牛棚”时，是江青在暗中“保护”了他。

说到这儿，江青很快补充一句：

“此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

江青说，尽管《红楼梦》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但它却是一部生动历史百科全书。书中虽有三、四百个各式各样的人物，但作者的焦点却始终聚集中大约二十人的身上。剩下的全都是衬托，用一句时髦的中国话来说，他（她）们都是绿叶，是衬托红花的绿叶。

已成绝版的八十章回的原版的另一个“无价之宝”是书上留下了许多作者写下的眉批和注释。

可以肯定的是，曹雪芹十八世纪上半叶写下的观点及他的判断，在今日的读者看来依然是非常进步的。

江青接着说道：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历史背景。”

曹雪芹二十几岁开始创作《红楼梦》，前后修改了十多年。遗憾的是他仍然没有完成全书的创作。

他一生命运坎坷，盛极而衰。没有子嗣，续集也是他人借他之名臆造出来的。

作为一名作者，首先有了他的经历，其后才能有他的作品。

曹雪芹不寻求改变社会，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的只是他不满意官僚体系，却不会走得更远，主张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

于是，《红楼梦》成了封建贵族的绝笔。

江青继续说，小说的构思、人物和语言的运用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独具匠心”。

尤其是对具有代表意义的“宁国府”和“荣国府”的描述，更是“别出心裁”。

宁国府的宁国公与荣国府的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兄弟。

宁国公贾演是哥哥,死后他的儿子贾代化袭了他的爵位。

贾代化死后他的儿子贾敬袭了爵位,贾敬有一儿一女,儿子是贾珍,女儿是惜春。

贾敬死后他的儿子贾珍(妻:尤氏)袭了爵位。

贾珍的儿子是贾蓉,媳妇就是秦可卿。

荣国公贾源是弟弟,死后他的儿子贾代善袭了他的爵位,贾代善的夫人就是贾母,史太君。

贾代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是:贾赦、贾政和贾敏。

贾代善死后大儿子贾赦(妻:邢夫人)袭了爵位。贾赦有一儿一女,即贾琏(妻:王熙凤,女:巧姐)与迎春。

贾赦的弟弟贾政(妻:王夫人)有三儿两女,分别是贾珠(早夭,妻:李纨,子:贾兰)、宝玉、贾环和元春、探春。

贾赦的妹妹贾敏即林黛玉的母亲。

史太君是史湘云的姨婆。王夫人是薛宝钗的姨妈,王熙凤的姑妈。

更有意思的是,宁国府位于东面而荣国府座落西方。

荣国府主张“父权”,宁国府支持“母系”制度,他们就像如今的两大政党,都在用最漂亮的口号为争夺“宝玉”而斗得你死我活。

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江青断言,长期以来《红楼梦》一直被人看作是“言情”小说,唯有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它当作了一部“政治”小说来读。

说到这儿,江青的兴致来了。

轻声地吟诵起了第一章中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甄士隐家业破败后，夫妻俩到乡下田庄里生活。

又赶上“水旱不收，鼠盗蜂起”，不得安身，只好变卖了田产，投奔到岳父家。

其岳父又是个卑鄙贪财的人，把他仅剩的一点银子也半哄半赚地弄到自己手里。

甄士隐“急忿怨痛”、“贫病交攻”，直正走投无路了。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到街上，突然见一个“疯癫落拓、麻履鹑衣”的跛足道人走过来，叨念出这首歌。

《好了歌》形象地勾画了传统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家族及其成员之间为权势利欲剧烈争夺，兴衰荣辱迅速转递的历史图景。

江青吟唱完这首《好了歌》之后，望着我笑了。带着些许憨态和得意。

的确，我为江青的博学和记忆折服了。

接着，她将话题转到了刘姥姥和《大观园》上。

刘姥姥是一位具有非凡公关才能的老太太。

见证了贾府兴衰荣辱的全过程。

一进荣国府，刘姥姥小心谨慎，打通关节，与赫赫有名的金陵大户建立关系，二进荣国府，刘姥姥左右逢源，装疯卖傻，演绎着一位公关人士的成功之道。三进荣国府，刘姥姥挺身而出，侠肝义胆，成为《红楼梦》里重要的收场人物。

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会刘姥姥这样的“小人物”感兴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她一定是在这个小人物身上感悟到了些什么。

梦想将来历史能还江青一个清白，至少能还她一个公正。

但愿我这小小的梦想，真能有实现的一天。

6

大部分时间都是江青独自一人在表白。

她说话的速度很快。

容不得别人插嘴。

夜深了。

空气依然很热。

房间里更热。

江青顺手拿过桌旁椅子上的一条白色毛巾，紧紧地绑在了自己的头上，很自然地成了一条三角头巾。

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拍了拍头发，解开吸收了汗水的头巾，拿下来，然后摇了摇头，头发顺势飘扬了起来。

姿势优美极了。

江青无意识做着这连串动作的时候，嘴里并没闲着，仍在继续讲她的故事。

其他的时候，比如说在餐桌旁的时候，她总是喜欢飞快地拢几把头发，然后再将一只白绿相间的塑料发夹别在头上：

“我喜欢它。它很美，不是吗？”

江青是个性格真率的人，从不在我面前掩饰她的审美观。

餐桌旁的江青更加显得热情洋溢。

她喜欢凭着记忆，背诵长段落的诗句。

她喜欢边吃边说，时不时地大笑起来。

她吃饭和说话的动作有时就像个小孩，这让与她同桌的人毫无拘束之感。

一次吃饭的时候，江青示意让卫士送进来一只长方形的盒子。

一只普通的没有印刷和包装的纸盒。

江青接过盒子，像变戏法一样从里面拽出来一条又一条黑色的裙子：

“我喜欢穿裙子。”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夏天穿裙子，很舒服的。”

说着，她将手里的裙子送给了服务员（当然，也包括我。）。

在华期间，我从未见如此漂亮的裙子。不免好奇地问她是从哪儿买来的？

“友谊商店！”

江青脱口而出。

望着我的眼神分明在问：“怎么，你以为在中国就买不到漂亮衣服么？”

友谊商店是中国大陆的国营商店。最初友谊商店只服务外国人、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但今天对顾客已经没有限制了。

在 70 年代后期，当中国最初对外开放的时候，国营的友谊商店开设在主要城市里，作为一个友谊的象征。

商店售卖从西方进口的物品，例如花生酱和好时（Hershey's）巧克力，以及中国的工艺品。价格要比产地的市价高很多，但由于友谊商店垄断售卖进口货，顾客别无选择。

从前的友谊商店只接受外汇兑换券为货币。

货品包括未被审查的西方读物如《纽约时报》，所以守卫会阻止任何貌似中国人的人进入商店。

人群常常会在门外窥看商店里到底卖什么货品。

第二天，江青的两名翻译以及我的两位陪同，全都穿上了黑色的裙子。

从未见过太阳的嫩白的小腿和脚踝暴露在外面，漂亮极了。

显然，她们穿习惯了裤子。所以坐着的姿势总显得有些不自然。

7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江青就教她如何读《红楼梦》。

当然，不是给她讲书中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而是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教她如何来解读这本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

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出生于延安，是毛泽东在47岁时有的，格外疼爱，不忍心送保育院，成了家中唯一在父亲母亲身边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孩子。

据说“鼻子和眼睛酷似她的母亲”，清秀；但“脸型、额头和嘴却极像她的父亲，她的肤色微黄，像她的父亲”，身材较胖“也像她的父亲”。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直接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四清”工作团，到农村搞了一年“四清”。

1966年7月初，她结束了农村“四清”工作来到钓鱼台，住进钓鱼台十一楼，同当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同志吃住一起。

在1966年10月中旬李讷改名为肖力，到平安里3号，踏进了解放军报的大门，穿上了绿军装，以“肖力”姓名，供职于《解放军报》社。

1967年1月13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其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宋琼以及杨子才等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

1月17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肯定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

先后担任军报版面组（一说“中央文革记者站”《快报》）组长、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

1970年初，毛泽东让“肖力”到井冈山那里（江西省进贤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炼。

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

年已三十的李讷，跟“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

小徐是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

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那时候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堂姐夫曹全夫都在这所五七干校，曹全夫是干校的党委书记，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

“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

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

这件事，毛泽东同意。

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

回到北京后，李讷一家住在中南海南部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

李讷的孩子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生产的，为她接生的，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林巧稚。

在孩子生出来后，李讷又回到中南海的家里，对孩子的护理工作，起先还是由马晓先护士来做。

后来，为了更好地照顾李讷母子，中办又找了一位南方的老太太，住进了菊香书屋。

8

十八世纪的花园、诗歌和对女性的崇拜仿佛仍在微妙地影响着江青偏爱南部风格的生活方式。

江青没有《红楼梦》里那样著名的“大观园”，她只是在偶尔去南方“度假”（出差）时，才有机会在珠江之畔的一座小别墅——“兰园”，过上一阵子“奢靡”的生活。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的紧张采访，让我这个从未吃过苦的美国人脸上常常挂着掩饰不住的疲态。

江青敏锐的眼光准确地捕捉到了我写在脸上的“疲态”。

她建议换一换环境：

“为什么我们不去兰园轻松一下午呢？”

兰园是一座郁郁葱葱的神秘花园。

蜿蜒曲折的小径旁边栽种着数百个品种的兰花。数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月亮门非常巧妙地将凉亭、拱桥、人工溪流和池塘连在了一起。

朦胧可视的观月亭里出现了一个朦胧的身影。

江青正坐在廊椅上俯瞰荷塘。

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

但是，在 1971 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

准确地说，从 1971 年 5 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

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

不是。

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

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 1971 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毛泽东常来广州。

初时他的住处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 1 号楼。

以后又在白云山的鸡颈坑为他修了一组房子。

从 1962 年后，连续多年毛泽东未来广州。

这期间，除白云山的房子曾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外，省委小岛的房子一直空着。

两处房子都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这年 3 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由海南岛榆林飞来广州，安排她住小岛 1 号楼。

江青常住这里，那时她对这里环境比较满意。

她一进入1号楼，见这里基本上还是10年前的旧貌，便面有愠色。

而更使她恼怒的是，经过10年发展变化，小岛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宁静。

入夜，不时从江对岸的工厂传来机器轰鸣声和汽笛声，还有江上不断驶过的机帆船的“突、突”声，声声入耳。

“这样的环境，主席来了怎么让他休息！”

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

“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

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

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

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答应天亮之后再走。

江青这一闹，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为毛泽东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紧迫性。

这一闹，也把原来在北京遥控指挥的汪东兴推上了第一线。

4月11日，汪东兴乘专机到广州，稍作停留，即邀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与他同赴海南岛，在陵水军用机场降落后，即转乘汽车去崖县（今三亚市）榆林要塞区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过的“元帅府”，就“元帅府”的维修、改建等问题作了指示，随即与任思忠飞返广州。

4月13日下午，汪东兴在军区大院留园7号同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为毛泽东建房方案。

汪东兴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后，特别提到：

毛泽东对他在北京之外的几处住所，比较喜欢的一是武昌东湖，二是杭州西湖。

武昌的房子设计、建筑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环境好。

军区可以派人到这两地看看，将来在选点、施工时，争取把这两处的优点结合起来。

14日上午，汪东兴由刘兴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云山东麓老虎洞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后到军区初步选定的计划为毛泽东建房的磨刀坑作现场勘察。

磨刀坑是白云山东北的一块小盆地，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东距广（州）从（化）公路约1.5公里。

这里原是广州军区工程兵仓库，周围山上是茂密的松林，远离村落，环境清幽，便于保密，进城却又比较方便。

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水面，而毛泽东又特别爱水。

汪东兴也感到这个地块不够理想，希望军区能尽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时间紧迫，要作两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准备。

汪东兴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当年国庆节。

他说得极为形象、具体：

“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

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

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

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

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

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

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

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

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4月26日，受命专司组织指挥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庆林和邹合典，携带工程设计初步方案和有关资料飞往北京，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作了汇报，经同意后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指定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听取汇报。

28日，毛维忠来到王庆林和邹合典住处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传达汪东兴对方案的审查意见。

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

但是，令王庆林和邹合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汪东兴指示军区的任务还要加码：

在毛泽东住所附近，还要再为周恩来、康生、江青各修一组房子及相应的附属建筑，而且都要在年内完工！

王庆林、邹合典又到京西宾馆向刘兴元、丁盛汇报了汪东兴新下达的任务，刘兴元和丁盛也吃惊不小，感到压力巨大：

据粗略计算，计划为毛泽东修的房子约 1 万平方米，5 个月内完成，已经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 3 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 8 个来月，谈何容易！

更何况，磨刀坑那里地幅不够广阔，安排毛泽东的一组房子已属勉强，现在要修 4 组房子，如何摆布得下？

刘兴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觅新址。

经过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围绕白云山反复勘察比较，最终他们建议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库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库比磨刀坑只多两字，但两者环境、条件大不相同。

磨刀坑水库水面约 1 平方公里，状似一条头朝西南尾向东北的鳄鱼，有六七条较大的分汊。

它与磨刀坑相距不过 1.5 公里，但中间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独立小环境。

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库的最大优点是有一块不小的水面。

这里虽不能与武昌的东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广州市郊，却十分难得；更何况水库四周有青翠的山峦林木，这方面的条件就不让东湖和西湖了。

据初步测算，磨刀坑水库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 2 公里，更兼这里地势起伏，树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所。

经刘兴元、丁盛看过之后，终于决定把计划给毛泽东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库，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这里，周恩来和康生的房子则放在磨刀坑。

5 月 12 日，王庆林、邹合典奉命二次进京。

他们带去了磨刀坑水库一带的地形图和其他有关资料。

像上次一样，还是先由毛维忠听取汇报。

13 日晚，毛维忠再次向王、邹传达汪东兴的指示。

汪对磨刀坑水库环境很满意，他大体赞成军区对建房布局的意见，但是，汪东兴特别交代：

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远一些”。

王庆林、邹合典听后纳闷儿不已。

他俩自然不会知道当年在延安江青新婚之夜过后翌日因“晒红”事件，汪东兴受了主席的“批评”，从此便对江青怀恨在心，终生耿耿于怀，一直在伺机报复！

1972 年后，江青曾多次来这里居住。

这就是江青在广州拥有的一栋“豪华”别墅的由来。

江青见我们走了过来，欢快地从宽大的藤条椅上站了起来迎接我们。

然后继续着她手里的“工作”。

她正在将一株稀有的兰花植物标本放置在一个铺设着吸墨纸的木框架上，然后让两名卫士一起用绳子拉紧四个角。

“你可以拍摄几张我的工作照。”

江青笑着对我说。

我这样做了。

尽管下午的阳光依旧十分强烈，江青还是让卫士打开了强光灯。

突然，她改变了拍摄的角度，背景选择了郁郁葱葱的荷塘。

“现在该轮到我了。”

说着，江青熟练地操纵着手中的瑞士相机和双镜头反光三角架，轻快地按下了快门。

亭子里飘荡着一股淡淡的茶香和兰花的芳香。

不得名的小鸟在花丛中追逐歌唱。

我陪着江青在长廊里漫步，一边观赏着池中的金鱼一边悠闲自在地聊天。

没有事先拟定的议题。

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们谈鱼（池中的金鱼种类）、说马（江青年轻时喜爱骑马），接着又将话题从马转到了人类文明艺术上来。

说着说着，江青有些淘气般地靠在了栏杆上。

瞬间，我俩的笑声混杂在了一起。

突然，她改变了话题：

“吃晚饭前，你为什么不穿漂亮一点儿呢？为什么要选择黑色？”

我向她解释，是小余和小陈向我推荐的这款服装。

“你不应该听别人的。”

她说：

“你应该做你自己的决定。凭你的喜好和感觉穿什么。”

傍晚，我们再次相遇时她穿了一件淡褐色的丝绸连衣裙。我穿了一件相间着红色和白色圆点的上衣和白色喇叭裤。

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我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几个小时之后，午夜时分，我们走进了她的室内摄影室。

在模拟自然环境的一颗巨大的盆栽形成的背景下，她下令打开了人工照明。

“这种光线很难控制，就象是一场‘革命’”。

我同意她的说法。

她笑了。

笑得很灿烂。

我再次拿起了手中的尼康相机，想要捕捉到这难得的瞬间。

“是彩色的吗？”

她问道。

“不是，是黑白的。”

我说。

“我喜欢彩色的。”

她提醒我。

“我知道。”

我说。

她接着补充说：

“黑白胶片更能表现出外貌和性格上细微差别和更微妙的细节。”

她不再说话。

透过取景器，我轻快地按下了手中的快门。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没有披着彩色的外衣，真实的江青。

第十二章 基础奠定

1

“我想永远保持我的政治青春。”

这是江青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说这话时，她自信地微笑着。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已经老龄化了的革命领袖们。

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关心、最头痛的问题，便是领导班子年轻化。

这才有了毛泽东那篇著名讲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个“你们”，自然也包括江青。

“我虽然有病，但我仍在继续工作和斗争！”

江青说道。

“是的，江青同志与疾病作斗争与进行政治斗争一样，都是十分坚定的。”

姚文元及时肯定道。

“你了解姚文元同志吗？你知道他的事迹吗？”

反过来，江青又向我介绍起了姚文元是何许人也。

“他是我党忠诚的文化战士。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江青如数家珍似地夸奖了好一阵子姚文元。

其中特别提到了文革初期，姚文元写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已故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完成的。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些工作成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帮助下完成的。”

姚文元及时地补充道。

不完全是谦虚。

从姚文元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斗争相当激烈。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当时的北京已经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的堡垒。”

所以，毛泽东才不得不离开北京，跑到上海去放第一把火。

江青接着说道：

“整整十九天（1965年11月10日至29日），北京的报纸都拒绝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才在上海出现在第十期的《文学报》上。在最初的二、三天里，他们甚至不允许这种小册子在北京流通！这些人就有这么专横！就有这么大胆！就是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姚文元同志花了7个月时间来完成他的文章，并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去了三趟上海，才将手稿带回北京。”

江青看了我一眼：

“就象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一样。你不感到意外吗？”

事实上，这个故事早就在中国流传有一段日子了。

我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江青时见过姚文元的。这个人当时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有关姚文元其人其事，前文已有交待，此处不再赘述。

但是，正是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削弱了北京党委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宣传部门的控制。

鉴于他的卓越贡献，他被任命为上海《文学公报》以及其他主要报纸《解放日报》的编辑。很快，他又当上了上海的党委宣传部主任。

毛泽东和江青虽然暂时失去了对北京的控制，但是通过姚文元，毛泽东重新掌握了上海的新出版物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新的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姚文元拿《海瑞罢官》向北京市政府的宣传机构打响了第一枪。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

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组织写批判文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了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回忆。

只是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们中活着的人才越来越感觉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及必要性。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评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而姚文元的所作所为是江青一手策划的。

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

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

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

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

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北京市委）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

部长们眼里只有市委领导，毛泽东的话都可以不听，没有把江青当一回事儿，自然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

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

吴晗说：

“没有。”

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

这是 1963 年的事。

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

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

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

这些在 1962 年时都还不成熟。

所以他“就是不明说”。

而江青没有毛泽东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

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

“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

随后她指出：

“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

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

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

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

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

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

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

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

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

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

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

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

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

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

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朱永嘉（1931-），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

1931年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

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

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邦与项羽》（中国长安出版社），注译有《明词汇刊》、《吕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等古籍约五百多万字。

“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

姚蓬子（1891年～1969年），原名方仁，字裸人，后改名杉尊，笔名丁爱、小莹、姚梦生、梦业、慕容梓，诸暨姚公埠人。

曾就学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

次年 2 月，为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之《文艺生活》月刊主编。

1932 年 6 月，与周起应合编《文学月报》。

1933 年 12 月，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

1934 年 5 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被释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

1938 年 3 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同年 5 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

10 月，武汉沦陷，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后创办作家书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

1945 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

1955 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

1963 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1969 年病卒。著有《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

鲁迅先生不多的传世诗作中有一首五言绝句《赠蓬子》，是 1932 年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即兴记事之作。

诗中所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沪上青年诗人穆木天的妻子沈若芸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情。

全诗如下：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诗写得诙谐风趣，亦足见鲁迅对后辈进步文子姚蓬子、穆木天等相当友善。

姚蓬子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常遭儿子儿媳厉言训斥，但比起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他就幸运多了。

他毕竟沾了儿子不少光。1969年他在沪上家中郁郁以终，享年六十四岁。

在朱永嘉与父亲的帮助下，姚文元从此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

“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

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

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

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

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

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

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

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

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批《海瑞罢官》不是江青的“个人”行为，而是经主席首肯的。

那么，江青何以有罪？

何以要被打成“四人帮”？

难道不可以还历史一个清白，将毛泽东也拉进来将他们打成“五人帮”么？

2

江青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京剧艺术的领导。”

这场革命，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外国观察员来说，都似乎是不可理喻和难以理解的。

在我们这些老外看来：

这就是一场“内战”！

问题是，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内战”打得还少吗？

江青承认我说的有点儿道理：

“不过，这场战争使用的武器不是枪杆而是笔杆。主席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就已经提到过就点。”

“是的，这是一场全面的内战！”

姚文元附和道：

“这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江青插话道：

“从1962年到1966年上半年，还不能说已经是全面内战时期。”

接着，江青补充道：

“直到1966年，群众才真正地被动员了起来。那一年我去过好几次北京大学，常常被学生包围。我跟他们说，我很忙，不能一一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有时间，我会邀请你们开座谈会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江青说：

“调查工作开始得更早。”

江青沉思了片刻：

“没错。是 1961 年。直到 1963 年我们才采取行动。1964 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关于京剧改革的演讲。但他们故意篡改我的意思，并且不让我发表。当时，我的话没有任何份量。而且，群众也还没有被发动起来。”

江青继续说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主席就已经肯定了“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

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

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

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

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

可以是只身独鸣；

也可以是聚众和鸣；

还可以是全体齐鸣。

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

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

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

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

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

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

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

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

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

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

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

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

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

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

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任何人都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

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

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

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

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

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

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

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

唯独文革 10 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

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

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

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

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

196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

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

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真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才能触其灵魂。”

周恩来也在大会讲了话，

他说：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1967年1月1日，北京高等院校的几万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愤怒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与书刊，并向全国发出揭批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通电。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事先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央在工作会议上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坚决悔改，与刘少奇划清一切界线，配合党中央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并要求党中央和人民从宽处理自己。

邓小平1966年10月23日中央会议上作的《我的检讨》，内容如下：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

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

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

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

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

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

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

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

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

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

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

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

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

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

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

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

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

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

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

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

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

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

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

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

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

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

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

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

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

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

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

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

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

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

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

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

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4

江青说：

“我不是特别聪明，但我经历了实际斗争。”

接着，她补充说：

“革命者的革命的两手，每每不敌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的两手。”

江青说她通常在这方面总是“笨手笨脚”的。

中共历史上所发生的十次路线斗争，尽管斗争的对象不同，但斗争始终不是目的。

斗争的目的是团结。

毛泽东始终想团结这些跟他有过“路线”争斗的人，可结果依旧是“事与愿违”。

毛泽东曾留下一句话：

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仍旧会继续下去，而且是每五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毛泽东的担心不是不无道理的。

果真后来就有中共领导人想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资本主义金科玉律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

但却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反对。

这才不得不换了一件“中国特色”的外衣，将资本主义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文化大革命快速发展，使江青也很快地进入了全国的聚光灯下。

江青说：

“斗争是尖锐的。”

更多的时候，这样的斗争是残酷的。

这场斗争没有摧垮毛泽东的意志，却损坏了江青的健康。

主席决定，会议一结束就带她去杭州治病。

像往常一样，江青喜欢在空闲的时间里背着她的照相机四处看看。并将她眼睛里看到的满意的风景拍摄下来。

8月15日，他们仍在杭州。

期间，毛泽东曾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

“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在中国的古籍和词书中没有“经验主义”之说。

西方所说的“经验”是哲学范畴，经验主义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哲学。

中国人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个人、集团、政党的“经历”，非哲学范畴。

毛泽东同时还建议所有的领导人都要多读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杭州依旧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只是夏末的空气有些潮湿和闷热。温度上升到了 106 度（华氏），即便开着空调也很难降到 86 度。

江青受不了这里的气候，所以她离别主席，独自去了上海。

在上海，江青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照料他们的小花园。她每天都亲自给花草浇水，然后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观察叶子是怎样慢慢地舒展开来的。

江青患有低血糖，常常晕倒。

可她却偏偏特别喜爱吃糖，吃起糖果来有时简直就是到了不要命的地步。

为了转移她对身体上的疾病的注意力，医生建议她多去看看电影或戏剧。

她照着医生的话做了。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针灸治疗之后，医生让她听毛主席的话：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

江青不仅照做了，而且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15 分钟的太极拳，20 分钟乒乓球，一个小时的台球或游泳。是她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能游 150 米，一个来回中间不用休息。不信？你问她。”

江青的警卫员小赵向我点头，表示她说的是真话。

在江青治病的这段日子里，毛主席花了数年时间整理自己过去写过的文章。

江青说是她第一个建议主席不是通过小册子，而是发布他的选集。

5

江青把话题拉回到 1962 年。

1962 年春，毛主席让江青为政治局会议起草一份文件。

江青此时并非政治局成员。

这是违反常理，也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

直到八月北戴河会议召开后，江青才明白毛泽东何以要打破常规。

1962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6 月 16 日，彭德怀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

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

同年 7 月 9 日和 11 日，邓子恢给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提出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

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等责任制。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即“北戴河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说明，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

为了便于讨论和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成员分为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

会议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再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3人。

8月6日，即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关于阶级。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

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

只有对外矛盾了。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

有什么经验？

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

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

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

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

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

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

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

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

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

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农村合作化要不要？

‘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

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

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的了垮不了的问题。

共产党垮了谁来？

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

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

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

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

又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

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

历代都是如此。

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

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

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

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

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

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

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一些部、委，办事不同中央商量，自作主张，事后不报告的作风。

说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

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

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

打击集体，有利单干。

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北戴河会议，用部分时间讨论了毛泽东上述的讲话，并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在北戴河，江青特意去看了王光美一次，并给她带去了一张天津的报纸。

上面登有厉慧良严格教育子女的文章。

江青低声对她说：

“这回田家英犯错误了，还有陈云呢！”

第二天，江青忽然又派人来把报纸要回去了，说是主席不让谈生活方面的问题。

6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18日回到了仅在1959年回来过一次的故乡湖南韶山冲，住进了他的故乡别墅——滴水洞。

从18日到28日，毛泽东在这自称为“西方山洞”的滴水洞里一住就是11天，在这里构思起草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与《五一六通知》足以相提并论。

因此，它被人们形容为具有“政治遗嘱”性质和“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的信。

信是写给江青的：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

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

当年陪同毛泽东回滴水洞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形成的。”

毛泽东在这封家书中说，这十几天中，“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6月1日，毛泽东除了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外，还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说：

“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6月1日，毛泽东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于是乎，全国局面顿时大变，北京乃至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迅猛地掀起了“革命”高潮。

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在南昌接见江西省委领导人时，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30日到武汉时，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告诉他们本定于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

因为此文是着重论述民主集中制问题的。

这就是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下这封信的背景。

信中的“魏、陈二同志”分别是指魏文伯和陈丕显。

魏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希望江青暂时还在上海住一段时间。

因为他“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即7月12日会见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

沙阿和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信中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和“天才”问题的长篇讲话。

林彪在这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中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他还说：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境和心态，毛泽东本人其实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而且“总感觉不安”，并“历来不相信”。

但是他却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天才论”和“政变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逼上梁山”。

但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违心呢？

他说：

“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就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其实，毛泽东在武汉写好这封信之后，是先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的。

之后，此信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江青。

周恩来看后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

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

因为信中委婉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

毛泽东同意了。

于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的内容。

林彪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了悔悟之意。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保留了一份抄件。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本人陷入极大的痛苦、难堪的境地，此后，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

他始终无法相信，林彪会背他而去？

7

毛泽东在“文革”序幕刚刚拉开之时，给江青写这封信，他这个时候对江青是最信任的。

在 1969 年中共召开的九大上，江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紧接着在第二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江青一边。

但毛泽东没有糊涂。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

江青无奈只好在毛泽东住处最外面的那道门外边等候。

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江青的爱的另一种表露。

八十一岁的老人了，仍在担心自己死后爱妻的“下场”问题。

毛泽东是神，但也是人。

一个普通的凡人。

历史证明，他老人家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方法一直在对江青善意地敲着警钟。

江青的调查工作虽说有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支持，但仍有人对她表现出了不够“尊重”。

其中最突出的是陶铸，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男人。

他不喜欢京剧，而更偏爱广东本土的粤剧。

陶铸早年当过店员。1924年9月，陶铸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同年加入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湘

南学联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所属 34 县的学生联合会），深受夏明翰、蒋先云、刘泰等湘南学联革命领袖熏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1960 年 10 月至 1966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5 年 1 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1966 年 5 月后，陶铸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66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1964 年 6 月和 7 月，江青将改编后的京剧直接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上演。

由文化部授权并在中央委员会的鼓励下，为新的戏剧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邀请江青在近期对全国各地戏剧改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篇关于京剧革命问题的文章。

此次文艺调演可说是盛况空前。

来自全国 19 个省市的 28 家文艺部位带着 37 部新剧目参加汇演。

其中 33 部是描述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的。

宣传部长陆定一，对江青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毛泽东对江青搞的这一套却似乎相当满意。

刘少奇公开持反对意见。

周恩来持保留意见。

彭真市长则来的更加干脆：

“一群穿着开裆裤，还在吸吮手指头的娃娃在舞台上乱蹦乱跳。”

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只要资本主义改革之风不再乱吹，现代修正主义就占领不了上层建筑！”

那个时候，江青同志的形象和声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十分陌生的。

她的《讲话》被推迟了三年才得以出版。

直到 1967 年 5 月，才刊登在党刊《红旗》杂志上。

为什么？

因为她的“敌人”（男性权威的反对者）篡改了她的原文，并拒绝交官方讨论。直到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可以出版。

在那篇文章中（在我的此次采访中，江青并没有送我她写的这篇文章。而是早些时候，从她的助手那里得到的。）她对艺术领域和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要求建立健全的上层建筑，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文章中，她列出的一组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全国有 3000 家影院公司（不包括业余剧团和未经授权的公司）。其中，大约有 90 家是现代戏剧专业公司，80 多家艺术院团，其余的有超过 2800 家公司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歌剧或地方戏。

可是，占据这些歌剧舞台的除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便是牛鬼蛇神了。

至于那些现代戏剧公司，他们宣传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工农兵。他们更喜欢搞一些长篇连续剧、外国戏剧或是一些个古装戏。

在我国有超过六亿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而地、富、反、坏、右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分子。

糟糕的是，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而恰恰是为那些极少数人服务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问题，那就是文艺应该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只有当无产阶级占领了我们的戏剧舞台，才能解决文艺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我们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我们穿的衣服和我们生活中住的房子是工人的劳动结晶；解放军战士日夜守卫着我们祖国的疆土，可我们的舞台上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的艺术家都在做些什么呢？

这些艺术家总是挂在嘴边的“良心”究竟在哪儿呢？

当务之急是要在歌剧中“培养出一些标兵”。

江青亲自抓“样本”。

很快便搞出了几个样本戏。

其中有《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

虽说只是实验阶段，可当国家领导人看了这些“样板戏”之后，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更是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许。

江青是在上海搞出这几出“样板戏”的，自然离不开上海市领导人柯庆施的大力扶持。

江青笑着对我说：

“柯老最喜欢我拍的牡丹了，向我要了好几回。可照片我一直没有送过去。”

江青的语调突然变得沉重了起来。

她摘下眼镜，拿在手中沉默了好长一阵子。

江青突然萌生了要将现代话剧《红色娘子军》改编成京剧的想法。

她第一个征询意见的人是田汉。

江青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上海支部就结识田汉了。并一直保持着对他的敬意与好感。

江青邀请他和他妻子来家里吃饭。

席间，跟他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他同意了，还做了一些善意的补充。

可是，数周后他的态度变了。

这让江青觉得非常恼火。

京剧《红色娘子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刘少奇曾偕妻子王光美当面向江青表示祝贺。

当时，刘少奇主抓的“四清”运动，正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平日里共和国的这两位“第一夫人”鲜有来往。

王光美的贺词着实让江青感动了好长一段时间。

江青继续说道：

“1966年春季，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了。”

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定性为“二月逆流”文革初期的那场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大批党内元老感到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同时亦自发的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

而此时受毛泽东信任的江青，并不能被这些元老认可。

刚刚被毛泽东推向权利斗争中心的林彪，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和党内失势元老站在了对立的一面。

在 1967 年 1、2 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 2 月 14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挺身而出，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

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

要不要稳定军队？

并怒斥了江青。

2 月 16 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经江青过目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3 月 1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批评。

从 2 月 22 日起至 3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 7 次政治生活会。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江青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1967 年 2 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2 月 16 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

谭震林气愤地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

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

他说：

“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江青说：

“你敢再说一遍吗？”

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

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

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

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

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他说：

“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

“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杭州会议之后，彭真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江青忿忿言道：

“北京的党组织已经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堡垒。连主席都成了‘局外人’！”

这座堡垒的寨主便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早在文革之前，江青就已经领教过彭真对她的敌意。

至今，她仍记得她是如何去拜访他的“市委会”，请示他批准将传统京剧改革成革命样板戏的。

市委会什么也没说，就将她的《报告》压下了。

直到晚些时候，1965年李宗仁回归北京时，在毛主席为他举办的晚宴上，江青才有机会再次见到彭真。

晚宴上，江青鼓起勇气找到彭真，请他离开一会儿宴会厅，有事儿要向他请示汇报。

单独与他步入会议室后，江青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解起了如何将社会主义艺术引入到传统的京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江青一时间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合时宜地拿上海做了个例子。

说上海的张春桥是如何如何地支持她的这一革命行动的。

在上海市委的鼎力支持下，芭蕾舞剧《白毛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她说到这儿时，彭真的脸上再也挂不住了。

他一把夺过江青手里的《报告》，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她的请求：

“这里是北京，不是上海。还轮不到你说话！”

江青受了委屈，只能到主席跟前告状。

主席听了江青的哭诉后，没有好言相慰。

但毛泽东的眉头却紧紧地皱了起来。

是啊，彭真说的没错，江青没名没份的，哪里有她说话的地方？

大概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决心将一直在身后默默无闻地全身心地支持他工作的妻子从幕后拉到台前来。

第十三章 水中学泳

1

毛泽东说过：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江青，同样如此。

江青不但有才，而且有理想。

套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江青她也有梦。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梦就是：

“为世界上所有妇女的解放而牺牲！”

江青年青时所写的《为自由而战而牺牲》一文
全文抄录如下：

真是怪事！

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

尤其是称为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生命。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好像是一个五月天气。

舅舅特地从乡下赶来，送给我一个很美丽，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因为那种雀子叫起来像铃一样的清脆脆动听。

我快活的不知怎么样才好，忙着弄这个，弄那个给它吃，可是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不但不吃，而且满笼子飞扑。

母亲等舅舅走后，逼着我放它。

不过，那时候我任性的很，哭着，闹着不许放。

可怜的小东西，在我家过了一夜就死了，连水都没有喝一口。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太残忍了。

剥掉了它的自由，最后逼它走上死路。

一个雀子尚且为求自由死了，那么人，尤其是受着重重的束缚的妇女，当然更应该勇敢的去争取自由了！

自由神可以说是我们妇女争自由的一段记录。

在那里边我扮演一个女兵，她就是为争自由而牺牲了。

但是这种牺牲并不是个人的，无目的的，而是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牺牲。

牺牲的代价——最后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这篇文章无声地证明了在中国人民争取妇女解放运动中，江青同志也曾呐喊过，并为之奋斗过。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受到共产党官方媒体的赞扬。

有可能，其他领导人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识还没有彻底改变到足以接受让一个女人站在权力的颠峰？

毕竟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握有最高权力的女人——武则天和慈禧留给人们的记忆并不是十分的完好。

在古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人文环境下，女人很难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而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却不得不说是奇女子，她们凌驾于所有男人之上，统治国家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即便与有作为的男性君主相比也毫不逊色。

武则天的历史功劳是世人所公认的，虽然她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争权夺势算尽心机，但是无论如何她在治世能力和战略眼光上都堪称为帝王之典范。

而对同样处于权力颠峰的慈禧，却并没有受到像武则天那样的后世敬仰，因其丧权辱国的行径，至今仍为人们所唾骂！

毛泽东曾说江青，“无武则天之德，亦无慈禧之才。”

但是，江青有爱。

她热爱人民、热爱党。

她热爱自由。

她对毛泽东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终身不复！

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除非有人瞎了眼，才视而不见。

2

在共和国所有的开国元勋中，江青至少要比他们年轻十多岁。自延安时期成为共产党的“第一夫人”以来，三十年间她从未涉足过政坛。

现在即便是已经解放十多年了，在一个男性依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新中国，有她的立足之地吗？

离开毛泽东的庇佑，她到底能走多远？（实践证明，这段距离几乎等于零。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是他们分别代表着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之争。

参与这场争斗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且还将影响整整的几代中国人。

江青从幕后走上前台，三年多过去了。

自然，她的言行总是能得到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过，她付出的努力却是双倍的。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总是围绕着江青，而一般的历史学家他们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挖掘”历史真相上面。

反而，一些“激进的”或“过左”的故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并进而添油加醋达到贬低她的目的。

我想要一张江青六十年代中期的照片。

她答应我了。

不知什么原因，却一直没有提供给我。

或许是她有所顾虑，担心将自己的私人照片提交给外国人会影响她在革命样板戏中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

这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反过来说，她连一张自己的未经公开发表的私人照片都不肯送给我，她又如何能向我提供“国家的机密文件”呢？

真不知道某些“人头猪脑”的有心人是怎么想的？

他们脑子里是进了水？

又或是别有用心？

谎言说一千遍，的确能蒙蔽许多人。

却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1965年的中国，名义上毛泽东虽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而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头衔。

真正统治新中国的是三架马车，且并驾齐驱。

刘少奇及其忠实的追随者控制着党和首都。

林彪则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毛主席说：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江青要想“革命”，必先“做官”。

想要“做官”，光靠毛泽东的裙带关系是做不到的，至少需要三人中的二人以上同意。

共产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江青没有选择刘少奇，因为他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毛泽东闹斗争。

江青选择了林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并在这之后的十年中一直保持着这种亲密关系。

从此以后，她从固步自封的“北京城”跳了出来，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自由自在地行动。

当年在延安与毛泽东新婚时中共领导人强加于她的“不平等条约”所谓的《约法三章》终于被打破了。

而且是被毛泽东亲手打破的。

江青这才从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妇女解放”。

林彪正式将上海武装部队的文艺工作交付给了江青。

林彪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出席会议，江青从不迟到。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最喜好的服装是男式军装。在面对士兵的时候，她脸上总是挂着谦虚的笑容，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贤妻良母”型的那种中国传统式的女人。

最近几年，江青的健康状况虽严重地阻碍了她的工作，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

可以肯定的是，她起草的十中全会的报告在送交毛泽东审阅之前就已经反复修改了三遍。

她提醒大家，《报告》的重点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清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她亲手用笔在《真实的写作》、《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的深化》、《中间人物》和《反对火药的味道》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下划下了一道黑线。

另外，她还对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文学评论家柏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

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

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

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

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

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3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

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

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

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

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此件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两篇著作，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并先后同刘志坚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

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

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

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

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

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

但是，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问题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

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

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宣传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

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

它有力地证明：

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

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

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

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

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

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

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

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

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

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

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

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

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

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

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

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

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

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

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

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

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

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

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

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

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

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

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

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

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

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

《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

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

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

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

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

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

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

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

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

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

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

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

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

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

《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

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步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

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

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

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

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

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

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一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

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

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

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

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

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

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

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

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

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

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

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

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

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

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

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

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

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

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

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

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

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

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

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

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

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

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

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

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为了庆祝革命军队的成就，江青决定以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为题材创造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江青呼吁：

“我们要在当年参加这场战役的指战员们还活着的时候来宣传他们。”

江青打了个比喻：

“写《辽沈战役》就要在林彪还活着的时候写。等他死了再来写，就很难保证作品的真实性了。”

江青接着强调道：

“要有群众基础，要走群众路线。”

“我们必须改革写作风格，提倡写短的、受欢迎的文章。要将文学和艺术批评当成匕首和手榴弹……，要敢于刺刀见红，近身肉搏。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可以解除固步自封的文学和艺术批评。”

江青的话，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战士的斗志。

他们拿起笔当刀枪，向封、资、修的旧传统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四个月后，军委正式向江青下达了任命。

据江青自己回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台指导剧作家、演员和舞蹈家们。她曾努力试图改变这些人的政治思想观点。

她做到了。

在很短时间内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毛泽东决定暂时离开北京——新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领着其他几个领导人直接去了农村搞实地考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

然后，在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他又去了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向江青谈及了他正打算发起的下一场运动的初步设想。

早在 1965 年，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过，他有些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经受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斯诺说道：

“因此，在未来他们可能要否定革命。”

（后来中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的担心并不是不无道理的。）

江青回忆道：

“从 1966 年 5 月下旬开始，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研究年轻人的问题。”

江青对我说，她特别关注的是有关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和北京大学的新闻报道。

2 月江青刚刚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

初夏时她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忙。

5月，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委员到了杭州。

不久，文革小组宣告成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28日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主要组员有姚文元、王力、陶铸、关锋、戚本禹等人。

此时，它的主要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

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同年8月由江青代理组长。

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中央文革小组停止活动。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规定，各级文革小组应由群众选举产生。

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任免地方领导干部的大权。

因为在此前成立的省级革委会，都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均以党、政、军和中央文革联名批准。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谢富治等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占据了政治局的半壁江山。

党的九大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大会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

与此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5

江青回忆说：

“7月18日，主席从上海回到了北京。”

原本毛泽东是打算让江青陪同他一起去北大的，可临时有事（好象是越南出了点问题，她已记不太清楚了。）去不了了。

江青决定自己一个人去北京大学，去看看学生，顺便阅读一下学生们写的《大字报》。

当她将自己的决定向刘少奇汇报时，刘听了一笑，也不置可否。

于是，江青很快地与陈伯达取得了联系，领着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去了北京大学。

在校园内，他们一行人见到了聂元梓及其他七名北大教授联名写的《大字报》。

《大字报》张贴在一栋明清时代的建筑物的正面，十分醒目。

江青的突然造访，让学生和老师们都惊呆了。

北大校园立马轰动了起来。

彭真闻讯即刻派人协助校长陆平在校园维持秩序。

江青与师生们交谈了几个小时后，带着她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回到了主席的身边。

1966年8月和9月文革运动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被中共领导人称之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年学生们都行动了起来，全国大部分的中学和大学业已停课。大约一千三百万学生离开他们的父母身边，利用他们所能利用上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公共汽车、卡车和火车，绝大多数甚至是步行，朝着他们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前进，前进进！

这便是文革历史上著名的“大串联”。

早在 1966 年 6 月初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

“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

8 月 4 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会议上说：

“最近每天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若是一些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联。”

8 月 18 日，毛泽东对红卫兵大检阅。

毛泽东是个诗人，他的浪漫气质使他选择了大检阅的方式来发动群众，而大检阅确实也使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

大检阅后，各地红卫兵纷纷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

“我们也要到北京！我们也要见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联轰轰烈烈兴起，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接见了，被怂恿，被煽动。

大批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虔诚地等待毛泽东的接见。

然后，他们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往神州大地的四面八方。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此《通知》中说：

“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

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 50 名学生先出革命教职工代表 1 人参加。”

“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 10 名学生先出革命学生 1 人；教职工按每 100 名学生先出革命教职工 1 人参加。”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红卫兵步行串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

社论说：

“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愿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社论进一步激励青年学生：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他们决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而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

“我们青年一代，一定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传统，继承下来，千秋万代传下去。”

在中央的支持下，全国各大学、中学的红卫兵立即掀起了步行串联的高潮。

6

对江青来说，1966年的夏天是一个特别漫长炎热的夏季。也是一个特别忙碌的夏天。

她和她的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已经习惯了通过杂志或闭门会议来交换意见。

但是，自从毛泽东公开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江青”这个与世隔绝多年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8月6日上午，她在首都的文化中心之一的天桥剧场向一群红卫兵小将作了一场特殊的演讲。

当满脸稚气双眼充满斗志的红卫兵小将向江青提出：

“我们要打倒‘走资派’，可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也是‘走资派’，怎么办？”

江青明确地答复他们：

“当父母是革命者，
他们的孩子可以继续革命。

当父母是反动派，

他们的孩子应该起来斗争！”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中轴线前门大街南端，东临市内最大的森林公园——天坛公园，与自然博物馆隔街相望，南有先农坛，护城河蜿蜒而过，北与琉璃厂文化街相连，西接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团，与正乙祠戏楼、湖广会馆等文化社团相互辉映，被誉为新世纪北京南城的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在剧场的前面，一个占地 20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形成了京城又一新兴的文化中心区。

天桥剧场始建于 1953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剧院。

8 月 6 日下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小组成员穆欣受周总理的委托，接见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及河北大学来京参观的全体同学代表，举行了座谈会。

江青陪同出席了座谈会。

张春桥：是哪几个大学来的？

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

张春桥：什么时候到的？

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么。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么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么做？

张春桥：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

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

张春桥：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么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么不一样？

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你们的革委会是怎么选的？

（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

张春桥：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

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

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

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

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

张春桥：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

（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么办？）

张春桥：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么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么办，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

张春桥：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

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

这种论调是错误的。

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么烂了呢？

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

穆欣：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

张春桥：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

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

张春桥：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姜平的时候，让姜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

张春桥：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麼结合，辩论怎麼结合？）

张春桥：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麼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

张春桥：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

张春桥：贴在哪里都可以。

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

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

张春桥：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

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

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

你不说话，怎麼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

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

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

张春桥：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

张春桥：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

穆欣：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

张春桥：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

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

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

从同学来说，你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

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吗？

《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

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

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

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麼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

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

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8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前两日，江青与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以及张春桥抵达北京工人文化宫，参加首都革命师生举办的大规模集会。

面对成千上万的身着统一的绿军装的学生们，江青充满激情地向孩子们问候：

“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致以革命的问候！”

姚文元连声称好：

“你们要在暴风雨中见世面，而绝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接着，姚文元领头唱起了：

“大海航行靠舵手……”

康生非常重视学生们的反映，并总是在第一时间将他所掌握的材料及时反馈给江青。

比如说，康生问学生：

“你们想学习《十六条》吗？”

学生：

“是的。”

康：

“你们真的想了解这个文件吗？”

学生：

“是的，是的！”

学生们齐声回答。

康：

“你们想学习、学习、再学习，反复地学习它吗？”

学生：

“是的、是的、是的！”

学生们的情绪开始兴奋了起来。

康：

“你们想抓坏人吗？”

学生：

“想！”

康：

“你们敢于坏人坏事坚决做斗争吗？”

学生：

“敢！”

康：

“你们敢在自己的学校里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吗？”

学生：

“敢、敢、敢……！”

学生们反复大声疾呼。

康生和江青后来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夸奖学生们的自我革命精神。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决定共分十六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

决定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决定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决定申明：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

决定强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决定说：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决定还就教学改革、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等作了规定。

决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

谈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江青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席话是：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的变种。它们并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虽然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也仅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经典著作。

他们（资本主义作家）虽然创作了一些模仿“经典”的作品，但也仅仅只是一此刻板的陈词滥调，不但不受人民的欢迎，而且正在被人民所唾弃。

另一方面，有一些东西却真的涌入了市场。比如说摇滚、爵士、脱衣舞、印象派、抽象主义理论、野兽派和现代主义等等。

总之，这些颓废和淫秽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就象毒药一样在侵蚀着人民的思想。”

什么是摇滚？

什么是野兽派？

在江青的那个年代，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恐怕对此并不了解。

江青一直在担心这些资本主义的产物有一天真的会涌入中国，毒害中国人的思想。

摇滚（Rock and Roll）是一种音乐类型，起源于 1940 年代末期的美国，1950 年代早期开始流行，迅速风靡全球。

摇滚乐以其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表达情感，受到了全世界年轻人的喜爱。

摇滚乐并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形成一股热潮。

“**摇滚**”是一种流行音乐风格，起源于二十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的美国。

最初的摇滚乐是黑人布鲁斯、福音音乐、爵士乐与乡村乐的结合。

摇滚乐的元素可追溯到 20 年代的布鲁斯和 30 年代的乡村乐，然而其在 50 年代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音乐风格而广泛流行。

“**摇滚**”则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伴随摇滚乐诞生而发轫的一系列思潮和文化运动，它植根于摇滚乐，但却不仅仅局限于摇滚乐这个音乐风格。

比如 60~70 年代的嬉皮士（爱与和平，摇滚乐影响力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70 年代末的朋克和无浪潮（No-Wave）、朋克之后的新浪潮（New Wave）（在文学等其他艺术上也同步出现）、90 年

代初英国的锐舞文化（以电音为主要载体，涉及政治的一次青年运动，也被视为摇滚文化的一个分支）。

整个夏天江青都在四处演讲，宣讲革命形势。这让她感到有些吃力。为了弥补自己文化上的不足，她发誓一定要加强学习。

毛泽东说过：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江青决定到工作中去学习，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她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北京市京剧一团。

北京京剧团建于 1955 年 12 月，是由马连良领导的马剧团和谭富英、裘盛戎为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二团合并组成的。

建团初期以老生、花脸戏为号召，旦角戏则由青年演员李世济、罗蕙兰担纲。

1957 年 1 月，张君秋为主演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合团，马谭张裘开始合作。

他们除上演各自的代表剧目外，还联袂主演了《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秦香莲》及新编的《赵氏孤儿》等戏。

1960 年 12 月，赵燕侠领导的北京燕鸣京剧团并入该团，至此形成了名噪一时的马谭张裘赵“五大头牌”。

1964 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该团推出的《芦荡火种》（赵燕侠主演）和《杜鹃山》（马连良裘盛戎赵燕侠马富禄主演）大获好评。

1966 年“文革”开始后，该团被改组为“样板团”。

北京京剧团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戏曲表演团体，该团不仅拥有京剧大师马连良、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还有老旦泰斗李多奎，丑角名家马富禄及一大批各行当各流派的精英，如老生陈少霖（余派）、谭元寿（谭派）、马长礼（马派兼杨派）、马盛龙、高宝贤等；武生杨盛春、黄元庆、杨少春等；小生茹富华、刘雪涛、闵兆华、徐韵昌等；旦角李世济（程派）、小王玉蓉（兼演荀筱两派）、李毓芳（梅派）、任志秋、赵丽秋等；老旦何盛清、耿世华等；净行周和桐（郝派）、张洪祥、郝庆海（裘派）等；丑行慈少泉、李四广、郭元祥、钮荣亮等。该团上演剧目之多为各大剧团之首，其影响波及海内外，即便是由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张云溪、叶盛兰、杜近芳等名家组成的中国京剧院，或是周信芳领衔的上海京剧院也难以望其项背。

北京京剧团堪称京剧第一团。

却也是当年北京市委重点把持的一个单位，堪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说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江青到了京剧一团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划分敌我，鼓励青年演员跟着她在表演艺术上“闹革命”。

对于某些冥玩不化的老演员，她总是以身作则教导青年学员：

“首先要尊重他们，然后再改造他们。”

她再三强调：

“革命不是要打击别人，而是要在思想上击败他们。武力斗争只能触及他们的皮肉，只有思想斗争才能触及到他们的灵魂。”

11月28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预下北京市京剧一团正式脱离了北京市委的管控，回归传统。

当然，此事的背后离不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帮助和支持。

江青回忆说：

“我们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所有成员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各自喜爱的专业。但必须服从解放军的指示。”

对我来说，这事听起来就像是五角大楼突然接管了纽约市的大都会歌剧院和所有其他表演艺术团体。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迷恋文化的政治角色。

六十年代中期，江青和毛泽东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已经意识到在文化领域，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刘少奇占据了主导地位。

刘少奇宣扬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的是“全民文艺”和“从各个层面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

而毛主席则教导我们：

“文学和艺术，应该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作家和艺术家应该深入到工农兵之中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1966年3月12日，北京《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冗长的影评。

捉刀人是该报总编著名作家穆欣。

标题是“剖析30年代著名京剧《赛金花》的革命思想”。

穆欣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他写的文章自然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江青的授意。

穆欣，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20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

1946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特派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社长、云南分社社长，志愿军第三兵团农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

195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劫后长忆》等。

穆欣写道：

即便是三十年代的《赛金花》也比1950年夏衍写的剧本《武训》更具有革命性。

《赛金花》和《武训》前文已有交待，不再赘述。

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革命总是与妓女和土匪，要不就是与叫花子纠缠不清呢？

尤其是现在的影视剧，无论是电影又或是电视剧，题材无一不是“妓女”或“土匪”。

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共产党当年就是依靠这些个妓女和土匪起家“闹革命”的！

而主管宣传教育的达官贵人们，除了会做梦，难道对此就没有一点儿清醒的认识吗？

9

“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这是江青 12 月 19 日接见十万解放军战士时的开场白。

为了接待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红卫兵），需要解放军出来维持首都城市的秩序。

“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主席的身体健康。让我告诉你们，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江青说得十分动情，几乎是声泪俱下。

接下来，陈伯达大声宣告：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像你们这样的军队！因为这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任何敌人，无论是帝国主义、又或是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革命势力所无法战胜的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领导下，这还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陈伯达的讲话，得到了会场的热烈响应。

“长征精神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江青喜爱法国文学和法国电影，江青的兴趣并不在羡慕和追求法国的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对她影响更大的是 1871 年法国爆发的那场轰动全球的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法语：La Commune de Paris）是一个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正式成立的日期为同年的 3 月 28 日）到 5 月 28 日期间短暂地统治巴黎的政府。

由于评价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它的描述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也有人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被认为标志当代世界政治左翼运动崛起光辉起始里程碑，影响广大深远。

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它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无政府主义。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

它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著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

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

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

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是 Jo 布吕阿的《1871 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 79 期（1972 年 4—6 月号）。

巴黎公社对中国革命的直接影响是导致了“一月风暴”的爆发。

一月风暴这一称呼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被称为一月革命。

由张春桥、姚文元指挥的，以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为开端的全面夺权风暴，并由于毛泽东的赞扬导致全国掀起了夺权之风。

1967 年 1 月初，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风暴”的序幕。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于 1 月 8 日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取代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

1 月 8 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

安亭事件指称的是 1966 年 11 月 10 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 14 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小时（一说三十小时）的事件。

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夺权“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

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山东（2月3日）、黑龙江（1月31日）、贵州（1月25日）等省纷纷夺权。

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攫取了相当部分党政大权。

被攫取了党政大权掌握在了“革命委员会”的手中。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

1968 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

毛泽东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

“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这半句“革命委员会好”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

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度过了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革命委员会”终于完成了各省市的“夺权”。

当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江青十分清楚这点。

于是，她向毛泽东进言，并在得到主席的首肯之后决定在军内成立了“中央文革第二小组”。

一如既往，江青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向主席汇报，从不越雷池半步。

1966年12月22日，江青去了北京中学接见了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们。

江青对学生们说：

“你们的政治觉悟很高，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在许多方面，我还做得很不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呢？那就是他必须是一个不害怕接受批评和能够进行自我批评的人。”

她告诫孩子们：

“要团结，要文斗不要武斗。”

从延安一路走来，经历了多次“路线斗争”，江青始终反对对党内同志进行“暴力”斗争。

就在同一天同一时间里，邓小平同志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检讨。

邓小平一生虽作过多次“检讨”，却从不“翻案”。

当邓小平声嘶力竭地高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时候，一大群不明事理的中共党员却跟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后面稀里糊涂地咒骂：“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

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发展和深化，更主要的是因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在国民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这三大方面发生了历史性突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即明确提出：

“抓革命，促生产。”

接着，他又强调：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与其他一切工作的关系高度概括为：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同时他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大庆、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以文化大革命带动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下面简要介绍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在三个方面的所发生的历史性突破。

国民经济，天下甫定。

毛泽东立即作出“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迅速治愈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而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便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经济发展：

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

塑料增长 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 33.8%，油料增长 61.6%。

在工业交通方面。

1965 年开始并持续到 70 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 2050 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

1972 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 200 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 26 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叁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

从 1966 年到 1978 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 18.6% 的速度增长，1978 年突破 1 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 8 产油大国，

原油加工量比 1965 年增加了 5 倍多。

在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文革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

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 5.7 倍和 65 倍，农业用电增长 4.7 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 4.9 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 2.1 倍。

1977 年和 1965 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 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 355.58% 和 643%；

1975 年全国机井数比 1965 年增长 935.89%。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 1976 年与 1965 年相比，成灾面积由 53.9% 下降到 26.9%。

据相关专家介绍，至今中国水利设施的 80% 还是 1970 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应当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林县人民用自己血汗开凿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创造的人间奇迹。

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文革十年，中国的各项关乎民生的社会事业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以医疗卫生为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便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大决策。

到文革结束时候，合作医疗遍布中国农村，赤脚医生跑遍山山水水，开始从根本上解决历朝历代中国农村缺医少药、广大农民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问题。

教育、文化、科技。毛泽东十分尊重工人农民等一切体力劳动者，同样十分尊重专家学者等一切脑力劳动者。

他历来主张，工农兵要向知识分子学习理论文化，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实践经验，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文化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科学实验必须面向人民群众的需要。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的教育、文化、科技事业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时代。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体育、智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是教员出身的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提出：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是最懂教育的。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我的知识基础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奠定的。

那个年代，中国实行的是真正的免费教育，根本不存在老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

整个文革十年，除了运动发动初期一度“停课闹革命”外，毛泽东很快就要求大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

废止旧的高考制度，鼓励工农兵上大学，这是毛泽东改革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一项伟大探索。

当时明确规定，中学生高中毕业劳动两年以后可以报考大学，原则是：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其中“群众推荐”这一条，主要就是针对“走后门”的，只有劳动和各方面表现好的才可能被群众推荐。

当然，极少数“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也在所难免。

一件新生事物，一项伟大探索，要求它一开始就完美无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代表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大诗人毛泽东认为，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文艺和一切文化工作都应当无条件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毛泽东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高度评价鲁迅，称鲁迅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激情澎湃地说：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是全面实践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十年。

有人说，文革期间，批判封、资、修，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堪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历来主张批判地继承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他都要身体力行地学习借鉴。

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全盘否定人类文化，这纯粹是一种恶意诽谤。

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大革命。

在他看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时是陶冶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新文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作品，无论小说、戏剧、电影，还是其他，几乎每一部都发挥教育人、激励人、提升人的质量、净化人的灵魂的作用。

比如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比如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比如现代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比如电影《火红的年代》、《青松岭》、《闪闪的红星》、《创业》、《龙江颂》《海霞》、《南海诸岛》、《珍宝岛不容侵犯》等，……文革期间诞生的许多歌曲、戏剧等，有些是完全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是最重视科学技术的，他始终将“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并列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大革命运动。

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成就，仅仅以尖端技术的空前突破为例。

1966年5月9日 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6年10月27日 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

1967年6月17日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23日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12月26日 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

1973年8月26日 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5年11月28日 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成果为以后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最充分的基础条件。

至于说文革十年是中国“闭关锁国”的十年，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值一驳。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愿意同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但是，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新中国一直采取封锁打压的强盗政策。

善良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在开国前夕那气壮山河的名言：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从新中国诞生到1965年，有47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并保持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继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决策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文革十年中，全世界共有 40 多个国家与我建立外交关系或保持正常关系。

仅 1972 年一年，中国先后同 18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无论是建设、教育、文化、科技，还是外交，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伤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绝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倘若毛泽东在世，面对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的严酷现实，即使美国人给他一座金山，他也绝对不会拿几十万亿人民的血汗钱去交“投名状”，打死他也绝不会干这种事！

从如上三个方面的历史事实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彻底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健康向上，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中国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任何计较。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为中国劳苦大众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一切的毛泽东，必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

1967 年 1 月 10 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开会时突然话锋一转，严厉批评起了陶铸：

“陶铸是个‘两面派’，他竟然胆敢将文革期间的一张几位领导人合影的相片上的陈毅的脑袋较下来，安放在邓小平的脖子上。这是什么行为？”

江青仍不解气：

“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原本只是陶铸的无心之作。

只是想开开邓小平的玩笑，写什么劳什子“检讨”？

陈毅从来就不写检讨，红卫兵批斗他时，他就昂起脖子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红卫兵问：

“在《毛主席语录》第几页？”

陈毅回答说：

“在《毛主席语录》第七十七页。”

《毛主席语录》有许多个版本，最普遍的版本是七十六页。

红卫兵中有人找到江青，想核实此事：

“毛主席他老人家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江青答复：

“确有此事！”

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赞誉陈毅，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陶铸敢将陈毅的脑袋“切”下来，江青能不生气么？

就在几天前的1月4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陈伯达说：

“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北京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

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立即刷出了大标语：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凌晨2点多钟，周恩来得知陈伯达、江青点了陶铸名，陶铸的大字报已经上街后，立即打电话要陶铸来西花厅一趟。

周恩来说：

“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才知道”。

陶铸问：

“主席知道吗”？

周恩来摇头说：

“不清楚”。

沉默了一会儿后，周恩来又说：

“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对主席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

周恩来把陶铸送出门时说：

“歇一歇，先不要工作了”。

陶铸一怔，神情黯淡地离去了。

1月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人开会，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

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康平铸、胡痴。

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注：相当于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在会上谈到了陶铸问题，他的话很快被当时众多的红卫兵小报和传单作为“最高指示”登出了。

毛泽东两段关于陶铸的话是：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刊登有毛泽东这两段话的红卫兵传单后，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这句话，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

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估计可能毛泽东说的是“不老成”。

于是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并且附去了那份传单。

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道横杠，并打了一个“？”，退给了曾志。

曾志这才知道，红卫兵传单上所录的毛泽东的话，原来是真的。

至于那个“？”是什么意思，她就猜不透了。

1967年是江青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年，忙得一年中没时间打一场牌。

1967年是江青刚刚当了“官”（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那一年，满脑子想的全是革命，既没时间也没空间与陶铸发生什么“私人恩怨”。

在1967年，江青除工作和开会外，就喜欢看戏、看电影。

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有时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

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

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

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调片和放映。

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

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的人一起请来。

如果这些人没来，就要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江青 1967 年看的片子主要是国产片，其次是香港片子，看外国片子倒不是很多。

“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

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妆舞会（化妆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

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周恩来有时也参加。

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于是有人称她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

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但他并没举出依据来。

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杜近芳曾经在一篇约 6000 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 20 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敬爱的”，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杜近芳，女，京剧旦角。1932 年生于北京。从 1951 年起成为国家演员，在中国文化部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实验京剧团工作。

与李少春、叶盛兰等固定合作，曾随团到多国演出，与李少春共同主演的新编历史（古装）京剧《野猪林》（饰演林冲妻子张氏）在 1962 年由崔嵬、陈怀皑合作拍成彩色京剧电影。

后来经江青本人修改，文章在 1967 年第 9 期《红旗》杂志发表时，把“敬爱的”三字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

文章这样一改，就低调些了。

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

“《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

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

接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

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

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这句话是毛泽东在 1960 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

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

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

“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

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

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

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

“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有人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严厉，但她并不是整天板着面孔。

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见了你总要问好，当然你也要注意问她好。

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

陪她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也叫老工人养大了。

江青说，

“师长到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再认女儿了”。

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

对于电影，江青是内行。

江青不高兴的时候，对工作人员特别严厉，稍不如意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

江青还怕声音，怕光，怕风，怕见生人，和林彪差不多，只是没有林彪那么怕得厉害。

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

1961年起，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

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

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

她在一次散步时就跟我说：

“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你把这个意思可告诉东兴同志。”

说实话，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也有点难侍候。

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都经常带着她的厨师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就江青的口味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

那时，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但实权在江青手里。

当年红卫兵就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

王力回忆也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

陈伯达“凡事都得看江青的眼色”。

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都得耐着性子等。

开会时，经常是江青包场，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

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分歧，江青就叫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

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等，直到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

“文革”初期，好像陈伯达因身体不适而一度住院，工作由江青代替。

1966年8月底，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这个通知一发，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依据、更名正言顺了。

一次，在十一楼会议室里，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

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一声长叹。

“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

江青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爱推脱责任这个弱点。

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

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

毛泽东说肖华还是要保，陈伯达吓坏了。

江青这次教训他，也是给他打气。

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

“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

后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

在 1966 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

1966 年 8 月 18 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前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由于建国后毛泽东没有穿过军装，一时还找不到合体的制服，只好将 8341 部队一个身高体胖的警卫干部制服拿来凑合了。

这一穿，就穿成了“文革”中的军服时尚。

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

江青说：

“这几幅赠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给老夫子（指陈伯达）。 ”

林彪话很少，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叶群说：

“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

“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叶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经历可以证明。

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

“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

或者说：

“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

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说：

“我代表林副主席……”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那时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多，还不断有“样板戏”演出。

事实证明，那时江青和叶群的关系确实密切。

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

叶群早早去了，后见江青没来又要离开，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悄悄离开了。

叶群回到毛家湾跟工作人员说：

“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对江青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孤单呀！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

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溜了！”

从这件事，也可清楚地看出叶群对江青的态度和心理。

叶群还经常送给江青一些东西。

当时毛泽东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

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的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的西瓜。

应该说，1967年的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是蜜月期，虽有些分歧和矛盾，但还是过得去的。

13

有一次，坐江青的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车上江青跟我说：

“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远新亦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

她接着说：

“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即主席也可以‘轰’。”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

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泽东，都是单独去。

〰〰〰

李讷、毛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李讷、远新还到车站去接。

毛泽东对子女要求很严的。

毛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解放后，他妈妈朱丹华（已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

毛远新在北京读的小学、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

“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

他还到延边造反，参加过那里的武斗。

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是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

有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扶着她进楼的警卫员孙占龙：

“李讷住这里吗？”

孙占龙说：

“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

江青不高兴地说：

“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

孙占龙没说什么。

大概是 1967 年的五六月份，毛泽东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拥宋任穷派和拥陈锡联派的联合问题。

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

有一天，江青从外边回来，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

“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要当好……”

江青也许是刚从毛泽东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这也说明，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转移的。

1975 年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时，江青叫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整理一下，列个目录出来。

毛远新列了个目录给江青，江青看了后说：

“你只列了文件的名字，其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啊！”

毛远新说：

“江青显然是叫我把每份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或摘要。这件事很费时间和功夫，我没答应。江青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个事，希望我给她做。主席在江青这封信上画了一个圈，没批什么话。我就去问主席，并说明我不愿做的理由。主席沉重而又缓慢地说：‘你帮帮她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做第一件事时，全家牺牲了六口人；第二件事没做完，倒搭上了夫人江青的性命。

江青打算离开北京，哪怕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不用走多远，只要能远离受彭真控制的北京市委就行。

江青决定去工厂、去农村，与真正的革命群众——工农分子打成一片。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抛弃个人利益，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国家利益。

在上海各种各样的“公社”（革委会）如雨后春笋般地争相冒头的数周时间内，江青并不在上海。

她在北京。

1月2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一次集会上，就清华大学发生的“暴力革命”的问题，她公开谴责了这种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呼吁革命小将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此时，在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最活跃的女性并不是江青，而是王光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夫人。

江青与王光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各自的丈夫绝对忠诚。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

作为“第一夫人”，江青从来没有以“国家形象”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

而王光美却陪同国家元首——她的丈夫刘少奇先后出访过雅加达、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缅甸。

1967年4月10日，被江青誉为“造反英雄”的学生领袖蒯大富组织了一个三十万人的大型集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校园。

参加陪斗的有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重量级“走资派”。

第十四章 逆流勇进

1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挨学生批斗二天过后，4月12日，江青发表了肯定和赞扬学生们的“革命行为”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

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

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

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好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

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

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

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

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

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

还是弱呢？

是弱了。

武斗总是少数人。

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

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

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

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

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

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

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

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

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

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

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

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

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

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

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

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

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

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

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

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

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

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

还是搞分裂好呢？

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

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

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

没有风头主义？

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

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

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

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

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

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

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

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

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

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

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

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

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

要在全国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

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

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

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

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

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

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

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

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

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

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

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

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

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

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

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

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

同志们不要上当。

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

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

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

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

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

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

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

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

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

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

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

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

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

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

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

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

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

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

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江青的话不长，却语重心长。

江青的话就算放在今天人们也听不腻。

江青明明说了：

“不要武斗、不要武斗、不要武斗！！”

文革开始后，整整喊了一年。

可有人就是不听。

不但不听，还别有用心地将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过激行为”，统统算在江青的账上。

这种人天生仇视毛泽东、痛恨江青，也就罢了。

可还有些人人云亦云，莫明其妙地痛恨江青、稀里糊涂地咒骂“四人帮”。

这种人不是碰见过鬼，也是被鬼摸了脑壳的。

江青始终当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当然，某些时候她还是毛主席的“耳朵”兼秘书。

去年以来，她才正式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秘书。

事实上，整个文革期间所谓的“文革小组”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

真正的权威机构，依然是“常委会”。

换句话说，依然是党的领导，而且依然是党的集体领导！

而文革小组他们的工作好比是哨兵，顶多是个参谋人员。而且是个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的小参谋。

他们的日常工作只是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会的成员提供参考和建议而已。

当然，江青也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根据自己的好恶，从她阅读过的报纸和杂志上挑选一些引人注目的“好”的或“坏”的材料，提交给毛主席阅读。

江青回忆说：

“主席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要以说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当然，毛泽东不会手把手地教她做任何事情，而更像是她的“严师益友”。

有时候，江青的确表现得非常“天真”。

江青接着说道：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是属于‘沉默’类型的人。他平时不太爱说话，只有谈论政治、经济、文化、国际舞台、国内事务的时候，他的脑子马上异常活跃起来，有说不完的话。

有时候，我们也谈及到“小道消息”（各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谣言），但这种情况不多。

.....

从小道消息获取的信息，偶尔又是非常真实的‘内部消息’。

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当我研究某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坚持下去，并且完成它。”

江青倒也有些“自知之明”。

江青还告诉我说，毛泽东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讲历史故事给她听。有时候还会对故事里的事情做一些解释。主席常讲的故事是一些关于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农奴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的必要条件等等。还有就是关于土地的重新分配必须待续进行下去的问题。

关于他们自己，江青说他们代表的不是剥削阶级，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劳动阶级）。问题是如何好教育下一代，使他们不要忘本。

毛泽东始终担心下一代共产党人会逆行倒施图谋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的同志比任何一个朝代中的历史人物都拥有更大的权力。

权力催生腐败。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江青说：

“权力，就是给你用的。现在，人民给了我们很大的权力、优越的地位。如果我们不能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长时间停滞不前，你说，人民还会信任我们吗？人民还会继续将他们手中的权力放心地交到我们（共产党人）的手中吗？”

江青接着打了个比喻：

“比喻说陈伯达吧，他总是喜欢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可是当真正的老百姓将权力交到了你手中之后，你就已经不是‘老百姓’了。”

江青认为是文化和教育的主导作用在塑造人民的意识，而人的思想品格和能力直接受文化和教育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在过去的十七年里会犯错误，是因为有数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承”了我们的政权，而他们始终与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江青说：

“任何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要想抓住政治权力，首先必须施加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必须承认，在过去我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

江青说：

“孩子们不应该被视为‘私有财产’。”

她还说：

“应该将他们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只关爱自己的孩子，必然会忽略他人的孩子，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孩子。

以我们的孩子（李纳）为例吧，她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跟我说，都是让他们读苏联人肖洛霍夫写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

我问她：

‘你想让我也看这本书吗？’

‘是的，妈妈。’

我告诉她，这是一部苏联的历史书或者说是苏联战争的历史书。但这并不是一本好书，因为书中将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当作英雄来歌颂。

‘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每个人都说这是一本好书。’

她批评我不该说这本书的坏话。

我告诉她，我读过这本书，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父母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的孩子，我们不应该用封建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

毛泽东在家里就很民主，允许孩子跟父亲顶嘴。

有时候甚至故意让他们顶嘴！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不尊敬他们的父母。

对孩子们而言，“争论”是有好处的，可以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是的，爸爸。’

‘好的，妈妈。’

唯唯诺诺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吗？”

外间传闻毛泽东在家里实行的也是“民主制”。

江青的这番话，使我得到了证实。

3

江青回到北京三天后，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喜的日子。

她参加了谢富治主持的一个庆祝大会。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谢富治是公安部门的负责人，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江青在庆祝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今天，我是早晨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盛大的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临时告诉我，要我来说几句话。（鼓掌）

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红卫兵小将们，（鼓掌）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鼓掌，群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我想不出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我心中的喜悦。（鼓掌）

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鼓掌，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

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鼓掌，群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鼓掌）暴露了敌人。（鼓掌）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鼓掌，群众高呼：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解放军做后盾。（鼓掌）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工应该欢迎，（鼓掌）服从领导。（鼓掌）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鼓掌）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鼓掌）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

伟大红旗，胜利前进！（鼓掌）

我的话完了。

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1960年代，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可以在公众场合单独发表未经政治局讨论并同意发表的政治论文或演讲。

江青是一个例外。

1967年的春天她开始成为一种精神崇拜对象而受到人民群众的“顶礼膜拜”。

凭她个人的独立工作能力是很难获得如此殊荣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的光环照耀下产生的。

1967年6月，南京工学院的红卫兵就曾撰写过一篇文章，对江青大肆赞扬。

文章的标题是：

《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为江青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的诗。主席这首诗气势磅礴，震撼山河的千古绝章抒发了一个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同时，我们认为，这又是对江青同志的最全面最完美最

深刻最形象的写照。我们今天重读这首气贯长虹的诗，心潮无比澎湃，久久不能平息对江青同志无限崇敬的激情。

如果说“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向全世界宣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的开始，那么中国京剧革命现代戏的第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却是揭开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宣告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战斗的新文艺的诞生；迎来了我国工农兵文艺舞台上百花盛开的春天！

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踏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上前人没有攀上的高峰、攻克了旧文化中最顽固的堡垒，闯出了无产阶级新文艺的明朗春天。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文艺高峰一览无限风光，豪迈地回头来看资产阶级的文艺高峰，只不过是几堆低矮的沙丘而已。那真正光辉的，无产阶级文化新时代就在面前！多年来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但江青同志的革命斗志更加旺盛。最近江青同志又发出了这样的豪言：“我的雄心壮志——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希望同志们努力。”

敬爱的江青同志呵！我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衷心地祝福您。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祝您把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更高！

接下来各种颂扬江青的文章接踵而来，一发不可收：

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空前壮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敬爱的江青同志，迎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搏斗的暴风骤雨，驱妖雾、战恶浪、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江青同志，完全无愧为文化革命的光辉旗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党的杰出女干部。江青同志，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反动的围攻锻炼出坚强的左派，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江青同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充分体现了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凡的智慧、气魄和襟怀。

在三十年代，江青同志就像鲁迅那样，勇敢地向迫害、压迫、造谣诽谤的人反攻，向假党员、叛徒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作英勇的斗争。在延安时代，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紧跟毛主席、紧跟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战争岁月里，参加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她大无畏地不懈地向大叛徒、大特务刘邓等作英勇斗争。

在文化革命的序幕阶段，尽管刘少奇及其死党怎样摧残和扼杀，江青同志继续高擎革命的红灯，冲破重重阻力，亲自指导、培育出了文艺舞台上的八个样板戏，开拓了毛泽东时代工农兵文艺的春天！

光芒四射的“座谈纪要”，又极其沉重地打击了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气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文化革命中，江青同志更是处处打头阵，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立下了关键的四大功勋：文化革命初期，江青等同志领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并坚决支持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勇敢地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为文化革命立下了第一功。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月逆流为刘邓陶这一小撮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翻案、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时，江青同志挺身而出，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揭露了这一小撮人的痴心妄想，击退了他们的翻案逆流，为文化革命立下了第二功。

一九六七年春夏，当王关戚反党集团炮打周总理，阴谋毁我长城，从极“左”的方面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时，江青同志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揪出，为文化革命立下了第三功。

对待江青同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拥护还是反对中央文革，是赞成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问题。

正因为如此，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才拼命地、起劲地攻击、诽谤文化革命的光辉旗手江青同志。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反动派如此仇恨江青同志，不正更加显示出江青同志是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吗？

不正更加证明江青同志是革命人民最知心的人吗？

一切革命人民无不热爱江青同志、崇敬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

谁想陷害江青同志，我们就叫他吃不开、叫他人头落地！

我们正告一小撮躲在阴沟里不敢见阳光的变色龙、小爬虫们，革命人民决饶不了你们，等待着你们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和毁灭性的打击！

向文化革命的光辉旗手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原文题目：《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

作者：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学习！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是我党的好党员。

自“九·一八”参加革命以来，战斗了几十年了。

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大资产阶级集团进攻延安时，江青同志紧紧随毛主席南征北战。

全国解放后，江青同志一直作毛主席的秘书，紧跟主席思想。

在延安时，她就进行过京剧（当时叫平剧）革命的大胆尝试，演出过《平型关》。

49年她就组织文章批判以梅兰芳为代表的守旧派反对京剧改革的错误主张，迈出京剧革命的第一步，创造了现代京剧的经典。

同时与刘少奇针锋相对斗争，禁演《拾玉镯》《游凤戏凰》等坏戏。

50年，坚决执行主席指示，几次提出要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

为了批判《武训传》她亲自组织专案调查组，跋山涉水，深入山东作调查，回来后她指示：立即编演京剧《宋景诗》，但刚出世就被周扬一棍子打死，五四年江青同志根据主席指示亲自到人民日报要求转载“小人物的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63年支持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文章，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批示：

“白底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是为训”。

同时与党内老革命柯庆施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在上海组织对大毒草《李慧娘》《有鬼无害论》的批判。

经过激烈斗争后，64年召开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同志发表了充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讲话《谈京剧革命》。

66年2月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写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纪要》。

同年11月28日在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吹响了“砸三旧”“立四新”的进军号。

京剧革命成为这次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在这场攻坚战中，英勇的旗手就是江青同志。

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她向共产党人发出号召——“为人民立新功”，体现了一个真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

即使被关押，在修正主义的法庭上受到非人的暴力待遇，她仍然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一幕幕斗争的历史，记录了江青同志的革命功勋；一曲曲革命造反的战歌，震撼着三山五岳，激励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友们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的理想继续奋斗和前进！

4

江青对摄影的爱好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在紧张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中，江青还面对着疾病带来的恐惧及煎熬，只有摄影能让她得到慰藉。

“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多年后，杜修贤在回忆作品《中南海摄影师亲历：江青的红都女皇梦》中，这样评价江青的摄影才艺。

江青对摄影的爱好尽人皆知。

“文革”中，林彪夫人叶群曾夸她：

“江青同志既是个政治家，又是个艺术家，她拍的照片，人物多漂亮，所有的层次都有了，呼之欲出啊！”

“她摄影技术相当不错，喜欢用侧逆光。”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一段时间，她迷上了拍花卉，经常4点钟就爬起来拍牡丹，摆弄好器材，有时还在花上洒点水，就等太阳出来的一霎那，拍出那种晶莹剔透的效果。

1971年7、8月合刊《解放军画报》曾以大海、峻岭的署名发表了一些江青的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月夜哨兵》，外人还以为是江青深入部队生活的杰作，其实是她用高度感光胶卷拍摄住处的警卫。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见过江青很多摄影作品，称她拍摄手法很巧妙。

有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取出一张总理坐着的照片给杜修贤看，说这是江青照的，问他照得怎么样？

这是杜修贤第一次见江青的摄影作品，觉得用光很不错，追求线条纵横交错的立体感觉和深邃透视的意境。

总理夫妇也有同感。

“如果抛开性格不谈，就论她的摄影技术，还算不错的。”

多年后，杜修贤在回忆作品《中南海摄影师亲历：江青的红都女皇梦》中，这样评价江青的摄影才艺。

江青学摄影始于1962年。

整个50年代，江青一直为疾病所折磨，多次到苏联治病，还做了子宫癌手术，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

这使得她本来就任性的个性更加乖戾、暴躁。

世界上最孤寂的人，就是伟大人物的妻子。

作为女人，这时候的江青非常需要丈夫的呵护，但身为第一夫人，她个人的情感需要又必须让位于国家政治生活，只能独自沉浸在更年期的心烦意乱中。

为了调剂生活，摄影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江青的精神世界。

1959年和1961年两次庐山会议，江青都上了山。

她游离于高层紧张激烈的权力斗争之外，沉溺在庐山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对风光摄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江青这时还需要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她选景、对焦距，她只是按动快门。

她拍的庐山风景，因为毛泽东的著名诗词《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而声名大噪。

这个意外的成功让江青充满了激情，对摄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兴趣。

庐山归来，江青开始拜师学艺，决定请在摄影界享有盛名的石少华当她的摄影老师。

石少华时任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对江青乖僻的个性早有耳闻，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江青的邀请。

后来还是毛泽东出面，将石少华请到了菊香书屋。

“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做学生吧！”

毛泽东对亲属子女要求很严，很少给她们提特殊要求，这次他态度很诚恳。

“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

看得出来，毛泽东支持江青学摄影，主要还是为了江青的身体考虑。

如果能有一样业余爱好作为她的精神寄托，可以分散疾病引起的恐惧和紧张。

初学摄影，石少华给她的第一个科目是深入生活，多拍有人的场景。

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经常到天安门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她还觉得北京太小，希望到各处拍拍。

这可给身边的警卫人员出了难题。

在中央办公厅领导的授意下，石少华调整了江青的拍摄主题，让她多拍花草鱼虫、树木庭院等静物风景，重点掌握画面的层次感，注意曝光准确，取景角度新颖。

江青机要秘书杨银禄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北戴河为了拍海上日出，江青经常三四点钟就出来选好位置，还要等有霞光时才拍，如果当天有点云雾，她会收拾起器材，很扫兴地离去。

这些题材后来成为江青摄影作品的主要内容。

她喜欢拍风光、静物、日出、日落，还有湖面月亮的倒影。

1964年国庆节的夜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她还向时为总理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虚心求教，如何才能拍摄出焰火的最好效果。

在这些作品中，有江青比较得意的女民兵、庐山仙人洞，这些都是毛泽东题过诗的；还有一张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面用红色铅笔题词，全文是：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诗赠维特克夫人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这首诗，“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诗”，也有人说是江青自己写的，至今尚无定论。

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得意、自信以及咄咄逼人的气势，很值得玩味。

对江青来说，摄影这时不再仅仅是艺术技巧、精神享受，不可避免地附加了很多政治元素。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给林彪拍摄了一张捧读《毛泽东选集》的免冠照片，起名叫《孜孜不倦》，发表在当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署名“峻岭”。

据在江青身边目击拍摄全过程的杨银禄回忆，这只是政治高层人际交往中的一次普通活动。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6月8日，叶群来访，江青拿出自己的摄影作品请她欣赏，闲聊中江青说起想给林副主席照张像。

第二天，林彪应约而来，竟然连胡子都没刮，他平时不修边幅，很少洗澡、洗脸，也不刮胡子。

江青毫不客气地请他刮胡子，林彪虽然很不情愿，还是借杨银禄的刮胡刀，既不用热水湿敷，也不抹香皂或剃须膏，直接干刮，刷刷作响，而林彪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林彪手里捧读的《毛泽东选集》，也是在江青坚持下，让杨银禄临时找来的。

为了照这张相，平时怕光、怕风、怕热的林彪任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甚是狼狈。

拿到冲洗放大的照片，江青又找来姚文元、叶群一起商量刊发事宜。

姚文元说：

“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

照片发表后，叶群还给江青打电话：

“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江青对曲艺界有着用无法言语表达的钟爱情怀，因此，紧张的忙碌后，她会选择看一部电影、一场戏来放松。

在这么多曲艺界的大腕里头，江青对京剧大师程砚秋是情有独钟。

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北风嗖嗖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撒着零星雪花。

大约九时左右，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到达17号楼礼堂，特意赶过来和姚文元等一起观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影片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还说什么话。

放映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地看得津津有味。

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聪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过头去对江青说：

“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看看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

“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越来越入戏、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泪流个不停。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

可是，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吓得走出礼堂。

于是他们走上前去询问、安慰：

“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江青为何对程砚秋如此喜欢呢？

据说程砚秋认为江青是一个“知音”。

有次江青对程砚秋说：

“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

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

程砚秋曾很兴奋地说过：

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

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

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

除了对自己的偶像会留下感动的热泪，江青对自己的部下也会流下少有的泪花。

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也蛮细。

1971 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谢富治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有一天，他到钓鱼台 10 号楼对江青说：

“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 10 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听说后一再对他加以褒奖表示感谢。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在 10 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江青有段时间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

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症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

她说：

“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

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韩桂馨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手背上露着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弥漫着恬静纯朴的神气。

她回忆——

1947年9月30日，我17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几天后。傅连璋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去吗？”

“愿意。”

我很激动，感觉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讷，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不是高小毕业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璋同志说着，拿笔写了几张纸，把注意事项全部写清，还特意关照说：“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搞好关系。”

后来我得知，傅连璋所言“这一摊”其实只有卫士组三名卫士加上我这名阿姨。

江青在延安以及转战陕北期间，是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唯一的一名女性，主要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对此不满，有牢骚。

政治局常委先后几次提议给她较重要的职务和工作，毛泽东都行使主席的否决权加以否决。

直到 1956 年，毛泽东才同意江青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样，成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是帮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国际新闻。

记得那是 1947 年 10 月 3 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第一次见到江青。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

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

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髻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

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

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和李讷，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

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讷说：

“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李讷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

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

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

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

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

“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讷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

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

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

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

“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

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

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

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

对于我这个 17 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

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

“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

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

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

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

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

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梳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髻。

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

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

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

去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

她说：

“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

当时，毛泽东正在农村搞调查。

我在黄河边的南河底村见到了毛泽东。

虽然我在延安也见过毛主席几次，但这次见面我仍然惊讶得目瞪口呆。

生活中的毛泽东与公众场合出现的毛泽东是多么不同呵！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

毛泽东这样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

抱起李讷亲着，拍打着后背，拍一下喊一声：

“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了！”

李讷就喊：

“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

她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

我看到毛泽东眼圈红了，湿漉漉的。

晚饭，毛泽东一家三口在一个饭桌上吃。

那时河西由于胡宗南的 20 万人马烧杀抢掠，又吃又毁，粮食极端困难。

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天天吃咸水煮黑豆。

这天晚饭是吃用黑豆压扁的“钱钱饭”，李讷吃得还挺香。她忽然问：

“爸爸，为啥吃饭那么香，拉屎那么臭呀？”

大家都笑了，江青说：

“吃饭怎么说起拉屎了？多脏多恶心哪，不要说了，吃完饭再说。”

毛泽东却不在意，说问得好，并且给李讷详细解释了食品营养和人体消化、吸收以及排泄的道理。

毛泽东对女儿的疼爱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饭后他对我说：

“阿姨，以后你就带李讷吃大食堂吧。”

我有些发怔。

大食堂一天两餐咸水煮黑豆，连皮都不去，大人吃了还光放屁拉不出屎，肚子胀得难受，一个小女孩子怎么受得了？

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望望江青，江青大概不好出面说话，但是眼神已把意思表明。

李银桥就劝道：

“孩子才六岁，还是跟妈妈一起吃吧。”

毛泽东把手臂弯着，大手由里向外一挥：

“陕北老乡的娃娃吃黑豆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只此一句，大家全闭了嘴。

以后我发现，毛泽东说定了的事，轻易不允许别人再反对。

第二天，我带着李讷，随毛泽东和江青转移到杨家沟，在那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

6

江青说：

“革命——总是对别人很容易，对自己革命却很难。”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自我革命的主题上。

江青接着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暗面和阳光的一面。如果你不能摆脱自己的阴暗面——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落伍了。”

什么是“阴暗面”？

江青的解释是小群体心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不听任何人的话。

自然，他们也不会“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至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抗拒共产主义思想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己打败自己是最可悲的失败，自己战胜自己是最可贵的胜利。”

做人最难的是超越自我，要超越自我首先要认识自我，认识自我就要善于剖析自我，剖析自我就要主动上手、亲自动手查出问题、追根寻源，修正自己，甚至于脱胎换骨。

现在我们说自我革命是告诫我们的政府各级部门和各级官员，改革必须深化，必然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勇于面对，主动认清形势，把属于人民的必须还给人民。

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中就特别强调革命与自我革命这个问题。

为此，她常常告诫文革小组其他成员，有时甚至是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陈伯达：

“要文斗，不要武斗。”

“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要革命，总是会流血的。

谁又分得清哪些是必要的，哪些又是不必要的呢？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3月18日康生在北京接见安徽省代表团时断言道：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内战的延续，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延续。”

江青补充道：

“这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

她在助手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文章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

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

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

“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

他住在只有 6 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 3 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

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

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 4 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

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

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

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

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较断了。

我看书就点煤油灯。

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竟然拿着一块小毛巾抹起眼泪来。

她激动得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立即下令委托迟群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

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诉她。

第十五章 折戟沉沙

1

江青说：

“你只要做事，难免犯错。”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总是做正确的工作，如果他错了，就应该即时改正。这样，就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江青接着说道：

“当然，如果我错了，我会进行自我批评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知错能改比什么都好，但可怕的是犯了错执迷不悟，不知悔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错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明知故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应该坦然面对，勇敢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并不是很丢脸的事，相反你是一个聪明之人，知道是与非，错与对。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江青给我讲了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

春秋时，晋灵公无道，滥杀无辜，臣下士季进谏。灵公当即表示：“我知过了，一定要改”士季很高兴地对他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遗憾的是，晋灵公言而无信，残暴依旧，最后终被臣下刺杀。

三国时期，周处被乡里认为是和大蛟，白额虎同列的三害，周处杀死蛟虎后，却得知自己是最被乡里所忧虑的，因此找到陆云决定改过自新，最终成为一代忠臣！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知过能改的政党。

在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都能在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让人纳闷儿的只是，为什么只有被“打倒”了的共产党员才是“坏人”呢？

那些还没有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的共产党员都是“好人”吗？

然而，这种观点在江青看来却难以苟同。

她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共产党人划分为“好人”或“坏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些“真正的敌人”与“犯错误的同志”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犯了错误的同志。

江青没有指名道姓，只是说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又都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过半点怨言。

她承认，我们党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比如，在对待邓小平、陶铸和陈伯达的问题上，就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标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受了极左路线的影响。

一些老资格的革命者，比如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同样也受到了大字报的冲击。

有谈到文革中一些老同志遭受到的不公平的批斗时，江青多次使用的词是“冲击”而不是“攻击”。

尤其是在说到叶剑英这个名字时，不难看出江青眼里表现出的深深的敬意和歉意。

江青还说，主席和总理都曾经试图保护那些受到了不公平的冲击的同志。尽管他们努力过，但一些同志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

一方面，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和冲击；另一方面，正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些同志变得更加成熟了起来。

江青接着提到了邓小平和叶剑英 1972 年夏天的“复出”。

林彪出事之后，邓小平复出的议题随即也紧跟着提上了政治局的议事日程。

亲自安排邓小平重新露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个月前，即 1973 年的 3 月 10 日，就亲自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将邓小平同志复出的一事通告全党及党外群众的情况。

当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邓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

对于江青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然而，在对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的问题上，江青却没有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场合表示过异议。

极少有人知道，当年就是江青亲自将邓小平送到许世友那里“保护”起来的。

因为也只有江青最了解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

极少有人知道，邓小平还是一个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怨极其分明的人。

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了韶山祭拜毛泽东的祖坟。

文革中受“冲击”而被毛泽东保护了起来的人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个。

在北京的会谈中，江青谈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中国宫庭内部的政治斗争，即毛所说的“阶级斗争”。

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即为党内最高层十次权力斗争的结论。

而前四次所谓的“路线斗争”，与毛泽东没有多少关系。

实话实说，在北京的日子里江青的确谈到过“阶级斗争”这个词，但从来没有大谈特谈过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尤其是与林的斗争。

我记得很清楚，江青是这样对我说的：

“说林彪反党，我信。说他反毛，我不信。主席也不信！”

众所周知，我是被江青特邀到北京为她写传的，怎么可能花那么大的气力去写林彪呢？

可是，直到江青出事之后，又过了很久，我写的这本传记《江青同志》才与西方的读者见面，并被莫名其妙地冠上了《红都女皇》这个书名。

在北京的会谈中，江青谈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中国宫庭政治的最新进展：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十次两条路线斗争。第十次是最严重的一次，牵扯的人物是林彪。他不仅设计了许多计划暗杀毛泽东，而且想除掉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他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草图，策划攻击和爆破，一次性杀死我们。斗争非常激烈，这些人很阴险、残酷、野蛮。他们竟想谋杀毛主席！”

她说：

更厉害的是，在那段时期，林彪秘密地控制了他们的住所，在毛主席和她吃的食品里逐渐添加有害物质。他们生病了，并不知道病因。1969年的大部分时间，她的病逐渐发展到神经系统，影响大脑和记忆，直到最近才恢复过来。

“他有苏联修正主义撑腰。”

姚文元插嘴说：

“他败露后和妻子、儿子逃向苏联。他完全是惊慌失措，惊慌逃跑，投向敌人一边。他背叛了党和国家，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他的飞机坠毁在蒙古。”

江青继续说：

“总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我本人都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他们（林彪极左派）到处放火，我们像救火队一样和他们斗争，保护老同志。林彪的目的是打倒所有老同志，掌握权力，让苏联修正主义者派军队进来。然而，就像毛主席对舒曼部长讲的那样，毛主席只用了一滴酒，就把林彪的名字从历史记录中抹去，林彪就这样毁灭了。”

江青解释说：

1972年夏进行的批判林彪的宣传运动，是让所有年龄层的人学习文革带来的一个教训。主席公开这件事，让人们普遍增强认知能力，学会区分左派、右派和那些左右摇摆的人，以便在任何人环境下都划清界限。最重要的，是这场运动表明林彪不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彪一贯如此宣称）。解放军自始至终都是毛主席领导和亲自指挥的。

她说林彪很久以前开始背叛，但没有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她和主席没有采取措施。在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林彪宣称：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主席不喜欢这样的夸大：

“一句是一句。有一件事（拒绝设国家主席职位）我说了六句都不听，半句也不顶。”

林彪不停剽窃他人的言辞。比如，林彪喋喋不休地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去说是他发明的，实际是从别人写的流行歌曲中剽窃的。她告诉其他领导人，林彪用这样重的言辞颂扬主席，让主席看起来很不谦虚。

关于主席的书《毛主席语录》，她说林彪没有任何贡献，尽管他声称做了一些事情。像陈伯达指出的那样，最初的前言（1965年8月1日）由总政治部签署，不是林彪的。林彪把前言拿到手后，只是改动了开始和结尾部分，署上名，造成的假象是修改后的前言（1966年12月16日）是他创作的。

江青说她已经读了两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一本是由部队和政治局在1968年和1969年联合出版的《最高指示》。她想搞清楚《最高指示》的含义是什么，和主席相关联的只有标题和名字。被引述为《最高指示》的唯一作者让毛泽东看起来是最不谦逊的人。这又究竟是谁的作品？谈到“最高”指示，她推断并暗示说某人在某地发表“次最高指示，但没有人向她或任何人承认他是次最高指示。一些同事（明显是她的同事）最终设法阻止了第一版的发表。

控制出版社的人（林彪及其支持者控制的解放军出版社）一直向主席和他的人隐瞒出版计划。在没有事先通知主席、总理和她本人的情况下，他们擅自发行了主席的几部作品。一次，江青听到另一本手册的传言后，请周恩来给她搞一本来。周恩来送来的书名是《毛泽东思想万岁》，不是一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一本厚书。她和主席阅

读后，送交其他人征求意见。他们发现三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只有三分之一是毛泽东的思想。

这本“厚书”可能是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共 966 页，1967 年和 1969 年发行，没有特别的出版说明，在中国分为四卷。江青所称的“百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可能指林彪收集和编辑了百分之二的评价毛泽东的言论。除了北京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外，这本书是最全面的收录毛的演讲和文章的书。

在他们拿到书的时候，别人也都有了一本，因为它只值 6 角钱（25 美分）。她的那一本（她讥讽地提到）在中南海家里的客厅里。她很快发现同一本书的几个版本，这本书向她证明发行这些糟糕书籍的目的是推翻毛泽东。

林彪是国家的叛徒，江青愤怒地继续她的谈话。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认识到林彪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大“侵吞者”。一些人早就察觉到他过份热情背后的谬误。他高举着红旗反红旗，后来才知道旗只有一面是红的，另一面是黑骷髅的标志。林彪多年来有铺张的名声，喜欢大肆宴请及在朋友中派发礼物。事实上是想表明他可以随意获得国家的财产并分发掉。（孔子推崇的“入仕为官”被覆盖以苏式的唯物主义）。在国家的不同地方，林彪都修建了别墅，用以高规格款待他邀请的家庭。

1967 年春，一些林彪集团成员在毫无目的的军事演习中占据了四川的一个工厂，并无理地朝空中“万枪齐鸣”（例行的夸张）。

武斗也有好的一面，江青以肯定的口气对我说。从文革的势头减弱开始，公开的打斗不见了。她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文革期间在远离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武斗。她回忆陕西东南部的一次武装叛乱。当时是一个夜晚（1967年夏），她正在大会堂的指挥部看文件。周恩来突然走了进来，试图急于让她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睡觉吧”，周恩来催促她。说话的时候，一队士兵手里拿着地图，进入了大会堂的指挥部。为首的是一个老军人，政委郑位三。江青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林彪集团成员。郑已被授权（可能是林彪）指挥平定陕西东南的叛乱。当时总参谋长杨成武和一个副总参谋长赶到现场，火炮、装甲车和坑道的挖掘设备都已集合完毕。正当她吃惊地观望时，一个参谋走过来挑衅地问“江青同志，你知道怎么作战吗？”江青猜测他的用意是想让她参加这次行动。她告诉他：在毛主席身边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不能轻易使用武力。

当天深夜，周恩来把电话打到江青家里。他告诉她，应该避免军事冲突，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群众的宣传上。但是她不得不让他理解：群众和军人一样，如果紧张升级，冲突很容易爆发。

林彪的阴谋也卷入她的家庭，但并没有利用她的孩子们反对她。林彪在文革时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阴谋绑架她的女儿李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让她好笑，当时的情景却很紧张。林彪显然不了解她，他的阴谋对象选错了人！还有一次，当时李讷正在为《解放军报》工作（代理总编辑），一些林彪“反党集团”成员诬陷她要“夺权”。

李讷显然是由母亲派到这一关键职位，对军事和政务有很大的发言权。那时李讷是《解放军报》总编辑（1967年8月末），而《解放军报》已取代《人民日报》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刊物。

在文革的困难时期，她让继女李敏当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负责该项目的发展）一名领导人。国防科工委主任是聂荣臻，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那时李敏属于一个总部设在北京叫“9.16”的群众组织。有几个空军将领把李敏叫到一旁，恶毒地告诉她，江青的错误已上报到国防科工委，她与此有牵连，也要承担责任。一段时间后，1971年江青有一次到青岛看望因她而受到错误指控的李敏。江青对聂荣臻的态度让人迷惑。与江青打击聂荣臻的消息相反，江青确实讲过：他应该被保护起来免受不公正的批判。她和孩子以及其他亲近的人是一张无尽大网上的几根丝线，经常要摆脱由谣言及错误结论所纺织的这张网。

江青的两个女儿不畏风险，坚持追随她们父母的革命事业，而且变得勇敢、独立、敢于批判了。江青幽默地补充：李讷就曾批评过她重男轻女，李敏也讲过同样的话。

江青强调毛主席从不靠篡改历史记录来歪曲历史，而林彪恰恰相反。林彪按照自己的野心篡改相片、电影和其他媒体，甚至美国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乔冠华访问联合国时（1971年11月中旬），美国的电台放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可能已死于1971年9月）在一起的镜头。但在随后的短片中只剩下“超级间谍”林彪。那家电视台向中国领导人表明，美国政府做的政治调查范围很广（也许不如她想像的

正式和残忍），就连尼克松总统都害怕对他不利的间谍活动。没人是清白的，她预言式地补充。

活跃在 60 年代的左派和右派之中，林彪是最狡猾的。他有许多邪恶的计划，阴谋控制党、国家和军队。一个计划是利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塑造成将来有可能被打倒的偶像，另一个计划是制造骚乱。文革中，毛主席曾私下对领导同志，并公开地对斯诺解释：每一个人都要有“自知之明”。还有几个场合，他请周总理协助平息蔓延全国的激烈武斗。

江青离开混乱的北京到上海休息，发现上海完全在林彪集团的控制之下。毛主席的话被醒目地涂满了城市的墙壁。一个荒唐的场景——毛主席巨大的画像上用大字写着他的语录——激怒了江青。这种庸俗的做法使毛主席看起来像“最不谦逊的人”。当她向负责上海事务的张春桥提出意见时，张警告说：如果主席的画像和标语被拿走，那么林彪的形象和态度恶劣会更加凸现出来。但江青坚持要求取下巨大的画像，只允许谨慎地书写毛主席语录。

江青说，因为先前的历史遗存很容易被有野心的人利用，不是所有的历史遗迹都需要保留。世界上人太多，不能保留所有的遗迹。这样，中国领导人开始抛弃一些过去的纪念物。颐和园前和 3 个市中心的大牌坊被挪走。这 3 个牌坊以前树立在天安门前，让天安门看起来像“3 个古怪的小洞穴”。我认为这些很珍贵的，她挖苦地说，因为你们的国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鉴于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这些牌坊和门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再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她号召拆除它

们。陈伯达和梁思成反对拆除。他们说，你们攀上紫禁城北面的景山看看，北京饭店破坏了北京的风貌。

1973年北京饭店又增添了几层，成为首都第一座中型的摩天大楼。

无视她对审美和实际的建言，陈伯达、梁思成和其他人都坚决反对建筑的变化，特别是拆除这些牌坊。1971年，江青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牌坊被搬到先农坛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了。她尖锐地指出：这样的保护并不能增添牌坊的历史价值。

但是，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和文物要保存。她提到60年代湖南长沙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的文物可以追溯到商朝。她说，它们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处理这些文物总是充满风险。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和学生被允许任意地研究这些古代文物，但他们逐渐沉迷于古物，革命热情自然衰退了。她强调，风险是永远会有的，但中国领导人从不忽视和破坏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话题回到林彪和服务于他的人，江青回忆1970年对北京中山公园碧云寺令人紧张的访问。因为她所钦佩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吴德（彭真被罢免后任北京代理市长）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1967年被指控属于516兵团）陪同。王力是个笨蛋，她厌恶地回忆说，那天表现得很不谦虚。

到公园后，王力请她参观一些佛像。江青提醒他此行目的是寻找奇花异草，带回自己的花园，但王力坚持看佛像。她听从建议，随他到了碧云寺。因为近视（总是戴着眼镜），她无法一下子看清昏暗环境里的一切。王力首先向她介绍祭祀器具和供品，然后参观孙中山著

名的帽子和其他遗物——主要是衣服。最后，江青停在毛主席半身画像前，她想，画像一定一直被放在那里。

她愤怒了，尽管把孙中山遗物和佛像并列还可接受，但没有人有权把毛泽东的形象置于宗教神殿内。她仔细查看了神庙，庙有五、六百年历史，安放了五百罗汉像——佛教圣徒。她立即命令警卫把有关物品搬走，使庙宇恢复原貌。她提醒王力，大批外国客人和劳动人民参观公园，会使他们对宗教环境里的主席形象产生误解，这样做很不妥当。她的震动全场（她尴尬地笑了），但并不在乎，她想人们应该知道她是谁。她指出王力的安排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971年的一天，她正在颐和园游览，决定登上最高的建筑排云殿，俯瞰湖水、楼台和园林。当她走近这座建筑时，惊讶地发现墙上刻着林彪的书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每一个字都有6尺高。把自己古怪的字体刻在名胜的墙上，林彪是想对民众谎称这是他提出的。实际上，这句话是雷锋最先提出的。

在发现这些证据前，毛主席已向斯诺指出吹捧他是错误的。他告诉斯诺，这种事不会强加在外国朋友身上，这是领导人的共识，但林彪却忽视这一点。在注意到颐和园墙上这些粗大的题词时，江青开始只敢向随从们曲折地表示“主席有很深的文学功力，他的书法是艺术”。到了11月12日，李作鹏（1966年担任政治局委员，据信是林彪的人）奉命到颐和园把林彪刻在墙上的字清除掉。江青突然插了一句说，主席一直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显然是影射林彪的对外自吹自擂。

林彪反对毛主席，她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活动，在 1971 年变得频繁和激烈。毛主席不断指示周恩来处理这种冲突，但他的想法并不容易贯彻。在危机的高峰期，她多次到总理那里帮助“平息事态”。不断的威胁、群众分裂和阴谋活动让他们难以工作，甚至在家里——中南海都有敌人的渗透，没有人可以安全地吃饭睡觉。为了安全起见，主席及其拥护者悄悄撤出中南海，搬进京西宾馆，后来又搬到人民大会堂，那里的一流设施使办公比较便利。主席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在整个危机期间不得不在大会堂接待来访者。（从新闻稿中推断主席从 1970 年 1 月到 1971 年没有在中南海接见过任何外国客人。林彪死后，第一个在那里受到接见的是 1972 年 2 月到访的尼克松总统。）她说，主席为了粉碎林彪推翻他的阴谋而寻找安全地点的事，此前没有向外界透露过。

江青接着说，胜利的领导人把林彪作为反面例子，教育下一代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不坚持学习，人民会不断被“林彪这样的骗子欺骗”。

为了消除游荡于群众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整风运动开始了。

1971 年 9 月 13（14）日，林彪坠机身亡的第二天，主席办公室就发起了一场批判林彪的艰巨运动。第二年又发起对陈伯达的批判（1967 年因极左受到批判）。主席、江青及其支持者决定先在党内，然后在群众中展开。最终目标是批判反党集团首脑及其支持者。群众被要求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青说，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这些思想体系在群众中占据了应有的地位，群众的思想被“很好地武装”起来。大量“惹人瞩目的学习”使林彪集团名誉扫地。如果人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坚持斗争。不仅年轻同志，老同志必须每天学习政治理论。“也包括我”，江青微笑着说。

群众认真地参加了政治学习，当前的革命形势“好极了”。“大混乱”过去了，“良好秩序的开端”已经到来（他们描述历史发展阶段的术语）。中国地域辽阔，更多的混乱将会出现，他们必须全力控制未来发展中的问题。

他们面临着三项任务：第一是外国记者所注意到的，在所有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进行斗批改。政治的整风不应影响日益增长的生产。后者更容易做到，江青坦率地说。在医学领域，斗、批、改运动还没有开展。毛主席告诉全党全国人民的第二和第三项任务，是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和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问江青还会有第十一次“两条路线斗争”吗？

“不可避免”，她回答，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渗透他们的国家，他们还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

1966年7月，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包含“英明预见”的信，即被外国情报机构获取。毛在信中提到，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当然不可能全部打倒。七、八年以后还会有一场“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会有多次扫除。主席明确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们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都不会容忍。他在 1966 年所写的不是异想天开。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一次预演。

林彪自己跳出来，证明主席的话是英明的预见（她经常重复的话）。当然，他是在漫长而普遍的混乱已近尾声时暴露的。单是北京的破坏就损失惨重，一些机构，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那里，政治和学术密不可分）特别受到冲击，几乎瘫痪。林彪一伙的灭亡表明，凡是右派越猖獗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的反击也越迅速和果断。这些著名大学几十年来培养了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生，但也把他们和社会现实隔离开来。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演习，左、右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每个人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训。对待斗争的准则是毛主席的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她说：前一年（197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50 周年。两条路线斗争，每隔 5 年就会发生一次。王明路线时间最久——总是公开冲突，林彪只专政两天半（尽管有数年的地下较量），从 1970 年 9 月 23 到 26 日，在庐山会议上。

到目前为止，文革收获的成果是什么？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革命骨干”上。他们可以是中年、青年和老年。只要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承认错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受到人民的原谅。拿邓小平的例子来说，他犯了错误，但后来承认了自己的路线错误。一旦被“纠正”过来，他和其他类似的人都会变成“人民的财富”。

1972 年初，她参加了一些年轻领导人主持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此后，她还参加了一次军队成员的会议。两次会议上，参加者的精神

面貌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对林彪的批判，清洗那些受其操纵的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为这次新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机制。人民正在学习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此外，他们都有不断接受批评的要求。大部分群众不会顽固不化，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这种要求改变世界观的普遍愿望，在她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很好地体现出来。会议参加者有工人、农民和战士，还有相当比例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一些女权活动家在会上的讲话精彩得令人惊讶，特别是来自西藏和蒙古的代表也做了有益的发言。在会议进程中，年轻的同志先讲，随后一些老革命带着厚厚的参考笔记发表了长篇演讲。最后，一些中央委员会成员站出来，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样的会议让领导人相信批判林彪及其思想的运动正在深化。

且不论江青对林彪故事的重新编排是主观的利己的，观察家们不应该忽视林彪和江青追求和继承政治权力之目的的可比性。尽管他们一个工作在军事领域，一个工作在政治领域，但对领袖地位的追求让他们成为对手。他们都向群众表明（直接的或间接的）自己是主席“最好的学生”。从 60 年代早期开始，他们都依靠这样的说辞，寻求成为毛思想的贯彻者——在毛死后，这一角色将变得至关重要。林彪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表，江青在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林彪的办法是在小红书中技术性地剪辑毛的著作。江青在文艺宣传上走得更远，她的表演艺术变成了毛思想的载体。她固执地追求文化控制的最高权力和林彪 1966 年对她短暂的协助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第十六章 戏剧革命

1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与尼克松谈的是国家大事，江青则请尼克松观看了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尼克松兴致很高，期间还问及了编剧、作曲和导演的名字。同时，还向她了解了一些中国当前文艺及音乐方面的情况。

江青告诉他，这些作品都是由“劳动人民创作”的。尼克松显得很惊讶。

说到这儿，江青笑着对我补充说：

“不要指望他看一出戏，就能理解我在样板戏上倾注的心血。”

回顾六十年代早期，当离别舞台多年后的江青再次重新出现在舞蹈、戏曲和音乐的舞台上时，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她说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一些人拒绝与她合作，还有一些人甚至阴谋反对她。但他们的“敌意”并没能打击到江青革命的意志和前进的步伐。

样板戏是指文革时期被树立为“革命样板戏”的以戏剧为主的二十几个舞台艺术作品的俗称。其代表性的作品有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剧目。

文革时期，有一些被树立为文艺榜样的，以戏剧作品为主，加上少量音乐作品的大中型舞台艺术作品，统称为“革命样板戏”或“革命样板作品”，俗称“样板戏”。

当年，对于“样板戏”这个从不被解释的响亮称呼，人们往往似懂非懂，就连样板戏的编剧汪曾祺也不例外。他在得知“样板”是某地对某种板状模具的称呼后，认为“样板戏”的意思说不通。可见，样板一词，难以顾名思义，它的引申义更是牵强，无论是“榜样”，还是如今增添的“样品”“示范”“实验”等义。

“样板”和“样板戏”之称，最初分别见于 1965 年 3 月 16 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员”者赞扬《（京剧）红灯记》的文章，以及 1966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位上海工人赞扬《（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文章。此后至 1966 年底，报刊上又出现了“革命样板戏”“革命艺术样板”“革命现代样板作品”等称呼。

“革命样板戏”这个称呼被叫响，始于 1967 年 5 月至 6 月。当时，江青扶植的舞台艺术作品会集北京，在六大剧场反复上演。同时，《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多有报道和评论，称其为“革命样板戏”，或者

临时称其为“八个革命样板戏”，并列出如下名单：“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1968年7月1日，《（钢琴伴唱）红灯记》上演，立即被大力宣传和高度赞誉。它被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文艺的新品种”，并与先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相提并论。此后，《人民日报》在1968年9月26日和1970年2月10日的《工农兵英雄的壮丽颂歌——赞革命样板戏》《革命样板戏鼓舞着我们奋勇前进》等重要文章中，列出了含有《（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九个作品的名字。1969年，在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游行的革命样板戏方阵里，新华社报道所称的“九个革命样板戏的舞台彩车”中，有《（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舞台彩车。

七十年代，从1970年到1973年，又逐年推出了江青扶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5月1日推出）》，《（京剧）龙江颂》《（京剧）红色娘子军》，《（舞剧）沂蒙颂》《（上海交响乐团的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舞剧）草原儿女》《（京剧）平原作战》《（京剧）杜鹃山》等作品，使样板戏的数目增加到了十七个。这十七个样板戏，除了最后一个音乐作品外，都在这几年被拍成电影或投入拍摄。这些影片和《（京剧）磐石湾》的影片，先后参加了江青把持的文化部在1974年5月以及后两年5至6月举办的“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以及有的地方另外举办的汇映。

1974年年中，一些报刊文章中公布了样板戏新的名单和数目。例如，5月23日，新华社在《人民日报》上报道了《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样板戏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其中列出了上述十七个作品的名字。7月，江青直接控制的文艺评论写作班子“初澜”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京剧革命十年》一文，碍于《（钢琴协奏曲）黄河》实在不是“戏”，宣布“革命样板戏，现在已有十六七个了”。（另外，两文中分别提到的“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后来的“一批革命样板作品”中的“批”，是“些”的意思。“一批革命样板作品”是指从钢琴伴唱《红灯记》开始，逐个推出的“一些”样板戏。文革后的样板戏研究中，把它们称为“第二批”样板戏，或者把它们再分批的作法，都是不对的。）

文革末期，又有一些样板戏陆续出台。例如，1975年5月21日新华社在《革命样板戏剧组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演出》“革命样板戏全剧和折子戏”的报道中，所提到的1974年下半年推出的《磐石湾》《红云岗》《审椅子》《战海浪》，1975年上半年推出的《津江渡》等京剧剧目。从《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我国革命样板戏进一步普及和发展》一文中的“还有一批剧目正在修改和创作”这句话来看，这些样板戏全是戏剧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有的已经在电台播出并拍成电影公映，但是不久文革就结束了，所以它们影响都不大。

换言之，从文革时期开始，很多人，包括一些高层人士，都流传“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的说法，并且对其具体所指或不甚清楚，或认识不一。例如有的人，包括一些样板戏剧组成员，认为只有最早

的八个样板戏才是样板戏。再如更多的人认为，只有包括《龙江颂》或者还包括《杜鹃山》在内的，影响最大的八个样板戏才是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之说容易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从1967年5月到1970年上半年，样板戏中的戏剧作品只有五个京剧和两个芭蕾舞剧。这个阶段，京剧剧名的前缀有“革命现代京剧（1966年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芭蕾舞剧剧名的前缀有“革命芭蕾舞剧（1966年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革命现代舞剧（1969年始）”。此外，本是泛称的“革命样板戏”也常被当作剧名前缀，尤其是京剧剧名的前缀出现在报刊文章中。1970年下半年，样板戏真正得到普及，称呼自然变得规范。从此开始，作为剧名前缀，只称“革命现代京剧”“革命现代舞剧”，例如《（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另外，“革命现代”也是文革时期非样板剧目的属性，所以有“革命现代越剧《半篮花生》”“革命现代京剧《铁流战士》”之类的称呼。）总之，当时并不强调各相关作品的“样板戏”名义，有的作品甚至从来没有冠称过“样板戏”。所以，实际上人们普遍不能清楚地知道样板戏都有哪些，更想不到《（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音乐作品也是样板“戏”。

除了有心于文艺的人外，实际上人们并不熟悉所有的样板戏。例如，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居然根本不知道唱了五年之久的《（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存在。人们普遍比较熟悉，并且容易回忆起来的样板戏，最多是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

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八个左右的最优秀的作品。

文革时期，样板戏大都被拍成电影，而非样板的京剧剧目却无一被拍摄。广播电台播出的戏剧节目主要是样板戏，到文革末期，才播出了一部分地方戏剧目和非样板的京剧剧目。失衡的宣传，使大多数人不知道，文革时期还存在非“样板团”创作演出的大量非样板的京剧剧目，如《铁流战士》《芦花淀》《瑶山春》。这样，即使是熟悉更多剧目的人，也容易把一部分样板戏剧目误以为是非样板戏剧目。

样板戏，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杂凑生硬的问题，违反艺术样式固有特点，写实布景削弱了想象空间，表演上过分强调体验人物与贴近生活，交响化伴奏使程序化唱腔变成了“京歌”，用指挥替代鼓板以整合文武场，概念化的阙失。而从它们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等，却被硬性确立为所有创作都必须遵循的经典规范。有学者指出，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呼唤的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但也有人对此质疑：好莱坞普遍流行的英雄主义创作手法何尝不是如此？难道好莱坞也是文革精神的基因？这种突出主要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手法其实是世界上多数

民族的审美心理需要。所有史诗性作品都是如此，可见江青对文艺创作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1]

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里有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语录歌，样板作家浩然、样板诗人张永枚、样板钢琴演奏家殷诚忠（殷承宗），等等。

样板戏，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40 年代延安“戏改”（戏剧改革）运动（歌剧《白毛女》即为延安时期首创）和上世纪 50 年代的全国性现代戏创作，直至样板戏产生、传播的全过程。所以，样板戏是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持续努力的高潮。毛泽东逝世和江青被捕后，这个运动就嘎然而止。今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再度成为文艺舞台和电视荧屏的主旋律，积极向上的战斗生活被“三破一苦”的悲观压抑的家庭生活取代。

1958 年至 1964 年间出现的“京剧现代戏”，是解放区戏曲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新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个时期，中国文坛刚刚经历了“反右运动”等一系列的批判运动。

1962 年“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出和 1964 年刚刚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剧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一方面，传统文化遭到全面清除，以前的所有文学创作几乎都遭到否定和质疑；另一方面，“二革”创作方法成为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指导原则。文艺问题作为“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而戏剧作为一种影响面大的特殊文艺形式，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4年~1966年间，样板戏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

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其后又陆续创作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等等样板戏。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积极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实行文化革命的典范。

1963年冬天，江青在上海看戏，带回两个沪剧剧本，一个《芦荡火种》，一个《革命自有后来人》，让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改编

成京剧。那时总说是搞“革命现代京剧”。后来她有个说法，叫“种试验田”。《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革命自有后来人》定名为《红灯记》。

1965年五一节，《沙家浜》在上海演出，经江青审查批准，作为“样板”。

“样板戏”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时叫开了的。

江青总结了50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

她提出“十年磨一戏”。

一个戏磨上10年，是要把人磨死的。但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

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突破，把京剧音乐发展了。

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进京剧里，是成功的，《海港》里的二黄宽板，《杜鹃山》“家住安源”的西皮慢二六，都是老戏所没有的板式，很好听。

说来说去，每当人们一提到“样板戏”这三个字，就能让人联想起“江青”这个名字。

可见，其实“江青”与“样板戏”是永远也分不开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她，我们也许想知道江青对自己的这些行为的革命本质有着多么清晰的认识。

没人理解，也少有人支持。

在戏剧体现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她寻求的是表演艺术乃至中华文化的真、善、美。

目的只有一个——革命！

思想革命！

尤其是人民群众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革命领袖和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既不是帝国的衰败，也不是政治革命的残酷，而是把思想变为社会态度的过程。

中国人以革命的名义，不仅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基础，而且还消灭了存在于其中的宗教和社会习俗。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消灭了毒品、娼妓、赌博和其他一切封、资、修的陈规陋习。

为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中国领导人不惜余力地城市和乡村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教育和“破旧立新”运动。

茶馆、咖啡屋、地方剧团、私人餐馆以及农贸市场纷纷关闭。说书的、算命的、卖艺的，还有马戏班子，都被赶出了街头。宗教节日、红白喜事、传统的节日庆典，一夜之间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文革以来，中共领导原则上是禁止对那些已经消逝了的历史戏剧进行再创作的。而人们对音乐、戏剧、公共演出的爱好和热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事实上，反而更加活跃了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江青才有可能一个接一个地创作出八个样板戏。

这些创作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结构和象征的基础上的。

这些反映无产阶级文明的“新生事物”，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极大的欢迎。

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剧院观看样板戏。

在车间、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哼唱着样板戏的人。还有人为外国游客表演样板戏片段。甚至孩子们（他们没有迪士尼和芝麻街，也没有泛滥的摇滚乐。）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革命歌曲中。

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通过煽动激情来获得力量。

革命的誓言不仅是用言辞，同样也需要用行动来表现。

文革前，古典剧目表现的一般都是劝人向善的儒家思想。

嘈杂的大众剧院宣扬的是民间宗教，并经常演出一些中伤和诽谤儒家思想的剧目。

如今的革命戏剧，仍在继续教导人们如何区分善与恶。

江青的工作便是策划如何将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意识形态溶入到表演艺术之中。

她的革命戏剧中男女人物都属于新一代，他们的道德（也就是政治）高尚并充满活力。

经过舞台表演，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文革开始后，芭蕾舞、交响乐、雕塑以及戏剧等样板作品风靡一时，成为了历史神话和国家政策领域的风向标。

中国正努力地为未来建立一种新的传统。

今天的中国，活跃在样板戏舞台上的“神”和“英雄”，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少有表现 1920 年代革命运动开始前的历史。

英雄们都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光辉品质，国民党和外国侵略者都是“坏人”而遭受抨击。

中国共产党的“神话”，便是建立在他们打败了这些“坏人”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关心人们对艺术的摹仿更关心艺术的再生。自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艺术效益是用商业效益来衡量的。政治摆在了首位。

戏票很便宜。

一张戏票的价格大约是一角（约一美分），马戏票是 8 分。芭蕾舞和电影票则更便宜，只要 5 分钱（人民币）。

儿童，只要有一分钱就可以进任何剧院。

如果中国人愿意问一问美国剧院的票价，结果一定会非常惊讶的。

江青也不例外。

得知中美票价的巨大差异后，江青说：

“将来，有一天样板戏去美国演出，我一定叫他们把票价降下来。”

话音刚落，赢来了一阵子掌声。

江青对我说：

“如果想写中国的艺术，你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样你才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你才会理解艺术是如何在上层建筑起作用的。”

“上层建筑”是江青经常使用的马克思术语。

相当于我们对文化及艺术、文学、教育、科学、思想和价值观等的最广泛的意概念。

共产主义理论家认为：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补充。

如果历史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上层建筑也会随着经济一起发展。

60年代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历史发展取决于哪一方的问题，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未解决的争论直到文革才得到最后的解决。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江青说：

“中国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在艺术和教育方面没有跟上经济基础的变化。这种滞后状况如果延续下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破坏。资本主义复辟就有可能！”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从鸦片战争后困扰中国人民 170 多年的大方向问题至今仍然在延续,中国人民在反复比较中选择。

经过 5 年的不懈斗争，江青终于将旧文化部门的封建卫道士们赶出了领导层，并让年轻人掌握了威力无比的国家宣传机器。

忠诚的红卫兵报导和赞扬了她在文化领域的丰功伟绩。

称赞她的革命样板戏是“让上层建筑真正适应了经济基础”、“世界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无产阶级文艺的耀眼珍珠，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江青同志斗争和艺术实践的杰出作品”。

3

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也遭遇到了如何平衡中外文化的问题。

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

“破旧立新、洋为中用。”

1964年2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毛泽东作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

“古为今用”，就是吸收古代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的成分，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为反映现实服务。“洋为中用”，就是学习一切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为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毛泽东高度浓缩与概括，其外延自然也就扩大了，同时也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

江青将毛主席的话当作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在群众艺术形式中引入外国元素的指导方针。

她认为“批判地”吸收，意味着摆脱上层建筑中的糟粕。

“我们能批判地吸引鬼、神和宗教吗？”

1966年11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众多艺术家时质疑道。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不信鬼神。”

封建迷信是地主阶级用来剥削人民的。

“扫除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的残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清朝晚期，保守派深信他们的政治体制、文化底蕴和文学艺术要比“野蛮”的西方人更丰富、更优越。

当马克思的历史观促使正在的中共领导人消灭了封建政权和传统文化后，古代物质文化——古墓、陶瓷和建筑就成了新的民族骄傲之源。

他们不仅赞美自己的老祖宗是天才的艺术家和工匠，也赞美这些成果是“人民的创造”。

在为革命纪元的文学创作上，党内多个领导人，包括毛和江青，都承认有不足和失败之处。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爱恨交织的态度并没有多少的改变。

只是在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这种改变才出现明显加快的趋势。

到了文革前夕，希望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和中国古典音乐来强化国家音乐的愿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

国家剧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人民的革命意志谱写新乐章。鼓励人们团结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中去。

1960年代，江青承担这一史诗创作的任务。

她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文化的平衡与综合。

为了追寻文化的自强，中国可以容忍多少外国的东西？

异国情调的文化，即使是精华，又能给中国的无产阶级带来多大的帮助？

用音乐歌颂文革，虽不是江青的发明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量从西方引入的乐器和交响乐非常适用于当时中国的历史，就像一个世纪之前引入工业技术和军事一样，用柴可夫斯基、李斯特、拉赫马尼洛夫、贝多芬和斯美塔那的风格与西方的小提琴、中提琴、黑管、铜管和钢琴整合在一起，竟能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宏亮的音响和音色。

在讨论文革音乐基础时，江青对我说：

“中国人过去常常瞧不起自己的音乐遗产。一听到西方音乐，就会不加思考地认为优于自己的本民族的音乐。他们也不想想，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些音乐都是被人创作出来的。经历了几十年西方音乐的熏陶，一些人突然明白了这是国外的资本主义在发挥影响。这些靡靡之音与我们共产党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见我有些迷惑，江青接着补充说：

“我们并不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否定西方音乐中一切好的东西！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西方音乐中学习到许多的东西的。事实上，我们几代音乐家不知屈辱地把精力放在学习和掌握外国音乐和乐器上。正是

这种热情，让中国有了太多的音乐家。钢琴家更是多如牛毛。其中不乏多才多艺者。说句玩笑话，中国比任何国家有更多的李斯特。”

江青继续说：

“我没有对西方音乐作过深度的研究，有兴趣，没时间。在我开始学习乐谱之前，并不懂得读谱。但多年来我一直相信中国可以在外国音乐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音乐文化。”

她边说边举起一个拳头：

“我们要用手中的铁锤破除一切陈规旧律！”

她的言辞在音乐圈激起强烈争论。人们通常认为，一首交响乐应有四个乐章；另一些人认为要有八个；还有人认为，所有的音乐都应该是交响乐；其他人则倾向于独奏或认为应以声乐为主导。

江青的音乐生涯是坎坷不平的，年轻时在天津艺术学校才开始接触乐器。包括学了三个月的钢琴。

她回忆说：

“老师很关心我，但一走到键盘前就换了一付脸面，对我十分严厉。老师经常动不动就用教鞭敲打我的手腕，哪怕我的姿势有一点点儿不对。我不喜欢这种做法，心里有了抵触情绪所以基础训练没有打好。”

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时，江青被告之尼克松总统的钢琴弹得很好，江青没敢承认自己年轻时也学过钢琴。

江青笑着对我说：

“他是第一个我见过的会弹钢琴的外国领导人。”

从 1964 年开始，几年来江青访问了许多音乐学校，还花了许多时间听独奏音乐会，并下苦功研究了外国乐器的构造和演奏风格。她尤为感兴趣的是单簧管、欧巴、横笛和其它乐器的独奏、合奏、交响乐的编排。并开始喜欢上了这些乐器的多样性及其与中国乐器合奏时产生的震撼力。

她承认，将这些变革引入到深奥的音乐领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知道有一些有点儿名气的音乐家看不起她，认为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这些人同时也很佩服她。尤其是不敢贬低她的明确目标——将革命引入音乐领域。

她开始致力于唤醒音乐家的热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革命的热情触及这些音乐家的灵魂，并让他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她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也有些人只是名义上的支持，没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和殷承宗都给江青写过信，表示一定要创作出革命的音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和他们一起工作，直到逐渐掌握创新的演绎方法。

李德伦曾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艺术指导，常任指挥、中国交响乐团顾问、北京交响乐团顾问等职务。

几乎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中，那都是一个政治的时代，可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莫扎特的时代，是李德伦和那些令人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的文革交响的时代。

1963年，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搞西洋艺术的人被贬低的一塌糊涂，几乎没有活路，有人甚至说：

“以后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

周扬在总结时说：

“谁说搞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都是革命同志嘛，为什么要搞等级呢？”

李德伦实在忍不住了，就说：

“以后再开会，请搞民族音乐的同志先坐下，有座位我坐，没有座位我就坐地上。”

中央乐团的人没有活儿干了。

他们无所事事，等待着一次次新的批评或者批判。

精力旺盛的李德伦想为乐团找个出路，许多搞西洋乐的人也在想着办法。

他们突然意识到是否能把自己的饭碗与“为工农兵服务”联系在一起，与无产阶级政治联在一起？

莫扎特贝多芬显然不行了。

李德伦突然意识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可以搞革命歌曲大联奏。在改编上也不搞更多的发展，仅仅是来几个反复，搞搞简单的配器就演出。

老一代的乐团人大概都记得那个场面：

当最后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奏完之后，乐队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观众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大搞京戏革命的年代。

江青突然让李德伦等人去看《沙家浜》，这是一个有关于新四军和老乡联合一体打击汉奸的故事，其中有著名的阿庆嫂这一女强人形象。许多人都在试图写出“革命现代京戏”。

李德伦看后心想，江青为什么让他们看这出戏呢？

显然是希望他们用西洋乐器结合中国的京戏。

这时的李德伦已经懂得什么是“洋为中用”，为了中国的西洋音乐也为了自己这二者共同的生存，他也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倾向朝着“革命”的一面去靠。

他们把戏中“芦荡”一段写成交响乐伴奏，让男高音的美声与京戏结合的方式唱郭建光，然后又加了辉煌的大合唱。

江青看过之后很满意，她高兴地做出让乐团国庆演出的决定。

乐团上下齐动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很快就把整个戏排了出来。

他们下农村演出，农民说，这样的戏我们听的懂，用李德伦的话说，他们于是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批准。

就是这出戏，以后有了个响亮的名字——“交响乐沙家浜。”

李德伦认为这是不通的，叫清唱剧，甚至大合唱都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能叫交响乐。

1966年，世界音乐已经发展到了令中国人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李德伦却无可奈何地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修理自行车，以此作为自己在余生中谋生的手段。

他与另一个著名指挥韩中杰一起私下商量，到街上去摆小摊。

在“犁庭扫院”的运动中，他们漠然地享受着命运，他们乐观地认为反正自己饿不死。

李德伦被打成黑帮，关在一间屋子里，与他为伴的还有中央乐团团长李陵。

李德伦有力气，可以在后台干粗活。他的人缘好，所以没挨过打。他扫地、倒垃圾、拾东西，肩宽体壮的他这次真成了一只“老牛”，与孤岛上海时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在有限的小舞台上扮演老牛，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扮演老牛的形象。

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江青来救他一命了。

1968年9月18日，李德伦正在舞台上扫地，突然有人来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

李德伦一愣，人民大会堂不是开“九大”的地方吗？

怎么会突然与他又有了联系呢？

他见到了当时的团领导，他对李德伦说，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解放了。

没有特别的激动、眼泪、忧郁和委屈，李德伦当时所具有是只是服从，服从命令和命运。

那是个下雨天，李德伦为了抓紧时间赶到人民大会堂，就与另一个同伴坐上了一辆军用三轮摩托，在小礼堂里，他见到了不少熟人和一些在当时是很著名的人物：谢铁骊、钱浩亮、李希凡、钱江、刘长瑜、谭元寿、袁世海……

默默地等了一会儿，一群人走了进来，江青矫健地走在前边，她风度雍容大方，她自信手中拥有的权力。

她一进来就问：

“李德伦来了吗？”

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规格，并能显示出她对李德伦的特别需要，以及“久违了”的那种意思。

与江青一同到来的还有周总理、陈伯达、姚文元、康生等人。大家一起看了《红灯记》，然后，有人上台宣布了李德伦等人是好人，要保护他们。

江青当时也讲话表态说：

“李德伦是好人，应该让他回家，即使出身不好也不要紧，出身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周恩来说：

“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但这不要作为包袱。李德伦、刘长瑜的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是他们为革命努力工作，可以说是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钱江的家庭不好，但如果没有钱江的父亲，我和康生都活不到今天。”

康生在一边微微点头，并坦然他笑了。

这些领导人温暖的话语，使这批名人知识分子感动，李希凡忍不住哭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李德伦结束了他两年的黑帮生涯，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又成了革命文艺战士。

江青需要李德伦这样的人，因为从《国际歌》之后，艺术上是一片空白。

于是就有了李德伦后边的故事。

尽管李德伦认为“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个名字有着极大的错误和可笑之处，就如同一个傻瓜在说“磁器茶壶”一样，但事实上李德伦恢复工作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指挥这首“交响乐”。

他觉得既然要干，就得搞好一点。配器简直是太糟了，许多地方和声都不对头。有责任心的李德伦就组织了个小组，请作曲家施万春、吴祖强、罗忠镕等人对作品进行加工，但是还没工作几天，就有人向上汇报了，说：“李德伦在篡改样板戏”。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名。

其实李德伦本是好意，一方面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无法容忍那些错误，另一方面他把作品搞得好一些在客观上是对江青有好处的。

后来，这个作品出版时，李德伦们仍然坚持着把错误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加以修改、调整，他们说自己所作的一切仅仅是“整理”，而且在整理完之后还得说，这个作品原来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时的中国音乐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本总谱：“交响乐沙家浜”。

1970年，法国总理访华。周恩来找李德伦，让他准备贝多芬的作品。中国人要把样板戏拿出去，就得让别人的东西进来，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察之后，主管部门认为可以演演贝多芬的交响乐。

李德伦决定演奏“贝五”（《命运交响乐》）。

当日程排满之后，他就打电话给于会泳，这位曾写过《杜鹃山》全剧音乐的作曲家不敢说不演。也许后人很难想象，一位能写出像《杜鹃山》这样优秀曲调的人，怎么可能对西方古典音乐抱着那么大的成见。

于会泳说：

“你们的质量保证不了，不能演！但因为周恩来的坚持，还是决定演。”

李德伦被江青召去，于会泳也在。

江青问：

“李德伦你觉得中国可不可以演交响乐？”

李德伦说：

“可以。”

“演什么？”

江青问。

“演贝多芬第五。”

李德伦说。

于会泳说：

“不行，‘贝五’是《命运交响乐》，是歌颂宿命论的。”

江青又问：

“还有别的吗？”

李德伦说：

“还可以演贝多芬第三交响乐，又称《英雄交响乐》。”

于会泳说：

“不行，‘贝三’是歌颂拿破仑的，这个拿破仑搞封建复辟，很有些问题。”

李德伦不说话了，他只好沉默，在他对面都是领导，也都挺内行的，你还能多说什么。

于会泳看李德伦不吭气，就思考了一下说：

“我看可以演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六是《田园交响乐》，是写大自然的。”

江青表示同意。

人们大概都已知道了美国人基辛格的那次神秘的中国之行，但人们可能很难知道李德伦曾带着中央乐团为他在内部秘密地演奏过。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基辛格在听音乐时所露出的表情，也许他会被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真诚而友好的态度感动，但是据李德伦说，那天演奏得一塌糊涂。

李德伦对江青说，外国作品一点都不练，业务都退光了，得练点吧！

在说这番话时，李德伦心情很复杂。他完全可以什么也不管，让美国人去嘲笑中国吧，这又不是他的事，他连人生都难以保障，丢脸又有什么？

但他是一个乐队指挥，是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是一个一生都在追随着最高的音乐境界的人，所以他不愿沉默，他想再次为中国搞严

肃音乐的人争取一次机会。尽管他很清楚他们所共同面临的社会环境，政治状况。

江青点头同意了李德伦的建议，这使很多人都有些意外。

中央乐团又可以开始排练了，他们在李德伦的指挥下，一气练了十部交响乐。

仅仅是为了提高视奏能力，这似乎应该是音乐学院附小或者附中所解决的问题。有谁愿意相信曾有一段时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那批标志着炎黄子孙音乐最高水平的人，恰恰在小心翼翼地练习视奏能力呢？

那是一次重要的练习，尽管让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幽默，尽管不少人早就淡忘了这件事，可十部交响乐——这无疑是天文数字。

1972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一个晚上特意把李德伦请到人民大会堂，谈到凌晨两三点，总理让他尽量搞一份情况说明，以便于发展交响乐事业。

1973年，从外国连续来了三个交响乐队，并且还来了一个土耳其的小提琴家。

文艺界开始有新的松动，八个样板戏尽管不容怀疑，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把中国和外国加以比较了。

然而繁荣是表面的，周恩来本人开始受到攻击（尽管非常隐蔽），文化界的斗士们也勇敢地站出来无情抨击李德伦之流。

江青有一个批示：

“李德伦同志……”

就是这个“同志”二字不仅对李德伦精神上是一种安慰，同时也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4

在革命样板戏的构思和创作方面，实话实说江青并没有得到多少毛泽东的实际帮助。毛泽东的文学才能展示在诗歌和散文方面。

60年代江青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已经习惯于尊重自己的舞台知识，还不时嘲讽自己曾被资产阶级文化的舞台俘虏过。

江青的无产阶级交响乐和戏剧创作，沿用了数千年的传统，即根据当代的故事改编经典的模式。

如同节奏给诗歌增添魅力一样，古典戏剧形式可以给革命化的剧院带来新的活力。中国人民已经适应了一定形式保留下来的古典和民间戏曲。唱腔、节拍、演唱风格、杂技以及夸张的形态都被保存了下来。

为了一个陌生的演出目的，给观众一个他们熟悉的戏曲形式。

虽然西方对舞台、布景、道具的改革以及把乐队从舞台上搬到台下的革新，看起来似乎很古怪，但中西合璧（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的效果，的确要比没有歌唱和舞蹈，只有对白的纯粹的话剧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文革期间，“破旧立新”的口号被广泛地运用到了表演艺术和其他众多的领域。

戏剧是语言，而非身体的展示。

江青以革命的名义禁止了各种娱乐形式——音乐、戏剧和电影，却催生出了一批被挑选出来的模范剧目。

于是，样板戏诞生了。

“样板”（指“模式”或“模范”）一词的演变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意义。

1950年代后期，所谓的“样板”一般所指的是“样板田”，在“大跃进”中被广泛地仿效而建立的农田。于是，“样板”这个术语便逐渐从经济基础上升到了上层建筑。其含义是大众文化和农业生产都需要树立起一个模范代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这个“模范代表”每每会随着革命领导人及其时代而改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1968年已经创作出了8个样板戏：

4部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2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此外，还有表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舞台雕塑《收租院》。

中国现代大型泥塑群像。创作于1965年6~10月，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

作者是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学生李绍端、龙绪理、廖德虎、张绍熙、范德高及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参加了后期的创作。

收租院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现场构思创作,共塑 7 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

它们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 114 个真人大小的人物。

雕塑家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为一体,生动、深刻地塑造出如此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可谓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空前的创举。

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再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事实。

在这组作品中,写实风格和泥土材料的运用颇为恰当,中、西雕塑技巧的融合也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效果。

收租院于 1965~1966 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 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

创作于 1965 年 6-10 月的现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因新中国阶级斗争需要而诞生。

《收租院》今陈列于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以连续情节展示地主收租全过程,集中再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原仅希望塑造一组反映地主阶级罪恶的展模,没想到带来一件震撼世界的艺术作品。至今,《收租院》已吸引近百个国家数以千万观众。

先后参与《收租院》创作的 19 名作者，14 人来自四川美术学院。

刘文彩庄园位于大邑县安仁镇，距成都 50 余公里，占地百余亩，极尽奢华。

1958 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设立，目的是展现大地主刘文彩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随后，陈列馆用石膏小人做过地主《百罪图》、真人大小的蜡像模型等。

1964 年上半年，陈列馆提出，利用庄园背后收租现场，陈列地主收租用的大斗小秤、飞轮风谷机等工具，让实物说话。

展出后，观众觉得 1000 多平方米、两个四合院太空荡，没感染力，提出塑像。

1965 年 5 月 11 日由于计划当年国庆展出，人手太紧，于是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给川美发函，请求支援《收租院》。

学院领导相当重视，认为是一个为农民服务的良机，于是派人前往考察，并主动联系四川省文化局，要求下达公函，以任务方式下达，决定由雕塑系任课教师带领毕业学生作为毕业创作。

经过思想动员会，师生们向院党委立下保证书，1965 年 6 月 4 日，美院雕塑系教师赵树同、王官乙带领 5 名学生赶到大邑。

美院师生抵达后，与陈列馆两名美工、一名文化馆干部和一位半农半艺的民间艺人汇合，一支特殊的集体创作队伍成立。

首先是访贫问苦，调查走访活着的刘文彩的总管家、五姨太、狗腿子等人，对收租的各个细节烂熟于胸。

如此大规模的雕塑，当时谁也没搞过，开始是庄园美工设计的一组简单展示收租的过程，总人数不到一个排，只占全部面积 1/3。

创作组发动全体人员思考，要求每人拿出一个方案或一段情节，然后再开会讨论。

每次开会都争论激烈，如今天看到的刘文彩出场、账房设立、现场柱子等，都是争议达成。

讨论中，还取消了很多情节，比如刘文彩五姨太嫌农民汗臭，捏着鼻子出场的情景，狗腿子提着鸟笼子出场的情景等。

这些细节虽引人发笑，但易喧宾夺主。

文稿经半个多月修改，最后确定出场人物 114 个，其中 82 个男人，32 个女人，17 个老人，18 个少年儿童。正面人物 96 个，反面人物 18 个，还有一条狗，总人物增至一个连。

风谷机等真道具 50 多具，26 组情节，总体安排为：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同时，雕塑者们决定做等人大小的彩塑《收租院》。

彩塑是中国民间传统办法，庙宇中常见，最关键的是不经翻制工序，花钱少，速度快，适合当时提倡的“多、快、好、省”精神。

泥塑正式动工是 1965 年 6 月 23 日，搭架用的木料是到集市上买的柴禾，收租院外面田里取的泥，隔壁农民家借用的稻草。

当时算下来，每尊塑像成本不过几元钱。

设想出来后，没有小样模型，如采取传统画设计图的办法，时间根本不够。于是，创作组 10 多个人现场自编自演，模拟情节和人物

位置排放。后来，创作组又向农民求援，附近生产队长带来 10 多位农民，包括老人和小孩，带上箩筐、背篋等，表演交租情景，生动真实。

上级听说创作组情况后，6 月 14 日，派彭县川剧团演员到现场表演，拍成照片，剪接形成长卷设计图，配上构思、构图说明，总设计图从而形成。

雕塑中采用流水作业方式，搭架、上大形粗泥、细泥刻画等分阶段交叉进行，充分发挥每人所长。

雕塑中土洋结合，各有所长，美院师生长于结构学，民间艺人则善做衣纹、布饰。

创作现场欢迎附近农民进去看塑像，听他们议论，征求意见并随时修改。

一次，一个农民看到推鸡公车去交租的老农说，双手握车把，不能用手擦汗水，额头上汗水是顺着根稻草下滴。于是，创作人员在鸡公车老农额头塑出一根稻草伸出，成为经典细节。

同时，还鼓励创作人员积极赶场，采集人物形象。

王官乙说，有次，他在集市看到两个小姑娘，一个靠着空背篋打瞌睡，一个在疲惫地发呆，赶快拍照，回去后用在牢房外等候母亲的两个小女孩身上。

一些创作人员赶场时看人眼神过于专注，竟被群众当坏人。

泥塑借鉴了民间传统艺术，创作组人员集体跑到成都、新都等地城隍庙参观泥菩萨。

在成都参观一座城隍庙时，大门紧闭，年轻的创作人员竟翻窗爬进去，大家在什么活捉王魁、下地狱、抓鬼的泥塑面前看得如痴似醉。

创作人员回忆，《收租院》塑造过程中，农民群众一直是最好的鉴定人，农民是否喜欢，成为这个创作的唯一标杆。

雕塑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农民来参观。

当年9月13日，当时的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武等带着记者来到现场，看后十分兴奋，称《收租院》是又一颗原子弹，并当场决定大力宣传，在北京展览。

当年国庆，《收租院》如期举行预展，三天来了两万人。

12月24日，40个真人大小的复制泥塑和部分大型照片组成的《收租院》，在北京展览正式开幕，观众如潮，新闻报道铺天盖地。

北京展览到3月6日结束，接待观众47万余人。相关部门估计，当时北京想看《收租院》的群众，至少有200万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当年所搞的样板戏越来越显现出了它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每一个样板戏的出现都是国内的一件大事，都会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中。同时，党刊《红旗》也会作出哲学诠释。

《红旗》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8部“革命经典”逐渐扩大到了绘画艺术。

最著名的是一幅油画肖像（形式是西方的），画的是 20 年代的青年毛泽东穿着蓝袍去安源煤矿调查工人的劳动条件。

《毛主席去安源》是油画作品名。

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 年）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 年）为表现题材的油画。

该画“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文革期间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

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 9 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创造了中外美术史上的神话，200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江西省萍乡市有关部门决定依照该画原作中毛的形象，塑造一尊毛泽东青铜雕塑像，安放在萍乡市安源煤矿新建的广场上。

《毛主席去安源》是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 年）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 年）为表现题材的油画。该画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文革期间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

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中的一幅画。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参与执笔创作。

1967 年 10 月 1 日该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

次年 5 月《人民画报》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名、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

1968年7月1日经当时江青批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隆重、热烈、公开发表。

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

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

该画采用左右对称的图式构成，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他身穿长衫，手拿油纸伞。

有人批评虽然山风吹拂着长衫，但身体结构的轮廓一点也没有得到体现。

地上的草丛就像笨拙的工匠式描画，只好用阴影遮盖幼稚的技法。

画作的批判矛头，直指否定刘少奇曾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以证实他以前就是一个“叛徒和工贼”，达到彻底打倒刘的目的（文革前侯一民画过一幅《刘少奇与安源工人》[1961]的油画）。

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告：

毛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对该画的政治意图，1968年第9期《人民画报》曾报道：

“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诞生了！这幅油画成功地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光辉形象和革命实践，是一幅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艺术珍品。”

其后该画被收入全国统一的中小学课本作插图，并被仿制成上百种毛主席纪念像章、石膏工艺品等，广为传播。

在文化破坏速度超过文化建设的几年里，江青不断为新戏曲模式的局限性作辩护。

她在 1967 年的一次谈话中说：

“如果新戏剧像以前那样匆匆拼凑而成，人民会打倒我们的。现在，最好让这八个样板戏统治舞台。因为它们没有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

芭蕾和交响乐也做了改革。

她说：

“虽然它们还有缺点和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进，但至少我们已经引起了轰动，震惊了世界。”

江青和她的专家助理们无疑是激进文化变革的领袖。

他们感到急需破除游荡于个人思想中的资产阶级观念，培养集体创作的无产阶级思想。

这个想法来自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 60 年代被广泛应用的政治术语。

在《关于京剧革命》（1964）的演讲中，江青赞扬了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推行的“领导、创作人员、群众三结合”的做法。

剧作家在体验现实生活后再创作，在舞台排练的每一阶段都要吸取群众的意见。

8 年后，在我们的交谈中，江青的口气一下子显得额外严肃了起来：

“所有舞台作品都要听从群众的意见。好的意见要听取，错误的要拒绝，不能决定的暂时放一放。我们将此称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我问她：

“如果这是民主集中制，那么对话剧又会采取什么做法呢？”

江青回答的很干脆：

“文革期间，我一直试图修改一些话剧，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合作。”

作为戏曲界“泰斗”的作家、制作人和演员，他们的价值观和演出风格形成于 30 年代和 40 年代，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中的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

尽管这些戏曲界名流也能像其他人一样住在延安的窑洞里，跟所有人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可一旦回到他们熟悉和喜欢的城市，便即刻恢复了他们的本性，对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是情有独钟。

豪华的房子和家具成了隔离他们与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屏障。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重新转换观念，我们耗费了多大的精力啊！”

江青感叹道。

长期来看，江青的努力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我有些疑惑：

“尽管某些剧作家的生活方式难以改变，对创作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不感兴趣，不是还有其他的人可以根据党的需要重新创作中西结合的话剧吗？”

“这取决于话剧的性质、剧作家改革的意愿以及演员适应新角色的能力。”

她说：

“现在大部分剧作家都已经不再享受小院里奢华，他们与领导人一起深入到作品需要表现的群众中去了。创作话剧的首要问题是一个领导能力的问题。要掌握在适当的时候施加适当的压力。领导人应该支持话剧的复兴与改造！”

她自信地说：

“这样，才能使他们的视野开阔起来！”

江青推动创作样板话剧始于 1960 年代早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也上林彪主导军事时期）。

当时，她希望重新排演几个军事题材的新话剧。

根据她的要求，剧团很快搞出三部戏。

一部是《雷锋》，歌颂一位在军队里成长起来的青年英雄。他在 1963 年牺牲后，成了新中国家喻户晓的学习榜样。

另一部是《长征》，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共产党起死回生的故事。

第三部是《南方来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情景剧。

《南方来信》讲述越南南方人民面对敌人的刺刀，没有唉声叹气，而是挺起胸膛，为祖国的统一、荣誉，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十多年来，越南南方人民越战越强，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现在已建立起强大的解放军，并解放了越南南方四分之三的土地和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深深陷入无底洞，无法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命运。

《南方来信》是越南南方人民写给越南北方亲人的信，也是一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控诉书。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越南南方人民采用种种恐怖手段，无恶不作。

1964年，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南方来信》书信集出版，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

《南方来信》是越南以北纬17度划线后的南方的离散民众、游击队、地下党，给北方的亲人写的信件。

越文的序言说，由于几百米宽的界河阻隔，“许多信件不得不越过国境线，乘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绕道亚洲、非洲、美洲，最后来到河内，好像一群漂泊的鸟儿，寻道巢。

许多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封皮已经皱褶不堪，字迹模糊。”

那一段时间，空中电波里几乎每天都传送着声情并茂的朗读，《南方来信》接连出了第一集、第二集，一时洛阳纸贵，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之一。

在总政话剧团将《南方来信》搬上舞台后，前线话剧团也根据原剧本上演了前线版《南方来信》，可惜又是一部有戏单不见剧照的剧目（不知“玻璃”能否寻到一二？）。

而戏单上线条极其概括的两棵风中挺立的椰树，正是来自《南方来信》第一集的封面。

不久，总政话剧团就在人大小礼堂推出“专场演出”，周总理和朱德、董必武、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饶有兴致地看了戏。

《南方来信》继续热演不衰。

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总政排演场看戏，接连看了3遍，还提了一些意见。

总团领导当然是高度重视，陪伴左右，随时记下江青的意见。

其实江青的意见，多是无碍大局的“枝枝蔓蔓”，有的好改，有的不好改，比如她提出要砍掉伪军“韩老五”和伪军家属“韩老五妻”这两个人物，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就觉得有这两个人物“铺垫”，戏剧效果挺好。

终于有一天，江青嫌傅铎他们没有按她的意见“不走样”地修改，颇为恼火地说：

“你们是不是又听了什么高明人士的意见，越改越倒退，第五场改出了个大瘤子！”

江青所指的高明人士就是罗总长。

那天，江青越说越来气，末了披上黑斗篷扬长而去，竟再未登总政文工团的大门，为此埋下了祸根。打倒“四人帮”之后，这成了她反党反人民的“铁证”。

1965年春，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南方来信》改编成电影。

于是文化部又在这年夏天，组成戏剧电影观摩团，由傅铎带队，赴越南体验生活。

当时美军已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河内市几乎每天都在拉警报。

在“重灾区”清化市的那天晚上，傅铎他们正驱车赶往一个高射炮阵地采访，突然警报长鸣，他们随即跳下车，还没等找好藏身之处，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带着刺耳的呼啸声飞泻而下，天地间顿时腾起一片火海。

5

最初的样板戏剧，并不是很成功的。

没有部队生活经历的剧作家是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来的。

早期版本中的演员缺乏军事阅历，只会在舞台上走阔步，炫耀与军人无关的城市习气。

他们的表演根本配合不上当前的政治！

江青强调：

“把故事从一种形式改编成另一种形式，从小说到话剧、到歌剧、再到电影，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她发现当前戏剧和电影是最受欢迎的媒介。

因为观众熟悉戏剧的形式，对内容的大幅度修改也是可以接受的。

从长远看，电影更经济、更容易发行到中国众多而又分散的人群中去。

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抵触。

她提到一部从话剧改编成歌剧，最初叫《长城》，后来改名《南海长城》的作品。

从筹备拍摄到公映，《南海长城》历经坎坷，花了12年时间，横跨十年“文革”时期，堪称中国电影史无前例的奇事。

《南海长城》最终完成于1976年9月，影片的创作人员在“文革”前后都曾参与创作过有相当艺术水准的电影作品，这次是在被动的创作条件下，集体完成了符合当时风行文坛“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南海长城》。

从《南海长城》的人物及人物关系的设置和构成来看，“三突出”的原则体现得还是很清晰的。

在一大批无名无姓的正面基本群众(主要是民兵连的民兵们)中，突出了一个英雄人物群体，如甜女、赤卫伯、钟阿婆和县委江书记等人，他们又都众星捧月地烘托出中心人物——民兵连长区英才。

影片中人物地位的主次同人物作用的发挥成正比联系，中心人物区英才政治觉悟最高、斗争眼界最宽、号召力最强，具有统领和主导一切的力量。

并且，他形象的高大完美不仅取决于政治高度和斗争水平，也显现为道德操守的纯洁无瑕。

在区英才同阿螺、靓仔的冲突中，这后一方面蕴含的意义很耐今天的人们寻味。

甜女、赤卫伯、钟阿婆、江书记等人，紧紧围绕在区英才的周围，拱卫着他的至高地位，起着衬托和无条件支持的作用。

而基本群众的出场，一是为了显示中心人物的言行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心声，因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二是说明中心人物所投身的事业具有伟大的力量，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与正面人物相对的，是影片中的反面人物，如窜犯大陆的敌军司令何从、副司令王中王、潜伏的敌特卫太利等。

这里特意要提到王中王这一人物，他近乎歇斯底里的疯狂与顽固是同他曾经的渔霸身份和眼下的复辟动机密切相联的。

借此，一次敌对的军事进攻行动同阶级之间的较量与斗争联系在一起，影片的政治斗争主题也得以宣示和显露。

在“文革”电影中，正反两类人物之间，常常还要出现一些落后的中间人物，展现他们同中心人物的矛盾冲突，是为了揭示“思想”或“路线”斗争的层面。

这些人物最后的结局，不外乎幡然醒悟或变质堕落。

《南海长城》中的阿螺和靓仔就是这样的人物，只是这二人最后都选择了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而促使他们转变的，都有主人公一番抚今追昔，忆苦思甜教诲与劝导。

这是“三突出”原则下最为通行习见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模式，这一模式的完成是与一定的情节模式互为依托的，对于人物及人物关系的摆布，都要在一定的故事事件和剧情冲突中实现。

在“文革”电影中，这二者甚至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

为了在具体创作环节中实践并达成“三突出”，还有与之配套的三陪衬、多侧面、多浪头、多回合、多波澜、多层次等一整套规定和要求来对创作，特别是情节构思进行约束和规范。

“三突出”最早是于会泳在 1968 年提出来的，表述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

1969 年，姚文元又概括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由于将其视为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实践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故而被命名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

《南海长城》的艺术顾问是江青。

江青做艺术顾问并不是徒有虚名，她已经搞完了样板戏，现在她要树立“样板电影”，她将《南海长城》当作她样板电影的开篇之作。

她与剧团领导和作者商谈修改意见，接着审查严寄洲的资格，在调看了严寄洲导演的影片后，首肯了他的导演才能，并对影片的导演、摄影、演员等方方面面异常关注，事事过问，指令反复无常，搅得严寄洲几乎抓狂。

严寄洲解放后才从事导演工作，处女作《脚印》是部反特片，随后又导演了《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

接到导演《南海长城》的任务后，他专程到广州观看了这出话剧，并与编剧赵寰一起下部队体验生活。

回北京后，他选定赵汝平出任男主角区英才，邀请上影的王蓓扮演女主角阿螺，并且很快写出了分镜头剧本，送交江青。

几天后，江青召来严寄洲、八一厂厂长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讨论剧本。

她认为赵汝平缺少英俊挺拔的气质，建议换演员。

几番折腾，终于确定由王心刚扮演区英才，王蓓扮演阿螺，作曲、演唱和摄影也依照江青的意愿换了人。

对演员的要求，江青考虑得也很多，她对严寄洲说，我们拍的是无产阶级的彩色片，演员的皮肤不能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白皙粉嫩，从明天起，你就让他们晒太阳，把皮肤晒成黑红黑红的。

可化妆师不同意，说晒暴了皮就没法化妆了。

但江青盯得紧，严寄洲只好让演员在院子里转几圈应付了事。

严寄洲重新修改了分镜头剧本，他感觉剧本太过政治性，缺少人情味，主角区英才比较概念化，不能让人物捧着毛主席著作读读，说几句毛主席的话，于是，他加强了阿螺的戏份，把区英才的妻子阿螺改成主要人物，以她的教训作为全剧主线，着重描写她的和平麻痹思想，受到特务的蒙骗后重新拿起枪战斗的思想转变过程。

这样可以增强艺术效果，深化主题，让故事多点人情味和戏剧冲突。

江青看了非常不满，她指责严寄洲说，你这是在搞中间人物，区英才才是一号人物，应该突出他才对。

比如他追捕匪首的情节，他可以把匕首含在嘴里，从悬崖上跳海追击，那画面多精彩呀。

严寄洲反驳说，那不行，那么高的悬崖，含着刀跳下去，惯性会把他的嘴震豁的。

江青说，这是艺术真实嘛。

1965年冬天，《南海长城》拍完全部外景，严寄洲携带样片去上海送江青审看。

江青不满地说，王蓓根本没有女民兵气质，要撤换。我要你拍出大江东去的气概，你却拍成了小桥流水。区英才这个人物在舞台上就不够高大，如果这个英雄人物写不好，那整部影片就失败了。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海、空三军。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去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外景也要重拍。

“文革”中，谢铁骊被江青选中，走出“牛棚”钻进摄影棚，参加样板戏的拍摄。

在八个样板戏中，谢铁骊主持导演了其中的五部：《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和《红色娘子军》。

于会泳 1920 年出生，山东人。

40 年代加入胶东文工团走进了革命文艺队伍，50 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得意门生，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面颇有成就。

刘庆棠《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扮演者。

1932年出生，辽宁盖县人，40年代末参加解放军文工团，解放后，先后在北京和前苏联学习民族舞和芭蕾舞，在中央芭蕾舞团当演员，1964年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男主角洪常青一举成名。

6

江青所做的最新的尝试是想将传统的中国小说（几百年来就是中国戏剧题材的来源）改编成革命戏剧。

虽然一些资产阶级剧作家已经将《三国演义》的部分情节写入当代戏剧，但是，经过多年来对剧本、配乐及舞台监督的修改，最终的版本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将文学作品改编成革命戏剧，离不开领导的准许并给予最大的支持。同时，也伴随着会有人反对的风险。

当她与延安“鲁艺”的同事们在延安的旷野中创作革命音乐时，没有资源、没有现成的音乐，手头也没有外国音乐可供借鉴，他们只能将目光转向地方音乐。

他们收集民谣，用自己的乐器演奏。

他们书写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的抒情诗。

尽管知道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可有人还是大胆地借用地方“情歌”的曲调，填写上他们改写后的歌词。

江青谨慎地说：

“我本人没有参与过对这些曲调的改编，但我认为其效果还是很好的，群众也容易接受。”

回到话剧主题，她说：

“需要修改的话剧可以分为三个类别：首先，那些具有反革命思想的剧作，根本不值得修改；第二类是有好的动机，但表现手法粗糙，似乎很难修改；第三类虽有好的动机，但表现过于平淡，特别是没有突出主题的化妆、音乐、服装，弄得大部分群众搞不清楚它的主题和动机，这一类是最难修改的。”

第一个类型的例子是女戏剧家蓝光的作品。

当江青在上海到处寻找可修改的剧本时，有人将蓝光的《最后一幕》推荐给了她。

《最后一幕》，中国话剧作品。蓝光编剧。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8年首演。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敌演剧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斗争的故事。

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8年首演。

剧本发表在1958年《剧本》第6期。

1959年、1964年分别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最后一幕》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敌演剧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斗争的故事。

一支“抗敌演剧队”经历了10年特殊的斗争生活之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之时面临着新的压迫和危险。

反动派加强特务统治，强令演出“勘乱”戏，妄图破坏地下党的活动，把演剧队纳入反共宣传的行列。

“演剧队”以应放、白静娴为首的地下党员，坚持革命立场，团结全体队员，以巧妙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终于冲破重重封锁，全队安全撤回解放区。

全剧成功地塑造了善于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斗争的应放、白静娴等形象，并通过演剧队生活的一角，展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文化、学生运动等方面复杂的斗争现实。

今天，人们已经不记得蓝光了，知道她的《最后一幕》的人更上少之又少。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最后一幕》的剧情，几乎已经没什么印象。

大致的剧情，无非是国共两党在一个小小的演剧队里明争暗斗，应放等地下党员坚持要演出进步戏剧，而向世仁等国民党人则强令演出反共“戡乱”戏，双方斗智斗勇，到最后应放等人带着演员“胜利大逃亡”，安全撤回了解放区。

提起蓝光的《最后一幕》，让江青回想起了 30 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痛苦经历。

当时国民党镇压所有的政治活动，文艺工作者也不得不退到幕后工作。

看过剧本之后，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情，江青最后还是拿起电话通知了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禁止了该剧在上海重演。

《杜鹃山》最初是上海创作的一出话剧。

《杜鹃山》讲述的是党从井冈山派柯湘到湘赣边界的杜鹃山领导一支农民自卫军。

途中柯湘被捕，恰巧被自卫军营救。

自此，柯湘担任了自卫军的党代表。

她宣传党的阶级政策，团结群众，不断扩大武装。

地主武装头子毒蛇胆勾结自卫军中的叛徒温其久，抓住雷刚的义母，诱雷刚下山，妄图一举消灭自卫军。

柯湘识破敌人毒计，主张用敌进我退的办法，会合主力，粉碎敌人的进犯。

雷刚不听劝阻，莽撞下山救母，结果中计被捕。

柯湘率尖刀班救出雷刚母子，清除了叛徒。改造了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

有人试图将话剧改编成京剧。但他们的改编失败了。

江青认为：

“作品没有体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风格，剧中的英雄和老乞丐没什么分别。”

尽管如此，作品还是引起了江青强烈的共鸣。她亲自组织一班人马重新改编，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杜鹃山》在上世纪后期风靡神州大地。

如果很难将话剧提高到当前革命的标准，那么传统戏曲又如何呢？

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广受欢迎。

江青开始讲述古老剧种的深奥与精髓。

江青是在山东长大的，小时候昆曲（起源于苏州，为士大夫所情有独钟）很普遍，但很少有观众。剧院内只有前排的座位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人。观众大部分是教授和知识分子，他们总是一边看戏一边看着剧本。

同样，在北京的剧院里（尽管戏曲已不像以前那样神秘，而且取材于大家熟悉的历史），观众也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座位都是空空荡荡的。

上海有不同的地方戏，融合了几个地方流派的风格，包括天津和北京戏曲的特点和秦腔。

它们的观众也很少。

为免这些剧团在解放后破产，国家为每一个剧团每年提供 200 至 300 元的补助。

后来干脆门票免费，但观众仍然稀少。

江青淡淡地说：

“如果接到一张免费门票，我也不会去看戏的。这正好说明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戏曲并不受人民大众所喜爱，甚至于有些内容是反动和腐朽的。但是有些方面，比如昆曲中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借鉴的，有几个昆曲老调已经被我们整理后用在了新的作品上。”

江青搞的几个样板戏其实是几个地方戏的整合。

它们体现了上海戏曲（30年代带有炫目迷人的好莱坞风格）和准剧（在上海得到发展）的特点。

随后创作的其他戏曲融合了京剧里的山东流派以及贵州、内蒙等地方戏。

60年代初，江青开始调查各种戏曲种类。

记得一次观看京剧演出。观众仍然稀少，老剧场的灯光效果不是很好，从舞台上就可以看清楚下面观众的脸。

江青回忆说：

“著名演员马长礼出场时看见了我，一时间竟然忘了台词，不做声地站在那里，直到我点头向他致意，才回过神来。”

这件事给江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江青说：

“不借鉴过去就想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模式是不可能的。需要谨慎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为此，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融合了古典芭蕾的乐曲，而革命京剧《龙江颂》则突出了传统乐器。

外国人或许会认为，通过不断地修改旧作品来达到创作新作品的目的，其实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换汤不换药”。

江青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的，中国也不是世界上唯一这么做的国家。

历史学家应该明白：这些创新戏剧吸收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建立在现实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础上的。这也正是毛主席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具体实践。

为了这几个样板戏，江青阅读了大量的军事著作。

江青兴致勃勃地说：

“为了这个目标，我走到了群众中去，又一次和他们并肩作战！”

音乐、戏剧和口头传颂的文学一样，可以不通过表演流传下来。但电影则和绘画雕塑一样，本身就是完整的艺术主体。可以简单地破坏、或是把它们封存起来吗？

现在还没人找到答案。

有了1964年京剧汇演的成功经验，江青的下一个计划是第二年的电影节。

如同以前的做法一样，她首先在全国大造舆论，然后确立新的创作方针。

开始时，她的努力受到了文化部长周扬及其电影界代理人的百般阻扰。

1966年，《红旗》杂志报道称：

江青同志判处了“电影界中资产阶级的死刑。”

旧电影中宣扬的“封资修”的东西，被批判为“虚无缥缈与颓废”。江青极力倡导的是：要用“党的民主集中制”取代“以导演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

在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没有人敢提及江青本人以前就是一位电影明星。

电影演员和制版人、导演一道在运动中虽然都受到了冲击，但他们依旧在党的领导下创作出了非常好的作品。

在消沉的文化环境中，如何选出好的作品，信任技术人员，凝聚人才，去开始电影创作的呢？

江青说：

“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

生产一部好的电影，要比演出戏剧费力得多。

这是因为电影艺术具有多面性，技术也很复杂。

江青没有从事过电影制作的经验，她的努力一开始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例如，在河北保定的一家电影制片厂里存放着一批经江青批准过的电影底片。有人憎恨她的作品，计划用手榴弹炸毁底片。如果他们成功了的话，会失去所有的新作品。

江青试图制止破坏，但没有成功。

她请周恩来出面干预，才使破坏活动没有成功。

更棘手的是，有人在背后怂恿制片厂的技术人员篡改她拍摄的影片，让影片颜色看起来发红、不自然。他们的破坏活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有一次，她请了三个摄影师和导演到颐和园做一天的拍摄。

拍摄对象是正在和其他运动员练球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

几天后，他们再次会面观看效果时，发现别人用的胶片红绿色彩都消失了。而她用自己的设备冲洗出来的胶片效果却很自然。她相信这再次证明胶片冲印厂中有人恶意破坏。

看到江青的失败，有人幸灾乐祸地问她：

“江青同志，最近创作了什么新影片吗？”

江青说：

“对我来说，这些小动作只是后来他们对我持续骚扰的序幕。”

江青不只一次地提到，其他国家电影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电影可以从中学到许多的东西。

她对我说：

“如果有时间，真想和你一起看几部精彩的电影。当然，是我喜欢看的电影。”

她提到了墨西哥电影《冷酷的心》。

尽管电影美化殖民主义的内容是反动的，但对光和色彩的技术处理好得很哟，妙不可言。

然而，在中国他们看不到原版电影。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也包括江青。

三个拷贝都有中文配音，一个存放在中央委员会，一个在上海，第三个拷贝在北京（可能就是我和江青观看的这一部）。

《冷酷的心》是由1967年蒂托·达维松执导，由安赫丽卡·玛丽娅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

讲述了十九世纪末，庄园主弗朗西斯科将自己的私生子胡安以收养的名义留在自己的莱尔庄园生活，胡安同父异母的弟弟安德烈斯·莱纳多虽不知情，但他对胡安颇有好感，待他犹如自己的亲生兄弟，可莱纳多的母亲索菲亚却对胡安怀着深深的仇恨，为此，胡安逃离了庄园。

而胡安的父亲，同时也就是莱纳多的父亲，为了寻找胡安，不幸摔下了悬崖逝世，胡安听到消息后赶回庄园，可索菲亚却不让胡安接近自己的父亲。胡安被送离庄园，上了一条开往南美洲的船，从此成了一名海上的飘零人。

《冷酷的心》是德国童话作家豪夫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童话名篇。

无论是江青的那个年代还是现在，也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喜欢活在童话般的梦境里。

江青的梦想是要制作出自己的电影。

最大的问题和困难，是人才难觅。

她必须劝说人们冒着危险，甚至是生命危险参加她领导的这场革命。

她承认：演员都是“很有主见的”，很难争取过来。

拿童祥苓的例子来说，他当时是现代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男主角。他姐姐童芷苓也是京剧演员。据说私生活的名声不好，用江青的话说：“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她的兄弟也有放荡不羁的名声。

江青第一次注意到童祥苓是在北京和上海物色演员的时候。

在她所见过的人中，没有人可以同时拥有年轻、俊美、嗓音、表演和舞蹈的天赋。

童祥苓的嗓音很出色，但不能确定他的舞蹈是否同样出色？

因此，江青让他在《红灯记》的早期排演中扮演一个小角色，测试他的能力。

他的姐姐当时扮演的是李奶奶，她的表演最吸引人。

但吸引江青的不是李奶奶，而是童祥苓。

她从童祥苓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演出结束后，江青在后台找到他：

“你是一个业余，还是专业演员？”

江青问他。

江青的问题让他很惊讶。

他脱口而出：

“我是一个京剧迷，我会翻筋斗（京剧中必要的动作）。”

答非所问。

童祥苓“笨拙”的表现（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让江青相信了眼前的小伙子很有潜力，一定会有前途的。

为了进一步考查童祥苓，她请张春桥去接触和了解他。

通过张春桥，她了解到童在演唱和舞蹈方面多才多艺。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态度非常坚定，相信党中央，拥护毛主席！

江青很高兴，亲自拍板让他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英雄杨子荣。

当“516 份子”得知他们所信任的童祥苓已改换门庭投在江青麾下，便想方设法要将他置于他们的“监护”下，以免他为江青所用。

江青得知这一消息后，很生气，并严厉地警告他们这些人：

“没有人可以碰我的演员！”

显然，她的话不够分量，“516 份子”并没有让步。

他们谎称可以给童特殊待遇，只要他肯到北京来。

童祥苓的姐姐动心了。

不管姐姐如何，童祥苓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最终，他不是个人而是与剧团一起应邀到了北京，参加了由江青主导的电影制作。

江青被告之，剧团一到北京就被人“剥夺”了应有的正常待遇，住房和伙食都糟透了。

江青返回北京后，将演员的遭遇汇报给了副总理谢富治。

她和谢副总理一起去视察了制片厂和宿舍，改善了住房、伙食和交通。

她个人保证说：

“演员们会吃上热饭，以保护嗓音。”

同样，江青的警告仍然不够份量。

影片《智取威虎山》开拍了。

舞台电源突然被人切断了，热饭也停止了供应。

江青愤怒了。

决定把她的项目置于军管之下。

国务院的谢镗忠应她的要求，下令 8341 部队（驻扎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特别卫队）保护这些演员们。

由于缺少有经验的剧作家、制片人、导演和演员，江青别无选择，只能从戏剧和芭蕾舞团中挑选信得过的演员，为电影艺术培养人才。

问题来了。

戏剧演员熟悉的豪放和夸张的表演在电影里就会显得过分，而且很不自然。

江青对这些没有更多的解释。

演员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学习外国电影表演的机会很少。

当他们第一次站在灼热的灯光和摄影机前时，很不适应。

必须让他们活跃起来。

江青给他们打气：

“你们不要害怕失败，党组织相信和支持你们！”

为了尽快地提高他们的表演技巧，江青选择了一些个人收藏的外国影片在影棚放映。

她说：

“要边看边对照自己，哪些可以借鉴，哪些错误应该避免。”

童祥苓上跟随江青进行电影革命的主要演员之一，其他人也很快加入进来。

包括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主角的英俊男芭蕾舞演员刘庆棠。

《红灯记》主角浩亮。

《沙家浜》中表现出色的谭元寿及著名演员马长礼被江青点名在剧中扮演反面角色。

江青知道，这些演员对她的忠诚很容易便他们受别人的攻击。

她设法及时地找到刘庆棠、浩亮和谭元寿，将他们保护了起来，免受磨难。

但老迈的马长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江青的“敌人”抓了起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迫害。

刘庆棠，1932年生，辽宁盖县人。

早年学习舞蹈。

建国后，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

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其中那位英姿勃勃、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

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

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

“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

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文革中，演员们的生涯被重新改写。

江青也正是通过他们在尝试电影革命。

更多的演员在拍摄的不同阶段参与了进来。

这些有文学禀赋的人——浩亮、刘庆棠和于会泳——在江青的说服下，协助她创作电影脚本。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最后，他们创作出了全新的剧本、并通过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和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于会泳，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

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从而平步青云。

历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第十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于会泳，1926年生。山东省威海乳山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在文艺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被选送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9月，因学习成绩优异，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

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

1956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1962年9月，任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以全部精力投入《海港》《智取威虎山》两个剧目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后又参加了《杜鹃山》《龙江颂》等京剧的音乐创作。

“文化大革命”中因多次发表激进文章，受到江青等人赏识。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

1975年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

1977年8月31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1983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于会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高小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其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

1946年9月，他以一手好画和动人的二胡演奏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在文工团里，勤奋好学而又聪明能干的他，将编剧、导演、作曲等技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1946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艺术团。在艺术团几年里，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9月，穿着一身灰布军装的于会泳作为山东胶东文工团的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

入学不久，这个个头不高，国字脸宽额头，一副浓眉下长着一双不大却透着机智眼睛的新学员，就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解放初期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们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热情，但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和表演方式却十分陌生。

院长贺绿汀深知新中国的音乐创作要步入世界之林，对未来音乐家加强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在这所按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建立起来的高等音乐学府里，懂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人才实属风毛麟角。

于会泳入学不久，就比照文工团常用的创作方法，创作了小歌剧《夸妇婿》。

这出由他作词作曲导演并主演的小歌剧诙谐幽默，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工厂的演出中，博得了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

于会泳满肚子的民歌，以及他对传统说唱、戏曲的丰富知识，包括他虽嗓音沙哑，唱来却韵味无穷的本领，也令贺绿汀赞赏不已。

1950年，在音教班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经贺绿汀批准，留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从事创作和研究。

在音乐学院这个环境中，于会泳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又系统地学习作曲技术课程，同时积极主动参加了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先后出版了《山东大鼓》等专著。

在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的多部著作中，他于封面上蓄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重要位置。

为此党内对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进行了严正批评，结合他平常只钻研业务，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表现，也作为“白专典型”加以教育。

1958年春，为帮助他改造思想，特安排他去上海浦东下放劳动。

下放劳动因严重胃出血才3个月就回到学校，但他原担任的本科教学任务却已被别人替代，另安排他上进修生的课。

这一惩罚性措施使他对政治活动更加疏远，于会泳借口身体不好，时常请假逃避，一头扎进了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歌曲创作中。

于会泳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

“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1960年代初，于会泳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丰富的积累，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了“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

这两门课引起了国内音乐界人士的很大关注，并给予了很高评价。

学术研究和歌曲创作方面引人瞩目的成果，反而日益加深了于会泳在政治生活上的危机。

1962年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稍有宽松，在贺绿汀的竭力推荐下，于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但在党内他已成了一名“老运动员”。

一个“党内民主人士”的绰号，像尾巴一样紧跟着他了，只是由于侥幸，他才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江青问：

“于会泳是什么人？”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中国文艺界，次年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更把它推向了巅峰。

就在这年，于会泳受到感染，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展新的音乐程式和充分发挥唱腔的表现作用，提出自己系统的思考。

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6月初，一次江青她不久前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撰写的《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一文，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春桥尽快搜集了有关材料，包括于会泳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及评《红灯记》音乐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等文章，送到江青手中。

看着这些文章，江青喜从中来，大有想见恨晚之慨。

不久，她在锦江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事先专门点名要于会泳参加。

1966年初，于会泳因忙于创作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

他不仅忘我地投入到《海港》的音乐设计中去，而且积极参与《智》剧几个重点唱段的修改，使之更加完善。

于会泳不光在京剧音乐理论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且在音乐创作上富有才华，这更加重了他在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的分量。

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和上音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成了上海两出“样板戏”的实际总管。

而他确实为《智》剧和《海港》的修改百般操劳。

使江青、张春桥深感满意：他为江青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他殚精竭虑地使“样板戏”运用了中西混合乐队，大大拓展了“样板戏”音乐的表现能力；他主持了第二拨“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修改和排演，使这几出戏的艺术质量不但无逊于第一拨“样板戏”，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又各有不同的创新。

尤其是全剧运用韵白对话的《杜鹃山》，就是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

3年来，江青在电影方面有过三次不成功的尝试。

她和她的助手们最后终于拿出了一部成功的电影《智取威虎山》。

每一部电影都是在北京拍摄，而演职员的家还在上海。

江青深情地回忆道：

“演员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北京的项目，多次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他们和我一起坚守在北京的岗位上，直到影片成功为止！”

江青说：

“要理解六十年代演员的深刻变化，毕竟这些著名戏剧演员和其他的不太有名的演员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他们的思想觉悟一开始不可能都是先进的。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理解党的意图，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才能加快他们思想觉悟的转变，真正地做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为了说明这些革命性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江青刻意地安排我和浩亮、童芷苓还有其他电影演员和舞蹈演员会谈。

用她的话说，他们会向我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十七章、豪情壮志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自《三国志·吕蒙传》，比喻不冒危险，就难以成事。现今也用来比喻不经历艰苦的实践，就难以取得真知。

江青为什么要在《红灯记》成功演出时引用这句成语呢？

不难想象即便她身后站着毛泽东，她的事业笼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环之中，当她真想要为革命做出点什么贡献来时，同样是多么的艰难！

在江青所倡导的这场戏剧革命中，娱乐被降到了最次要的地位，反映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崛起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胜利是首要的。

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再现是历史剧的特点，正反人物的斗争贯穿始终。

江青认为自己属于共和国缔造者行列中的一员，为了让后人记住这个时代，有必要把简单的官方历史记载变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并通过剧中的英雄人物以革命戏剧和芭蕾舞的形式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

革命戏剧的另外一个重要性是展示革命战争中生命的生存比虚无缥缈的心理生存更重要。

也就是说比在持续的战争状态下保持个人心智健全和自尊更重要。

对戏剧及其表现的生活来说，埃斯库罗斯风格的复仇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忽略了的情感基础。

革命戏剧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它所描写的历史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而是遵循一定历史规律的。

因此，才不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存在的迷惑和恐惧。

这样的历史观否定造成个人悲剧的历史现实，与传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成王败寇”论不谋而合。

在戏剧和政治生活中为此牺牲的人会被尊为“烈士”，并在表演和群众性政治运动中受到颂扬。

看戏，是中国基本的社会活动。

戏剧，作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在革命政权下，每个人在家庭角色外又添加许多政治角色。

例如：

青年团员：

团员在大陆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服从于共产党的领导，信仰共产主义，是次于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者，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之一，和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一样，要求共青团员有先锋模范作用。

他，在青年学生中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实践中锻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对共青团员有一种更为形象的解释：

共：共产主义，信仰问题。

青：工作对象是青年，团干部队伍自身是青年。

团：团结带领广大青年跟党走团队，组织，团干部自身队伍。
共青团为共产党的后备主力军。

2

文革中，社会关系便是在以上这种受制约的角色中，而不像以前在较少受控制的个人之间进行。

来自中央的社会控制受到舞台的推动，戏剧人物被塑造成政治榜样，代表旧体制的奢华贵族的形象被身穿工人装的无产阶级人物所取代。

主要的敌人形象是贵族、地主和外国侵略者（一般是日本人）。

尽管革命舞台和生活中的阶级人物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现实和艺术中代表人物的尊重却得以保留。

此外，传统戏剧的教化功能也延续到了现代舞台上。

江青推崇的剧中的无产阶级人物是所有人的楷模。

当生活是对政治性艺术和演员的摹仿时，观众自然会陷入生活和艺术之间强烈的政治辩证关系中。

《红灯记》中铁梅的扮演者曾感言道：

“扮演英雄人物的过程就是从他们那里学习的过程。为了演好英雄人物，在台下必须向英雄人物学习，才能在舞台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缩小了与剧中英雄人物的差距。”

铁梅——李玉和的女儿，全名李铁梅，剧中昵称小铁梅。

首位扮演者刘长瑜。

她在剧中 17 岁，每天挎篮子上街做小买卖。

她实际上是李玉和的养女，烈士遗孤，生父是李玉和的师兄，父母都被杀害。

李奶奶是李玉和与师兄的师母，李玉和李奶奶将她抚养大，并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

李玉和李奶奶被日寇杀害后，她继续先烈遗志，将密电码送到北山游击队。

刘长瑜 1942 年出生在北京的东四八条。

父亲周大文，上世纪 20 年代奉系军阀进驻北京时，他曾出任北平市市长，和张学良是把兄弟。

刘长瑜原名周长瑜，是周大文 14 个子女之一，母亲姓刘，是周大文的三太太，出身穷苦人家，周长瑜是母亲生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女孩，后来刘氏与周大文离婚。

1961 年，周长瑜 19 岁，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时，听从校长的意见，随母改姓刘。

1993 年，刘长瑜到台湾演出时，曾经拜访张学良，张学良也去看她的演出。

真正让人们记住她的名字的，还是江青当年搞的那出样板戏《红灯记》。

旧社会被视为“下九流”的戏子，成了新社会的代言人。

戏曲演员在旧社会一般都是文盲。

尽管其中有少数人获得了财富和社会承认，但仍处于与杂质、马戏艺人一样的地位。

解放后，剧院和其他私有企业都逐步收归国有，演员们有了住房、工资和表演舞台。

但这样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机制之上的，他们只能演出被党认可的剧目，与旧社会他们可能即兴演出自己熟悉的剧目不同，“被解放的”演员必须准确无误地演出党提供的剧本。

江青经历过新、旧社会两种社会制度的舞台生涯，这种经历对她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角色起到了某种遥相呼应的作用。

从此，她不再做演员。

她所维护的社会也没有那段公开记录。

她是通过自身的政治和艺术才能结识毛泽东的，她一度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首席女歌手——一个为群众树立榜样的文化政委。

那些追随她的演员，不仅走上了革命舞台，也走进了革命历史。

70年代中期，她的文化英雄和上层建筑新星的巨幅相片被高悬墙上，遍布城乡。与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肩而立。

革命诗史对文学发展既有推动也有限制作用。

许多古代和现代的文化遗产文革中都受到了排斥。

党的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限制讽刺这种艺术形式。尽管江青的偶像——鲁迅，曾是社会讽刺的大师。

共产党只允许使用它来打击邪恶的阶级敌人，横行霸道的地方、国民党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

古往今来，讽刺作家笔下主要是描写穷人和权贵。

现政权下，穷人（群众）被歌颂，权贵（领导人）被颂扬。

江青的革命戏曲让穷人不再受喜剧的嘲弄，让权贵不再受悲剧的诽谤。

江青的革命标准高过了新的政治秩序。

她知道必须在人民和领导人中激起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感。从群众中来的英雄主义带来的影响极大。她期待她的努力能得到广泛的认同。

谈到 1966 年的一出戏剧时，江青说：

“我们不能局限于真人真事，也不能只塑造死去的英雄。事实上，活着的英雄要远远多于死去的英雄！”

第二年，北京大学的革命学生将她颂扬为“无产阶级的女英雄”，“毛泽东最好的学生”。

说她是让红旗的光芒照耀四方的“伟大的旗手”！

因为榜样的力量，让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作为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倡导者，毛泽东知道一个高效政府有时也需要在中央集权和地方政府之间取得平衡。

在 1957 年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每一个省都要有一到两名马克思和鲁迅。你们应该写文章，60 岁以下的人都应该写。”

每个省都应该培养理论家。我们培养男演员、女演员和画家，却没有培养理论家。

这是体制的缺陷。

你们依靠中央政府同，但中央政府从未禁止你们做自己该做的事。”

当然，作为毛泽东的追随者，江青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在人民大会堂的晚宴上，江青称她的革命戏曲《红灯记》是悲剧。

该剧展现了从 20 年代到日本侵华时期，一个三代家庭是如何以“英雄般的自我牺牲”反抗日本侵略的。剧中也描写了“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白区地下工作者解救在根据地以外为党工作的普通民众。

晚饭后，我们前往天桥剧场。

在那里，全场观众（满场）已经等候近一个多小时。

江青在戏剧性的气氛中步入会场。

一阵子惊愕的沉寂之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特效灯光的照射下，她看起来很激动，愉快地微笑着，扬起胳膊向到场的观众致意。

剧场的灯光暗了下来，江青（坐在我的左手边）低声讲述着相关剧目排演的小插曲。

为了免受路线斗争的干扰，她让参加演出的演员们远离北京，并和他们呆在一起。

周总理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向她通报北京的最新动向。

经过多次彩排和不断地修改润色，《红灯记》逐渐获得好评。人们最爱看的还是旧戏流传下来的做功。有时，江青及其助手们不得不让观众控制情绪。

主要演员浩亮记下排演进程，并定期向北京领导人汇报。

周恩来曾对这个节目担心，但在看过最新的排演后，终于露出了笑脸，表示喜欢这个节目。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演职员工的成功的信心。

大幕拉起，故事开始。

故事跨越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的历史时期。

代表一家三代的人物是：

李玉和——日本统治下的铁路扳道工，代表第二代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他的养母——李奶奶，代表第一代；

17岁的养女——李铁梅，在1923年的铁路罢工中成为孤儿，对年青一代很有感染力。

当时，日本占领东北，李玉和保管着送往山中共产党游击队的密码。另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日本宪兵抓获后叛变。李玉和被捕了。威逼利诱没有让他屈服。疯狂的鸠山便逮捕了他的全家并施以酷刑。

李玉和和李奶奶因为拒绝交出密电码被处死了。

幸存下来的李铁梅“化悲痛为力量”，发誓要报仇。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她躲过警察密探，带着父亲留下的红灯（象征未完成的革命），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密码交给了游击队。

苦难使她成为了一名革命接班人。

在第十五幕，李奶奶一段感人的唱词，回顾了 this 苦难家庭的历史。

江青眼里流着泪水，一直淌到脸上。

江青用白手绢擦着脸，说：

“毛主席家的 6 位家庭成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剧情时，都止不住泪水。”

接着，她又补充道：

“毛主席在《回韶山》诗中写道，‘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如果你想研究中共党史，就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诗词。那会给你一个清晰的路径，帮助你了解中国革命胜利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韶山在湖南湘潭县西北与湘乡、宁乡交界处，距湘潭 45 公里，是一条山峦绵亘的山冲，四周峰峦耸峙，林木葱笼，风景秀丽，相传舜南巡至此而奏“韶乐”以得名。

其西南有韶山主峰韶峰，海拔 500 米，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也为韶山八景之一。

《长沙府志》载，有韶氏三女，居山学道，有凤凰衔天书至，女皆仙去。山上有凤音亭，其南有东台、桃花洞仙迹可觅。昔人曾有“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之诗句赞颂韶山。

毛泽东的故居就座落在韶山落脉处的韶山嘴对面，叫上屋场。毛泽东诞生于此，并在韶山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是他早年开展革命斗争的地方，是当时中国农民运动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

3

幕间休息，江青把节目单递给坐在我们身后的翻译徐尔维同志。让她写出《红灯记》的英文标题。

徐用粗体大写字母写出英文标题后，递加给了江青。

江青兴致勃勃地重抄了一遍。

问徐道：

“怎么念？”

然后随着徐的嘴唇一字一板地唸道：

“红——灯——记》。

完事，江青转身问我道：

“The 代表什么意思？”

没等我回答，徐插嘴说：

“不代表什么。”

“哦——，那它就是一个虚词。”

江青把它理解成了中国古文中的语气词。跟在毛泽东身边久了，耳濡目染说话时多少带了些许学究气。

对李玉和探访狱中母亲的感人情节，江青解释说：

“因为他刚刚出狱，逻辑上他的头发和衣服应该是又脏又乱的。但考虑到他马上将成为烈士，我们让他的形象整洁些，因为他代表的是英雄。人民的英雄！我们并不追求自然主义。”

她继续说：

“在旧戏中，锣鼓不能充分地表现演员的表演，所以新剧中取消了这些乐器，改用西方打击乐来表明明快的韵律。特别是我们还使用了钢琴。”

闭幕后，江青走到后台向汗流浹背的演员表示祝贺。

显然，她的出现使演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在介绍浩亮时，江青说：

“他的政治觉悟比别人高，跟随我进行京剧革命。”

关于年轻活泼的刘长瑜（铁梅的扮演者），江青幽默地说：

“她的父亲曾是旧北平政府国民党的官员，但长大后却跟着共产党闹起了革命。”

袁世海（鸠山扮演者）在亚洲享有很高的声誉。一些日本领导人曾对江青说：

“中国的革命京剧中，‘反派’演得最成功！”

可见，任何时候日本人对侵华日军总是顶礼膜拜的。

我问浩亮：

“旧的历史剧会不会在近期排演？”

浩亮有所警惕地回答道：

“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旧戏不能反映今天的生活，现在黑五类和走资派阴谋剥夺江青同志创作的权力，她没有时间以现代形式革新旧的剧目。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的‘百花齐放’和‘破旧立新’。当然，我们也会将这个原则应用于传统戏曲。”

“政治不会一帆风顺……”

浩亮言犹未尽地继续说道：

“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直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在京剧领域，这种斗争尤其尖锐。3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正确路线，中心思想是艺术要为政治服务。根据这一精神，在延安创作了《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为什么现在不演了呢？就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问他：

“那些创作话剧的艺术家和剧作家的处境如何，他们创作的作品现在还在演出吗？”

浩亮回答说：

“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他接着改变了话题，问题是30年代的话剧毒害了50年代的创作。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杨贵妃的罗曼史在当代生活中存在着危险的偏向。

用他的话说：

“中国已是无产阶级的中国，但戏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这条路并不好走。”

说着，浩亮微笑了起来。不经意地掩饰着满头大汗。

他继续说：

“1963年，江青同志第一次到访我们的剧团，对我们讲话时就说了‘传统京剧近代以来如何变得顽固保守，拒绝顺应历史潮流。如果这个封建堡垒、死硬的传统艺术可以被改造，满足人民的需要，其他艺术，如文学、音乐和绘画也可以被改造。’”

说到这儿，浩亮断言道：

“她是正确的！”

“你们要闹革命吗？”

浩亮回忆江青曾这样激励他们：

“如果你们想要变革，并献身于革命，你们会如何表现工农兵的特征呢？”

老实说，1963年的时候京剧院和江青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事实上，他们并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艺术的变革会激起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想象的。

江青倡导的最激进的马克思理论是上层建筑可以驾驭经济基础。

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想方设法让他们明白，京剧院是受了阶级敌人的蒙蔽，成了旧戏曲的牺牲品。

江青说：

“先有自身革命，才会有表演的革命！”

说着，浩亮大笑了起来。

他回想起了 1963 年他在剧中扮演一位副军长的角色：

“为了谋取军长的职位，我必须放冷枪杀死他！”

江青有一次悄然来看演出。

演出完后，她生气地快步走到后台：

“尽管你们演得很出色，但我不会为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演的是一个靠谋害他人而篡权的自私自利的人物。”

接着，她又向全体演员提出了一个本质的问题：

“你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布匹，祖国的边境有解放军守卫，如果你们不去宣传工农兵，你们的觉悟在哪里？”

在新剧本的创作，江青从不亲自动手写作，而是让专业作家按照她的指示去创作。

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红灯记》的原型在地方戏中有 12 个版本，但没有一个适合京剧。

江青也向他们建议过《霓虹灯下哨兵》和《红色娘子军》剧本，但没有被他们采纳。

《霓虹灯下的哨兵》，由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集体创作，沈西蒙执笔，发表于《剧本》1963 年第二期。

分为话剧版，电影版，电视剧版，和越剧版，并有同名图书，下面分别详细介绍。

1962 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首演。

剧本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为题材，艺术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初期，在霓虹灯闪烁的大上海经历的一场特殊的斗争。

继承革命优秀传统，抵制资产阶级的“香风”侵袭是全剧的主题。

该剧将革命军人的生活 and 斗争放到了社会大环境之中，尤其是放到了刚刚解放的大上海这一复杂的环境中，对以往的军旅戏剧是一个重要突破。

4

由于走资派的干扰，《红灯记》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

另一队演员排演《红色娘子军》，把它改成了芭蕾舞剧。

经过无数次的修改，《红灯记》被定为“样板戏”。

浩亮虔诚地说：

“这些成就的取得，个人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其中有江青同志的心血，也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坚定支持，再加上大家的努力。”

开始时，剧团里的走资派只是假装接受以革命方式排演《红灯记》。

当重新塑造浩亮扮演的角色——铁道扳道工时，他们的虚伪就暴露了出来。

江青想去掉李玉和身上的消极因素——感情用事和酗酒。

反对者则以不应只突出李玉和一个人的个人形象为借口，坚持用相等的笔墨刻画一家三代人。

他们声称，那是对工人阶级均衡的表现。

实际上，他们想要加强铁梅的角色，把她塑造成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

江青坚持把重点放在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上，因为这反映了革命进程的规律。

憎恨江青的人(官僚)试图“丑化”李玉和的工人阶级形象，把浩亮装扮成驼背，强迫他穿上破烂的衣服，留着凌乱的胡须。

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是写实主义，过去的扳道工就是这样子的。”

直到文革前夕，浩亮都被迫扮演这一凄凄惨惨的角色。

随着旧文化部的倒台，他们剧团在经历了斗、批、改运动之后，才开始接触江青同志。

江青参加了所有的彩排，几乎对剧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做了改动——内容、唱腔、服装、做功和总体结构。

有时，姚文元会陪同江青来。

他们发现姚文元的观察很敏锐。

那些天同，姚文元一直在上海，除了其他写作任务，他还检查了对《智取威虎山》的修改。

江青在上海的工作受到了张春桥、柯庆施和姚文元等人的帮助和保护。在北京继续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康生的有力支持。

在曲折的修改和彩排过程中，演员们忘不了 3 位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支持。

这样，他们改编的戏剧开创了中国戏曲革命的先河。第一次表现了工人阶级有力、亲和、聪慧的人物特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浩亮引用了第三幕，市场粥摊前的一幕——看到一车日本兵到来，李玉和立即密电码藏在饭盒的馊粥里，难闻的气味让军警离开。

几年前，“走资派”删掉了这一幕，说是愚蠢和令人反感。

江青掌权后，恢复了这一幕以刻画李玉和的机智以有群众的配合。

浩亮继续回忆说：

“江青同志把每一件事都仔细地梳理了一遍。”

在第五幕的原作中，李玉和担心在日本占领下会失去铁梅，就把她藏了起来。

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江青的谴责，她修改剧本，让这位父亲将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

江青十分注意肢体语言。

她经常讲：

“做演员的在台上一定要做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造型”。

在为《刑场斗争》一幕设计舞蹈动作时，她登上舞台，示范步法。

还为他们画了示意图。

江青强调：

“新戏剧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它是艺术。服装设计者应在现实的基础上改进，不应离开理想主义。”

她指责旧的无产阶级英雄服装是“朴实的现实主义”，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

新的服装没有体现出“穷苦”。

《红灯记》一剧中对服装补丁的运用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剧团请来的服装设计师从前是为有钱人缝制丝绸衣服和时髦套装的，现在第一次为穷人量体裁衣，就直接把补丁缝到上衣前襟上。

这说明他们不知道劳动人民是如何劳动的。

江青告诉他们：

“补丁应该缝在肘托、膝盖和领子上，这些地方最容易破损。”

她还强调，补丁的形状看起来要美观，颜色的运用对塑造人物形象同样重要。

虽然劳动人民的穿着基本上是最便宜的布料和灰黯的颜色，但是剧中的铁梅却穿着炫目的红色中式上衣，戴着江青刻意挑选的发夹。

江青督导了全部的配乐创作，并亲自为第八幕（刑场斗争）创作音乐和歌词。

当铁梅看到自己的养父和奶奶被日寇处死，就用蕴涵着旧京剧的韵律和腔调，演唱了一首表现长大成人的经典歌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江青针对最后一幕的武术表演说：

“戏曲必须反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舞蹈一定要表现突袭和其他克敌制胜的游击战术。”

该剧结尾以欢乐的主题结束，表现出了武装斗争的崛起和根据地的扩大。

“要知道我们多么愿意得到江青同志的指导。”

浩亮意味深长地笑着结束了我们这次的谈话。

年轻活泼的女演员刘长瑜也是其中的一个“自愿者”。

她头一次与江青见面就被认为是年轻可造之才。她的谈话是敏锐和果敢的完美体现，充满着自我批评，那是文革时期受无产阶级思想熏陶的进步青年最热衷的表现形式。

刘长瑜解释说：

“以前在第九幕中，当听到养父和李奶奶的死讯，我是以旧戏中表现悲伤的方式痛哭。江青同志坚决反对，她对我说，‘不仅要充满悲伤，更要充满仇恨。两种感情都马上转变为力量，与敌人斗争的力量！’”

尽管最初自己很难接受，但江青的批评还是让刘长瑜意识到了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没有把握好劳动人民的情感。

“你的觉悟在哪里？”

江青反复地激励她：

“要表现好一个革命者，首先，你自己必须是一个革命者！”

刘长瑜充满感激地说：

“江青是我的老师，在这部戏里，浩亮也是我的老师。是他们送我到乡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送我到工厂和军营，与工人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使我学会了如何热情地表现革命的英雄形象，立场站在了无产阶级一边。”

在剧团的第一个晚上的晚宴上，江青越过我，用手肘碰了碰姚文元，请他为我安排在上海演出《智取威虎山》，并在第二天安排我与演员们会谈。

江青向我保证说：

“这部戏里的交响乐是所有样板戏中最好的！”

一个星期后，我观看了这场快节奏的、壮观的京剧。

会谈是在我下榻的锦江宾馆顶层，负责人是童祥苓。

他扮演了 10 年的杨子荣，是江青的忠实演员。

他介绍了音乐指导夏飞云。

夏长得清瘦，小心翼翼地讲述这部剧目中从《黄河钢琴协奏曲》演变而来的交响乐。

《黄河钢琴协奏曲》虽是江青在文革期间的作品，但协奏曲描写抗日战争画卷的抒情诗则是由聶耳创作的（30 年代上海流行乐曲和电影配乐的作曲人）。

他解释说：

“我们一般不演唱抒情诗，而是投射到舞台两边的屏幕上。”

歌剧的抒情诗也是如此，即使在演唱时。

这部协奏曲第一次在西方交响乐伴奏下用钢琴演奏民间曲调，来传递党的思想。

琵琶、五声音阶和西方和声的成功融合，增强了乐园在《智取威虎山》中尝试新的音乐合成的信心。

江青的想法是融合中国的打击乐和西方的和声——两种音乐的精华，所以在演奏中加入了中国打击乐器和国外的弦乐器：4个第一小提琴，3个第二小提琴，2个中提琴，1个大提琴和1个低音贝司。

吹奏乐器增加了1个单簧管，1个双簧管，1个喇叭，1个法国号和1个大号，定音鼓也被添加进来。

以前的8种乐器——4个打击乐器和4个弦乐器，都由大鼓来协调，通常安置在舞台两边。

现在扩大到30件乐器和一名指挥，都安排在舞台下伴奏。

中国的戏曲音乐家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的音乐场面。

夏飞云继续说：

“不容易让江青同志满意。当我们送交初步乐谱时，她批评我们：‘仍旧在传统束缚下创作’。她还说：‘要避免古典音乐的高亢，那会掩盖演员的声音。这样观众才会将主要注意力放到无产阶级人物上。音乐家应该把交响乐队和歌手的关系想像为客人和主人间的关系，交响乐不应反客为主。交响乐队应该伴随声乐演奏而不是盖过它。’”

《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发生在1946年的东北，解放战争刚开始。

与描述党的地下工作不同，它描写的是解放军与土匪的斗争。

一支解放军追击小分队深入密林中，发动群众打击由美国和国民党支持的威虎山自立为王的匪首座山雕。

杨子荣——解放军的生动代表人物。他率领侦察排采用了智取的方式而非直接进攻。

在上山途中，杨子荣了解到当地老百姓的痛苦，又获得猎户及其女儿常宝的帮助。

常宝的亲人被座山雕杀害，因此要找土匪报仇雪恨。

此时，杨子荣穿着白毛边大衣和虎皮坎肩，头戴红狐狸皮帽，化妆成一名土匪，成功地进入到匪巢，纳上投名状（联络图），博取了座山雕的信任，为小分队进击铺平道路。

在威虎山的百鸡宴上，杨子荣哄着土匪们纵酒狂欢。没等酒醒，解放军从天而降将他们一举歼灭。

剧中，解放军滑雪越过山坡，直取威虎山的一幕，堪称是中国当代舞台写实主义的顶峰。

像中国其他当代戏剧一样，这出戏也是借历史诠释思想斗争。

在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后，苏联撤出东北。

林彪接替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成为东北一号首长。

文革期间，林彪的声望很高。

这出戏有表现林彪对“人民战争”思想的贯彻和揭露彭真反对“硝烟味”的双重含义。

杨子荣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无数英雄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又是林彪生涯的真实写照。

和浩亮一样，童祥苓也因文革期间追随江青而获得舞台和政治上的荣耀。

卸妆后的童祥苓露出一张平脸，尽管已经年过 40，但他的体魄依然充满活力。

他的微笑迷人而略显淘气，宛如一座冷漠社会迎客的浮雕像。

童祥苓开始快速地讲述：

“1958年上海京剧团演出《智取威虎山》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时候，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控制着艺术。尽管杨子荣是一位无产阶级英雄，但文革前却被混同于土匪。他与土匪一样，穿着同样的戏服，而且台词也大多是‘黑话’，他手里攥着烟袋，随着‘黄色音乐’（西方音乐）起舞。导演无视无产阶级的尊严，让杨子荣对着座山雕行九十度鞠躬大礼。在一幕戏中，匪巢中的座山雕居中而坐，四面人群簇拥，而杨子荣则由一个比我老得多而又无活力的人扮演，让他毕恭毕敬地站在舞台一角一言不发。”

童祥苓继续说：

“1963年江青看过这出戏后，走到后台把它称之为‘垃圾’。第二年，在她的领导下对剧本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删掉了杨子荣身上的匪气，将他塑造成为了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座山雕和其他土匪被移到了舞台边上。”

1964年京剧汇演时，每个省份都派来了代表团。

当时，江青领导的演员们还没有意识到剧本改动的重大意义。

江青的作品被认为表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修正主义者站出来，把杨子荣说成是凶恶的土匪。

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表现的最为激烈。他公然下令让剧作家林汉根据刘、邓路线重新改编剧本。

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但当人们后来问他，为什么要把胡风打成“反革命”？

他的回答竟然是“谁也没有料到！”“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6

修正主义者对现代京剧的攻击，也是对京剧现代化和革命化的攻击。

他们巧妙地以单纯批判“艺术形式”来转移对思想内容的注意。

比如说，故事要求杨子荣假扮土匪，他们说为了艺术效果，杨子荣应该比真土匪还要土匪。

这个建议，混淆了江青最关心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文革前夕，江青经常访问上海市长柯庆施，与他讨论戏曲改革哲学（古代中国关于思想和行为的哲学辩论）方面的问题。

她强调，实践和认识是相互依赖的。

实践产生认识，认识引导更多的实践。

在塑造英雄特性时，音乐、抒情诗、对白、舞蹈、服装和舞台指导都要服从“三突出”理论。

即：首先突出先进人物；第二，在先进人物中突出英雄；第三，在英雄中突出主要英雄。

这一原则被应用到后来的样板戏中。

其具体实践是在文艺创作中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的中央，打正光，而反面人物要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等等。

文革高峰期，国家事务的负担让江青很少有时间去上海。

童祥苓只能通过录音和录像定期向江青汇报剧团的情况和排演的进度。

江青告诉他们：

“有时候，我只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反复观看，揣摩其中的细节。我很注意对白的技巧。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关键词上，比如，‘恨’这个字，就要说得有力量！”

“你们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

江青经常引述毛泽东的话。

江青对我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他们不是小丑和玩偶。”

为了说明这一点，她推荐我读一读主席的《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是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

童祥苓敏锐地观察到江青对批评理论没有多大的兴趣，她的指导重在实践方面。

“她甚至想改变我的表演风格。”

他笑着回忆道。

那时候，他擅长演“老生”。因此，无论何时登台，无论演什么角色，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弯下腰蹒跚而行。

“每当江青同志看到我的这个姿态，就会就用指着我的脊椎说，‘站直了！’。她还对我说，‘你的杨子荣没有诸葛亮演得好。克服旧式表演，要昂首挺胸，有力演唱。’此外，我的服装也由旧的丝绸长袍改为毛边大衣。”

说着，童祥苓伸出了三个手指头，表示一把插入座山雕心脏的匕首。

据说是江青将原先的二人手指头改成了三个，她认为这样才是更富杀伤力的表现。

江青不受传统音乐束缚。

在传统京剧中，有两个独特的唱腔：一是华丽的“二黄”，一是有力的“西皮”。

它们不能在同一人物中交替使用，也不能在同一唱段中出现。为了以柔和的唱腔表达强烈的情感，江青在一个唱段融合了这两种唱腔的特点。

她说：

“情感要舒缓地表达，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发誓消灭座山雕或决心支持共产党，才可以使用有力的唱腔。”

为了让艺术手法去表现社会现实，江青改革了古典传统戏中用降调结束一段唱词的习惯。

她说：

“行动的决心必须用升调来表达！”

童祥苓最喜欢戏中的第五幕。

在这一出戏中，杨子荣成长为了一位胸怀“朝阳”的革命英雄。

江青亲自设计了这一幕的舞蹈。

最初的版本中，杨子荣是徒步上山的。

1965年，江青让他骑马上山，以突出英雄形像。

在旧戏中，马只是虚拟的。

与过去旧戏中的无声表演不同，江青要的是栩栩如生的表演。结合现代舞蹈和传统马戏中的动作，作为一名有经验的骑手，江青演示了如何利用动作和道具，跨上一匹想像中的烈马，英雄般地向前疾驰。

当然，同时还要注意控制住马的野性。

说着，童祥苓纵身从桌旁跃起，再现了江青向他演示过的动作。

江青曾告诉他：

“象征性地跃上战马，先凌空跳起，接着一个劈叉。当马看到老虎摔倒时，用在地上平直劈叉来表现，不要从马背上跌落下来，这看起来没有力量，要越过马头下马。”

看过1966年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江青对其中骑马的场面仍不满意。

在北京的马场里，她反复地演练各种上马和下马的动作。

回到上海后，她告诉童祥苓：

“有时候艺术需要夸张，登上想象中的高大骏马时，要尽量抬高你的腿。不是越过马头下马，要在马背上侧身，抬起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腿，接着跳下。不要直接下马，要竖起脚趾，这样看起来才有气质。”

接下来，杨子荣举起手枪，射穿了老虎的脑袋。

当土匪问他躺倒在地上的老虎是不是他杀死的时，杨子荣十分平淡地说：

“它恰好撞上了我的子弹。”

江青对形象非常敏感。

童祥苓回忆说：

“她教我们如何用服饰衬托某些人物的特征：看到我长得比较矮，但要演出英雄人物，于是建议我穿短尺寸的衣服，把佩戴的腰带往上抬。这样，在舞台上我的腿会显得较长，人也显得更高。”

童祥苓还说，江青作为政治领导人，对人的关心要超出他们的期待。以前扮演杨子荣时，他总喜欢把枪跨在皮带前面。江青让他放到侧面。

他一开始有些不解：

“为什么？”

江青向他解释说：

“前面配枪的时间长了，容易引起骨盆内伤。”

中央定期通报对戏剧的修改，毛泽东也是如此。

1967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观看他们的演出时，只对台词提出了意见。

将第五幕中的一句话改为了：“迎来春色换人间！”并将第九幕中的官腔改成了现代语言。

两年后，江青仍在向童祥苓解释讲述“春天”这个词的含义。告别是它的政治含义。

童祥苓向我介绍了齐淑芳，一个20来岁，有点害羞的女孩。她在剧中扮演猎户的女儿——常宝。

齐淑芳，女，京剧旦角。

自幼受其嫂张美娟的精心传授。曾是上海戏曲学院的高才生，并曾担任上海青年京剧团及上海京剧院的主要演员。

齐淑芳自幼受其嫂——中国著名京剧武旦张美娟的精心传授。

1958年，16岁的齐淑芳为毛泽东演《三战张月娥》，原戏是三个男的打一个女的，毛泽东认为不公平，后改成降伏讲和，还她粮草，共同对付朝廷。

当年，初见江青时，齐淑芳穿着朴素的长罩衫和长裤，不像舞台上的常宝——穿着红夹袄和梳着浓黑的发辫。

舞台上，她的嗓音哀伤、真挚、高亢。

齐淑芳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革时期的有理想的艺术家。

她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坚决拒绝扮演帝王、公卿、美女等“剥削阶级”。她强烈谴责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套欺骗民众的作法。

江青教导她，要克服自己的不自信的毛病，要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就要像鲁迅那样发扬“孺子牛”精神。

只有像牛一样固执，才能打破京剧的陈规陋习。

通过常宝的形象，江青开始注重在舞台上表现女性的革命。

“所有表现封建阶级的东西都要抛弃！”

说着，江青抬起手划了一道优雅的弧线。

江青演示了旧京剧中的“玉兰指”，然后带着军人的神态紧紧地握住拳头。

在旧戏曲以及旧社会中，女人不能露出牙齿。笑的时候要以手掩嘴，并以水袖遮挡住身体。

现在每个女人都可以大方地笑，想怎么笑，就怎么笑。更不用强迫小女孩缠脚，长大后只能用“三寸金莲”跛着走路。

过去的女演员如果没有理想的小脚，就得由男人扮演女人，或穿着短截的高跷在舞台上故作姿态地蹒跚而行。

江青说：

“现在，妇女同志再也不用担心脚的尺寸问题。她们可以在舞台上走着自然的步伐。”

“还有……”

齐淑芳插嘴说：

“流泪时，也要用水袖挡住双眼。”

最初，当齐淑芳唱到常宝的母亲被土匪杀害时，是坐下来，把脸埋进手里。

江青说：

“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哭法。要站起来，面对观众，让自己的眼泪自然地流下来。”

说着，她拉起齐淑芳的手：

“劳动人民哭时不会坐下来，把脸埋进手里。他们只会站着哭！”

江青强调：

“不要只顾及悲伤，要化悲伤为仇恨，化仇恨为义愤，化义愤为战斗的决心！”

刚开始，常宝的表现有些“自怜”，江青很不满意，皱着眉头说：

“你要突出阶级仇恨，突出愤慨，突出战斗的决心。尽管你心里盼望着太阳的升起，但你必须战斗到牺牲！你要显示出‘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决心，教育人民面对牺牲不要气馁，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意志和力量比美丽更重要！”

齐淑芳从小受的训练是唱假声——表演贵妇人和仙子的唱法。

江青在 1964 年成为她的老师后，教她把假声和中底音的自然嗓音结合使用，纯粹的假声只在唱高音时使用。

江青反复告诫她不要自满：

“你是在为工农兵歌唱，表演者不应脱离集体合作去炫耀个人技巧。”

还说：

“革命的舞台上，没有个人自大的地位！”

在《智取威虎山》的早期版本中，解放军战士营救老乡的场景用的是纯粹的特技表演。

江青不喜欢这种“极端的矫揉造作”，因为工农兵看不懂。

为了让观众置身其中，江青增加了新的布景。包括移动舞台、错觉屏幕和动感灯光。

但是，“反对派”决意要在空荡荡的舞台上保留刻板的象征主义，他们反对她的每一项革新。

江青没有妥协，继续改革。

她把古代和现代的舞蹈风格融合在一起，让演员们穿着白色披风在猎猎寒风中翩翩起舞，象征解放军滑雪越过山坡。

江青向剧团解释说：

“这些滑雪的战士的‘集体形象’，展示了他们为了革命的事业不畏牺牲的精神。”

关于角色，齐淑芳说：

“第九幕之前，她只是一个单纯的猎户的女儿。没有‘自觉革命’的意识。在观看了民兵训练之后，她才转变为一个有觉悟的女战士。一个决心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女英雄。”

当她唱颂无产阶级时，江青告诉她：

“音乐节奏要慢下来，嗓音要平稳而坚定。”

在她发誓消灭豺狼时，江青对她说：

“要回快节奏，情绪高昂地演唱！”

“讨血债”在中国革命戏剧及其颂扬的政治中是最深刻的主题。

江青对她的个人经历，情感生活和她的样板戏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公开表述过。

江青的伤感曲目或许可以让她再次重温失去亲人的痛苦——当然不仅仅只是失去亲人，也是对失去自由和女孩装束的伤感。

报仇是为个人，也是为大众。

常宝唱道：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

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娘啊！

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

只盼讨清八年血泪账，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枪、飞上山岗、杀尽豺狼！

“爹！”她哭着扑进了父亲的怀里。

杨子荣激愤地唱道：

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

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
要报仇，要伸冤，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
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
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管叫山河换新装。
这一带也就同咱家乡一样，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7

芭蕾是继戏剧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革命艺术模式。

戏剧传统上都是站在统治阶级角度改编历史。

现在，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帝王将相已被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和解放军所取代。

男人虽未垄断，却仍然主导着新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戏剧也依然主要是男人的艺术。

女人作为崛起的“革命接班人”，扮演着次要角色。

从各个方面看，芭蕾——在中国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它更多的是表现抒情风格和神话故事。

一直以来，芭蕾都是由妇女所主导的。她们对压迫的反抗是通过舞蹈，而不是中国的戏曲来表现。

中国对传统的古典芭蕾的突破，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

早在 1909 年，狄亚·格列夫领军的“俄罗斯芭蕾”就轰动巴黎。

狄亚格列夫 (Diaghilev) 是位生在俄国穷乡僻壤的男孩，毫不起眼，但谁也没料到日后的他不仅成为著名的芭蕾舞编剧家、俄罗斯芭蕾舞

蹈团团团长，更将俄国独特优雅的芭蕾舞姿和音乐剧作带到欧洲，担任文化艺术的倡导者和交流者，成为当年国际艺术界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与小说家乔伊斯、画家毕加索、音乐家史特拉汶斯基和普鲁斯特等人并列五位二十世纪初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他的一生历劫破产、战争、革命和流放，还有一段备受争议的同性恋情。

他的一生能媲美一本史诗式的小说，而读他的传记就像是翻开一本俄国史和艺术史。

中国对芭蕾舞技巧的革命变革和对少数民族舞蹈的使用只是最近的事。

解放前，上海的有钱人和外国人可以享受希腊的艺术体操、大师主持的芭蕾舞学校、好莱坞的集体舞蹈、舞厅的绅士舞蹈和频繁的文化交流。

到文革前夕，只有古典芭蕾舞没有被禁。

江青虽然也喜欢芭蕾舞，但反对它作为外国文化的载体。

让江青反感的是，穿着粉色短裙的舞者昂然直立或扮作垂死的天鹅。

她对一成不变的古典芭蕾风格进行改造的号召竟然同时受到了右翼和左翼政敌的指责。

这些人的主张是，保留古典芭蕾并把它从革命生活中分离出来，或者是完全禁止。但绝不是从政治上挽救它。

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甚至威胁要打断那些假称为革命而舞蹈的芭蕾舞女的腿。

最后，毛泽东的政治影响力占了上风。

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让江青可以按照她的方式对芭蕾进行温和的革新。

中国戏曲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杂技、歌曲、夸张的面部表情、凝视；地方文化则为我们提供了音乐韵律、舞蹈模式、丰富的服饰；我们还可以直接从古典芭蕾中借鉴基本步法、脚尖旋转和蔓藤花纹。

只有管弦乐的编曲还徘徊对在 19 世纪标题音乐和对外国电影音乐主题曲的摹仿阶段。

江青告诉我，芭蕾革命意味着她和她的助手“要与束缚了中国舞蹈演员几十年的俄罗斯古典风格作斗争！”。

江青忿忿地说：

“斯大林应该为对保留以善恶斗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古典音乐负责！苏联后来的领导人还在继续让一只黑天鹅作为《天鹅湖》的中心形象。”

与此相比，《红色娘子军》（1964 年 10 月首演）的故事则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上的。

该剧的背景是南中国的海南岛。

芭蕾舞表现了黎族人民的政治抵抗运动。

江青说：

“所有少数民族都是受压迫的，他们在解放前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

在和江青会面之前，我就已经在北京看过这出颇有新意的芭蕾舞剧。

我认为江青将故事发生地选在海南，既是审美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海南的面积与中国的台湾差不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红色娘子军》的海南背景与《白毛女》所处的西北险峻山区也可说是一种环境上的平衡。

和戏曲一样，芭蕾舞也要遵循不走中间路线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面人物，要么一开始就是英雄，要么解放后将他变成英雄。

反面人物，别无选择，只有被消灭。

反面和正面之间的中间人物，可以被忽略。

在新旧戏剧和新的芭蕾舞剧中，都用传统的脸谱和身段来区分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

正面人物总是气宇轩昂地步入舞台，然后仰起胳膊，亮出手掌，正脸面向观众。

反面人物登台时，一般都是猫腰碎步，避免观众看到他灰暗的脸。

《红色娘子军》从一座地牢开始，美丽的女奴琼花（明显是一个正面人物）被南霸天（南方凶恶地主的代表）绑在柱子上。

在低沉压仰的歌声伴奏下，琼花挣脱了枷锁，把怒火发泄到阻拦她逃跑的男看守身上。

琼花成功逃脱，后被一个红军通讯员发现，并将她领到了红军的一支小分队里。

这支部队的领导是英俊的政委洪长青。

政委指示琼花去找穷苦妇女自己的队伍——红色娘子军。

南霸天最终被琼花打死。

黎族人民用欢快的民族芭蕾舞庆祝村寨的解放。

最后，琼花发誓要像英雄洪长青那样，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看戏时，江青还刻意跟我提及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

江青向我解释：

“在 60 年代早期排演这出芭蕾舞时，用芭蕾舞这种形式来表现解放军军史还没有过这种先例。没有人支持，我只能自己做准备。”

60 年代后期，她独自去了海南，视察那里的大规模建设的军事设施。

然后再去上海，负责考察上海芭蕾舞团。

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一些在文化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她将在 1964 年秋上演的革命芭蕾舞剧并不持支持态度。

为了寻求领导人的支持，她请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早期版本的一场彩排，并改正了总理指出的不足之处。

出于教育演员的目的，她决定让演员到解放军部队去生活几个月。

就在她发布这条命令时，文化部负责人周扬突然宣布要派遣这个由她负责的剧团到香港演出《天鹅湖》。

江青虽然愤怒，却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上海市长柯庆施会支持她。但此时柯正在生病。

江青找到周总理，放了一大通炮。她虽然没有点名，但总理应该知道她指的是谁。

文化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大家心知肚明这是周扬在抵制江青搞的芭蕾舞改革。

有人甚至将《红色娘子军》丑化为“在摇篮里舔手指的婴儿”，和“丑媳妇”。

江青不顾周扬的反对，继续修改剧本，并随剧团到各主要城市巡演。

回到北京后，她和周总理一起观看了一场经过大幅修改的演出。

总理称赞该剧是“真正革命的……”，这让江青很高兴。

演出结束后，他们一起到后台向创作过程中支持她的演员和音乐家表示祝贺。

江青还是有些担心，这种中西结合的舞蹈会否给观众带来很大的冲击？

1964年冬，全国人大正在开会。

她邀请了一些代表，包括武汉的工人一起去观看演出。

演出中，她听到一位工人说：

“过去根本不懂什么是芭蕾舞，现在看明白了。”

这让江青放心了不少。

为了让代表们了解古典芭蕾和革命芭蕾有何不同之处，她告诉上海舞剧团先演《红色娘子军》然后再演出《天鹅湖》。

在演出《天鹅湖》时，工人们纷纷提出抗议，有的还请求离场。

代表们对她和其他领导人说：

“我们要革命的《红色娘子军》，不要资产阶级的《天鹅湖》！”

男子领舞刘庆棠定期向江青汇报观众的反映，这让江青感觉到观众的反映是积极的。

她们在1964年之后就只演出《红色娘子军》。

江青的忠实追随者刘庆棠是首席发言人。

他告诉我说：

“在50年代早期，我们对芭蕾舞的研究一直受苏联教师及其学生的操纵。只有民族和民间舞蹈是由职业舞蹈演员主导。”

1954年，共产党在北京建立了舞蹈学校，目标是培养一批本土的芭蕾和民族舞蹈老师。

舞蹈学校不仅从城市中上层阶级招收学生，也从乡村的穷人中招
生。

50年代中期，芭蕾的推动者只着眼于国外著名的芭蕾剧目。

他们从一些芭蕾舞片段入手，如《天鹅湖》中的小天鹅舞，还有
吉赛儿和拜伦的《海盗》片段，然后才逐步发展了现在的这些剧目。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做里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苏
在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有了
分歧。

1957年苏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攻击，毛泽东认为干涉了内政。

尤其在对波兰、匈牙利等国家事变，苏采取干预政策，加剧了毛
对苏的不信赖。

后来要在旅顺港建联合海军、在中国东北建立航空灯塔等问题，
中国没有答应。

虽然两国领导人都采取修复关系的行动，但是双方分歧太大，没
有结果，由政治问题转变为军事、经济问题。

中共的九评苏共也是加剧了分歧原因之一。

50年代末大跃进的贸然急进，加上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中国
经济很困难，就在这时，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 732 项，带走图纸。

中苏关系恶化开始表面化。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在中国的专家，在芭蕾领域同样也引起
了强烈的震动。

未完成培训的师生只有靠自己去发展。迫使他们自力更生，激发舞蹈的革新。

从长远看，也使“革命芭蕾”的出现成为可能。

在苏联专家离开不久，一批老师从最初的北京舞蹈学院分离出来，到上海建立分支机构。

1962 年到 1963 年，两地都投入排练国外资产阶级的经典剧目。

一位芭蕾舞女演员笑着对我说：

“维克多·雨果的《钟楼怪人》和普希金的《泪之泉》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作品。”

《钟楼·怪人》（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由华特迪士尼制作，盖瑞·特利斯戴尔和寇克·怀斯执导，汤姆·哈斯、黛咪·摩尔等主演的剧情片。

作为第 36 部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灵感来自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

8

1963 年，江青第一次出现在北京舞蹈学院。

她的出现，纯粹是政治性的。当时，她对芭蕾舞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多多少。

近二年来，江青在交响乐和戏剧界赢得了有力的支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沙家浜》被改编成样板戏、交响乐和电影。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芭蕾，决心扫除其中的封建残余，重构其表演和内容。

早在 60 年代初，《红色娘子军》就根据同名话剧被拍成了电影。

虽然电影有缺陷，但江青还是很有信心地对演员们说，她有决心让《红色娘子军》成为一部革命芭蕾舞剧。

这样，她在 1963 年未到了海南，除军事调查外，还仔细研究了当地的地形、气候、树木、鲜花、环境的色彩和黎族文化。

她听取了“女子纵队”(创建于 1930-1931 年的琼崖纵队女子特务连)的历史。

琼崖纵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领导的一支人民武装，是以 1927 年 9 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

这支人民武装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周恩来对红色娘子军作过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世界革命的典范”。

不仅如此，以“红色娘子军”为题材的各种艺术作品也随之涌现。

1962 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全国公映，吴琼花、洪常青的形象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1963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要求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

考查了海南之后，江青回到北京。

她不顾周扬的蓄意阻挠，关闭了舞蹈学院。

所有排演都终止了。

江青在舞蹈学院里挑选了几个相中的人组成“创作组”。在获得周总理的支持后，她派遣这个小组到海南收集素材。

小组成员包括作家、音乐家、舞蹈指导、舞台设计和主要演员。

创作组中大多数人是北方人，刚开始时很难适应热带气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简直是受尽了折磨。”

他们对海南黎族当地人的风俗屡有冒犯，闹了不少笑话和误会。

黎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黎族礼仪有着丰富的内容，涉及了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

宴席礼仪海南省黎族招待客人有一套饮食礼仪。

用餐时，对男客先酒后饭，对女客先饭后酒。

宾主分开对坐。请酒时，主人先双手举起酒碗向客人表示请酒，然后自己把酒一饮而尽。

接着，把米酒逐个捧给客人，客人把酒喝完后，主人还给每个嘴里送一口肉菜，表示尊敬。

通常，主人只陪客人喝酒，不陪客人吃饭，怕客人不好意思把饭吃饱。

为了探寻历史真实故事，演员们访问了几个曾在红色娘子军战斗过的老年妇女。

她们回忆说，在芭蕾舞剧中化名琼花的女人是地主家的女仆，受尽虐待，逃跑后变得思想成熟起来。

一个有类似经历的妇女说，她曾逃跑过五、六次，最终找到了解放军。

刘庆棠说：

“一些人，特别是外国人，错误地认为这部芭蕾舞剧主要是表现女人。实际上，中心人物是剧中的英雄（我所扮演的洪常青），而不是妇女代表琼花。毫无疑问，文革彻底改变了经典芭蕾的命运。从 1963 年开始，我们剧团就只上演《红色娘子军》了。”

我问道：

“还会有新的革命芭蕾舞剧吗？”

刘庆棠回答：

“《沂蒙颂》在 1971 年试演后仍在修改中，这部舞剧最终也会被收入样板戏中，或拍成电影。

不能不说，江青为中国芭蕾舞艺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使芭蕾舞艺术后继有人。

由于这些艺术家们的努力，芭蕾舞民族化的探索并未中断，高度集中体制下的要求高速度的创作实践，为编创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同时还保留下来某些基础较好的剧目，如《草原儿女》、《沂蒙颂》等。

《红色娘子军》属于第一拨“样板戏”之列，一九七〇年开始大规模创编排演第二拨“样板戏”，当时的芭蕾舞团被改名称作中国舞剧团，由于江青首先想到的是将《红嫂》改成芭蕾舞剧，就指定刘庆棠负责芭蕾舞剧《红嫂》（后改名为《沂蒙颂》）的排演工作，芭蕾舞剧《红嫂》后来居上，反而比京剧《红嫂》更早定型。

在布置下达了舞剧改编任务后，江青还专门嘱咐：

“《红嫂》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改好，《红嫂》要另起名，要脱开那个地方，原来作者有问题。”

于是按她的批示，舞剧《红嫂》不久就改名成了《沂蒙颂》，红嫂变成英嫂，彭林改成方排长。

按照惯例，在刘庆棠的主管下，“芭团”迅速地设立了由李承祥、徐杰、栗承廉、郭冰玲为编导，马运洪任舞美设计，刘廷禹、刘霖及之后又由杜鸣心参加作曲的《沂蒙颂》创作班子，随即创作组就去山东沂蒙山区体验生活。

在一九七一年初到这年六月的半年时间里，创作组六下沂蒙，足迹踏遍了全地区，他们不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小说《红嫂》的原型人物在沂南县，但在解放战争年代，类似红嫂的妇女何止成百上千！

在这贫困的老解放区，当年家家都是医院，个个都是护士，对人民子弟兵她们都倾注了自己真诚的爱心。

创作组仅走访当年救护过解放军伤病员的大娘，就多达一百多位。

这些体现着军民鱼水情的真实生动的材料，使创作人员无比地激动感奋。

为了使舞剧的音乐具有山东地方特色，几位作曲家又去了胶东，对胶东的秧歌、民间小调及整个山东的戏曲音乐都进行了广泛的搜集。

就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创作组初步拟定一个剧本框架，确定了剧中的人物、事件、情节梗概。对剧中的音乐，经反复筛选和比较，他们选择了清新优美的快炙人口的《沂蒙山小调》作为剧中主人公英嫂的音乐主题。

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地方特色，也因为音乐上更有发展余地。同时，舞美人员也根据当地的风景绘出了布景小样。

当年七月，从沂蒙地区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的创作组将剧本呈送给了江青审阅，不久江青就叫刘庆棠捎话创作组：

“舞剧的剧本是假的，看不出具体的形象，剧本只有在舞台立起来以后，我再来看。”

这话创作组琢磨着也对，没有对话的舞剧剧本，只能粗略地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故事情节走向，具体的非舞台上见不可。

于是他们根据剧本按步骤进入了创作阶段：先由编导会同作曲如同编定电影分镜头剧本一样，定下各场的音乐时间长度表及其大致所需的音乐气氛，接着由作曲写出音乐的钢琴谱，并录下音后交给编导；再由编导按音乐编排动作，指导演员进行排练；在舞蹈进入钢琴伴奏的排练同时，作曲完成了乐队总谱，让乐队进行排练；最后乐队与舞蹈合排。

舞剧作为一个舞蹈与音乐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十分复杂，其中为两者的配合小修小改可以说每日不断。

当时剧中的主角最初选定了程伯佳饰英嫂，刘庆棠饰方排长。但这时已身居要职的刘庆棠已无法保证正常的排练，不久方排长的角色就由青年演员张肃代替了。

《沂蒙颂》的编创、排练工作十分紧张，虽然有京剧《红嫂》的剧本，但舞剧与京剧的艺术规律有明显的不同。为此不但要去掉原京剧中不适合舞剧的许多东西，而且要尽力从剧情中挖掘出符合舞剧表现的情节和细节，这不啻是重新创作。出于创作组在体验生活中的积累，开始是按大型舞剧来创作，并投入排练的。剧组上下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辛勤劳动，《沂蒙颂》初步在舞台上立起来了。江青听了刘庆棠的汇报，兴致勃勃地审看了《沂蒙颂》彩排。可是在审看完了以后的座谈会上，江青唯独说了句“剧中这个歌还有点山东味嘛”以示肯定外，其余的都是意见。也许因为她是山东人，从舞蹈、音乐、布景、道具直到服装的颜色、补丁的位置，挑出了不少毛病，提出了众多不无地方色彩的“指示”，尤其是第二场英嫂熬鸡汤的那场戏，对英嫂抓鸡、剥蒜、哄孩子等动作，不厌其详地连比划带说，作了具体细致的演示。而她最关键的意見，是《沂蒙颂》的内容不够一出大型舞剧，“有多长搞多长，不要贪大嘛！”江青的这话，无疑是要把已成雏形的《沂蒙颂》推倒重来！

但她的意見又不无一定的道理，大型《沂蒙颂》在结构上确实存在着松散、托沓的缺陷。于是，《沂蒙颂》重起炉灶，创作组重

新开始了新一轮的舞蹈和音乐设计。在排练过程中，经过了好几次反复，最后采形成了由序幕、四场戏和尾声的中型芭蕾舞剧的结构。

一九七二年初，芭蕾舞剧《沂蒙颂》在天桥剧场开始了试验性公演。它的公演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个时代，无论是“样板戏”，还是其它的创作歌曲，要么是豪情激荡，要么是慷慨激昂，即便是一些京剧的成套唱腔中有一些徊透低吟的抒情，也马上被下面的“**斗志”所掩盖了。然而《沂蒙颂》的音乐，却一反当时的风气，以深沉、委婉、细腻而又有张有弛的情感抒发，将英嫂这个普通农家妇女正直善良的内心世界和情绪波澜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尤其是由《沂蒙山小调》衍化而来的那首歌曲《我为亲人熬鸡汤》，一下子不胫而走，成了当时人们唯一能挂在嘴边的抒情歌曲。在剧中演唱这收歌的演员单秀荣，也像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领唱的朱逢博一样，名声大振，成了备受公众欢迎的歌唱演员。《沂蒙颂》根据小说《红嫂》改编，表现沂蒙山区的群众红嫂，取奶汁救护伤员的军民鱼水情谊。音乐、舞蹈采用山东民间素材，富于乡土风味，充满生活气息。该剧编导李承祥、徐杰、郭冰玲，作曲刘廷禹、刘霖，舞美设计马运洪、郑曰洋，主要演员程伯佳、张肃等，一九七三年中国舞剧团演出。《沂蒙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芭蕾艺术，它是一门历来以女性为主角的艺术，《沂蒙颂》比较充分地运用了芭蕾女演员抒发情感的各种技能表现。《沂》剧不同于《红色娘子军》的飒爽英姿，体现的是战士风貌；在英嫂的舞姿中所塑造的是一个纯朴、善良而又充满温情的青年妇女形象，尽管是以“军爱民，民拥军”的**思想为前提，但

观众从中更强烈感受到的是人性和人间的温情。这恰恰是在人性丧失殆尽的“文革”年代隐蔽在人们心底被悄悄唤醒，并极为珍视的东西。何况，在《沂蒙颂》的舞蹈中，英嫂的抓鸡、哄孩子、剥蒜等动作，是根据生活的真实动作提聊。这些，在芭蕾舞艺术史上，还确是一个创造！

在北京演出后，《沂蒙颂》又去山东等地巡回演出听取意见，所到之处一片赞誉之声。江青对自己所抓的这部芭蕾舞剧获得成功自然极为得意，在《沂蒙颂》返京后又略作一些无伤大雅的修改后，欣然同意它成为第二拨“样板戏”。

与《沂蒙颂》几乎相距不远，芭团又产生出新的小型舞剧《草原儿女》。《草原儿女》表现了六十年代初，蒙古族草原小兄妹龙梅和玉荣在为公社放羊群时，遇到了特大暴风雪，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们勇于同大自然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进行殊死搏斗，最后羊群保住了，她们却负了伤。这小姐妹俩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敢于斗争的事迹广为流传。为芭蕾与蒙古族舞蹈的结合进行了新的探索，两种舞蹈因素糅合得和谐、贴切，所塑造的小英雄形象朴实可爱。因而获得好评并拍摄为舞剧电影，在全国发行。该剧编导王世琦、王希贤、栗承廉，作曲石夫、葛光瑞、程凯，舞美设计金泰洪、吕得康，主要演员张纯增、蔡国波、吴坤森等，一九七三年中国舞剧团演出。

在《沂蒙颂》创作之始，芭团欲将它改编成芭蕾舞剧，特地将此计划上报给江青，江青竟很顺利地同意了。

一九七一年夏，芭团组成了由栗承廉、王世琪任编导，葛光锐、石夫、程凯及以后又有刘霖参加的音乐设计人员组成的创作组，开始了这部舞剧的创作。

为了更好地发挥芭蕾舞艺术的特点，特别是男女双人舞的艺术，编导们将剧中人物改成了兄妹关系，并确定了张纯增饰演哥哥，蔡国波饰演妹妹。作曲上则选择了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中广为人知的主题歌作为全剧的音乐主题。

《草原儿女》的舞蹈由于广泛吸收了蒙族民间舞蹈动作，而且在刻画兄妹俩在与暴风雪搏斗的情景中，结合戏曲武打动作以及芭蕾舞的托举，使这部芭蕾舞既有蒙族的特点，又扣人心弦，它以刚健强劲为特点，在和《沂蒙颂》同台演出中，恰好一刚一柔，相得益彰。

一九七三年底，《沂蒙颂》和《草原儿女》一起获准进八一电影制片厂投入影片拍摄，并在三个月后拍摄完成。但是进入一九七四年，江青等正忙于“批林批孔批周公”，似乎已无暇顾及其它，之后又是为四届人大的组阁忙乎，她早将这两部业已拍摄完成的芭蕾舞剧影片的公映问题抛之脑后了。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为纪念“五·二·三”展示“文艺**”的新成果，这两部芭蕾舞剧的彩色影片才得以正式公映。

这两部基础较好的芭蕾舞剧，从主题思想到表现手法，都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肯定，但在艺术上还存在简单直拙这样的不足。

中国舞剧的创编，普及与扩大了芭蕾舞的观众面，广大工农兵群众与普通劳动者，直接参与芭蕾舞的鉴赏与评论，对推动芭蕾舞的普及和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沂蒙颂》是一部四场芭蕾舞剧。1973年5月16日，由中央芭蕾舞团（当时的剧院名称为中国舞剧团）首演于北京天桥剧场。

在1957年至60年代初期，北京开始演出由江青改编的“无产阶级芭蕾”，虽说它失去了以前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气息，却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在以后的几次会面中，江青和她的芭蕾舞支持者都曾向我解释过，在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为什么要删除喜儿被强奸、生育及孩子死亡的情节。

就是为了向观众们展示喜儿的新形象和光明的前途。

喜儿和大春的两情相悦被低调处理。

八路军和毛主席的形象被极力夸大。

一部芭蕾舞剧如此紧密地和中国革命历史相联系，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外国人的关注。

1973年，江青送给我一部最新版的电影《白毛女》，作为交换，我回送给她的是《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丽·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理查德·海顿主演，于1965年上映。

改编自玛利亚·冯·崔普（Maria von Trapp）的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最初以音乐剧的形式于百老汇上演。

电影讲述了 1938 年，年轻的见习修女玛利亚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家中做家庭教师，以童心对童心，让孩子们充分在大自然的美景中陶冶性情，上校也被她所感染。

这时，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役，并且在一次民歌大赛中带领全家越过阿尔卑斯山，逃脱纳粹的魔掌。

影片上映后当年票房达到 1.59 亿美元，一举荣获第 38 届奥斯卡金像奖十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

《音乐之声》留给了江青，留给了中国。而我却带着江青给我的《红色娘子军》回到了美国。

《纽约时报》音乐评论人哈罗德·辛伯格报导了他在上海观看的这出芭蕾舞：

用西方人的观点看，这出芭蕾舞决不仅仅是革命的，它也是对神话故事质朴天真的演绎。

它起源于俄罗斯的芭蕾，充满了西方的舞蹈语言。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元素被引入到了芭蕾舞中——本土乐器、五音阶、还有几个轻音节，让人很难听出俄罗斯的味道。

只有少部分西方观众仍会将《白毛女》的配乐归类于电影音乐及其那些老旧的套路。

“维特克夫人，”江青私下对我说，“在几次会谈中，你都提到我国的文学和艺术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在如何运用文学和艺术激发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表扬了当前版本的《白毛女》，是经过多年不断努力修改的结果。

江青曾努力淡化喜儿与大春之间的“儿女私情”（两情相悦）。

她感到这次经过再次修改的最终版本，可以进一步增强芭蕾舞剧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

她承认这些样板戏都还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如何为中国人民创作他们自己的无产阶级形象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她认为新剧目的另一特点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音乐和舞台可以如此大胆地融合外国的传统元素。

世界正拭目以待——中国革命样板戏辉煌的前景。

第十八章、任重道远

1

我还能再待多久？

几个月？

还是几个星期？

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江青和她有助手一直在谈她的过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江青作为这个无产阶级国度的国母，我始终认为是无可挑剔的。

但我决定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说过，我在史丹福大学是教历史的。我不仅要对我的学生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

同样，在我面前的江青就是一部历史——中国革命的近代史。

我不敢说我对她的评价都是正确的，但起码是真实的。

当然，如果有一天我写的文字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或者说是篡改了，我希望我的读者能通过字里行间运用你们自己的智慧去寻找一个真实的“江青”。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书中穿插那么多的历史和人文典故。

江青不是一个个体，她是生活在她那个时代中的代表人物。离开了她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她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同样，只有了解了她身边的这些人和事，你才能真正地了解江青。

与江青接触的时间并不多，可她却清楚地知道我有一个女儿，我很疼爱我的女儿。

江青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过：

“在中国，儿童是属于国家的。如果你决定很快离开，我就没有时间向你展现出我全部的个人经历，而让你对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于是，我决定在中国再多待几天。

同时，也提交了一些书面问题。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和简单的判断。

最后一天晚上，江青才对我的请求做出回复。

关于她的职务，江青说：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其他职务。”

她说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例行事务：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然后向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做政策建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都要向毛主席汇报，周恩来负责“日常工作”。

她微笑着说：

“关于我的学习，主席让我学习马列主义，我要求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都很有帮助。我经常重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和讲话》，对主席的军事著作也很感兴趣。”

说着，江青有些“得意”地补充了一句：

“人人都知道我的工作总是和军事有关。”

让我好奇的是中国领导人对其倡导的“无产阶级觉悟”的广泛控制。它引导人们在精神上改变自己，在物质上改变了这个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带来这一变化的根本要素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乎所有的现代意识和多元文化在中国都被禁止，只有小范围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

江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令人惊讶的坦率。

外国艺术作品（没有社会主义特征）在中国能否上演，江青说取决于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

在文革之前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文革期间（江青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只有 2 个经她改造过的文艺团体出国访问。

外国文艺有两种表现形式：公开的和秘密的。

上面提到的交流是公开的。

“对人民有害的”作品只限于给领导人做“参考”，以便他们研究这些“反面教材”。

毛泽东也特别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

1972 年 9 月 6 日，毛主席在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时说：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

江青说：

“为些，我们从日本进口了一些法西斯电影供领导人观看。”

就算在日本，日本左派因票价昂贵而很少有人观看这类电影。

她说：

“要把其他外国作品当作艺术加以研究，其审美标准也可用作‘参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仍会受限制。外交部负责与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文化交流。对外友协负责与非建交国家的文化交流。但交流的作品必须是进步的，并要经国务院批准。”

她十分自信地说：

“许多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作品。因为你们美国占领了我们的台湾，与我们也没有外交关系，这样的交流必须通过对外友协。”

她断言某些作品一定会受到美国人的欢迎：

“美国人民会欣然接受《智取威虎山》和其他革命戏曲的。这些作品都有历史意义，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的！”

2

我注意到中国好象没有专门的儿童文化，特别是没有青少年文化。

我心里纳闷：

“儿童也要服从那些大人们为革命戏曲设定的标准吗？还是我们可以为儿童创造别的文化种类？”

我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江青的回答是正面的，没有任何遮掩：

“我们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

停顿了一下：

“但群众已经自发地做了许多的工作。”

显然，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江青说的没错，共产党历来就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延安时期的“保育院”，便是最好的佐证。

《延安保育院》剧场是陕西旅游集团所属的西安唐乐宫倾力打造的文化性建筑，它结合《延安保育院》剧作内容改造而成，集独特性与创新性于一身。

《延安保育院》剧场有效运用奥运会中最为先进的舞台理念和设备，声、光、电、水、雾、乐、舞、歌创造出无数身临其境的梦景。

国内首款能整体、分体垂直升降的全自动化舞台，战机呼啸和浪漫星空的三维成像穿越了多维战地时空，带您见证孩子们的天籁合唱，听取陕北民歌的高亢悠扬，感受安塞腰鼓的激情迸发，感受无邪的稚子之心，无私的教师之心，无畏的战士之心及军民共筑的人间大爱。

作为延安红色旅游新名片，《延安保育院》依托大量深度挖掘的第一手珍贵史料，以独特的视角，大胆启用现代舞台剧为主要表现形式，致力于打造旅游文化的精品剧目，提升延安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开创延安新的旅游项目。

其国内外首款能实现舞台整体、分体垂直升降舞台，以给观众身临其境的震撼感受展示新中国的大爱精神和纯真情怀，铸就新时代的“延安梦想”。

节目自开演以来受到省、市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旅游业界的广泛赞誉，先后迎来了长庆石油集团、中国学龄前儿童品格教育在行动”活动、“鲁艺”后人访问团、步长集团专家议会团、陕西省美协等大型团

队的包场演出，观演人员纷纷发出延安精神——中国复兴之魂的豪言气魄。

标志着战争时代新中国大爱精神及纯真情怀的《延安保育院》，至此也成为铸就新时代“延安梦想”的文化标志，更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奠基。

民族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与日寇浴血奋战。无数抗日志士奔赴前线，英勇捐躯；大量党的领导和骨干因为要领导边区建设、指挥军队作战而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与教育。

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祖国的蓓蕾、民族的未来，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培养民族未来的主人，于 1938 年 7 月，由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 13 人为名誉理事，杨芝芳兼任院长，负责接收培养边区干部（如毛主席的孩子李讷、李硕勋的孩子李鹏、刘伯承的孩子刘太行等）、军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遗孤。众多革命后代在保育院学习生活，继承了革命精神，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延安保育院”的历史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保育院的成立运转凝结了党和政府的关心，毛泽东曾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好好学习，好好玩耍”，关注红色后代们的健康成长。

延安保育院的历史也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基本理念、方针产生和成熟的历史。

这里有岁月留下的清晰记忆，这里有生命镌刻的不朽誓言，历史的画面被定格在 1937 年中国革命抗战初期那个特定的时空，红军当年遭遇的一场激烈战争又一次重现眼前。

战火中，英勇的生命像海浪一般奔流不止，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继续冲锋陷阵，一群人倒下了又一群人接踵而至英雄的母亲保护着襁褓中的婴儿壮烈地走完了自己的征程，希望的种子在爱的呵护与召唤中奔向了革命的圣地延安。

在群众性的基础上提高艺术标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设立的目标。

对文学和艺术，我们必须严肃、认真、负责。

对敌人不能采取粗糙的方式和粗鲁的批评，要在归纳分析后，刻画反面人物。

她预言，随着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发展，矛盾会凸显，而且这矛盾（外国或资产阶级文化带来的冲击）主要会表现在中国人身上。

她脑子里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人能否在尽快的时间内为全世界革命群众创作出高品质的艺术作品。

要做到这一点，作品的艺术性内涵都必须是高标准的。

江青强调说：

“我们到国外去演出，决不是为了向他人强行灌输我们自己的思想！”

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我从未满足于现有的作品。因为他们都还不够完美。我一直在努力发现其中的瑕疵。我们不可以自大，更不可以止步于追求完美的艺术和思想。”

我冒失地问她：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你认为中国最大的成绩和失败又是什么呢？”

江青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首先，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他们不再被人称之为‘东亚病夫’。他们不再屈服于帝国主义。当然，一些棘手的问题仍有待于解决。比如，美帝国主义仍然霸占着我们的宝岛台湾；北部边境地区有些地方同样仍被外国势力（前苏联）侵占；就连印度也敢欺负我们，并占领了我们西部的一些领土，而且还不时地向我们挑战，制造冲突。”

说到这儿，江青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起来：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下了既定的外交政策：必须坚持主权独立完整；外国干涉使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但那是一个我们（大陆）和台湾人民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尼克松总统最终也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同我们签署了共同声明（上海公报）。”

江青注视着我说：

“知道吗？美国对台湾的侵占就好比中国占领了美国的长岛。将心比心，你们美国人会有什么感受？”

我说：

“这也是我给我的学生打过的同样的比方……”

此话引起了一阵子的笑声。

江青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虽然我们现在只拥有独立和主权的‘一部分’，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拥有‘全部’！”

她接着说道：

“毛主席说过，‘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注意，主席所说的是‘解放’而不是‘统一’。‘解放’有武装解放或和平解放；‘统一’也有武力统一或和平统一。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是主席所担心的地方。”

是的，我知道就算主席所说的话一句能顶一万句，但到了下面也每每会走调或变味。

说到这，我不得不佩服中国人老祖宗的聪明，尤其是在造字上的聪明。

比如说“理想”和“梦想”。这二个字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没有区别。

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或是做一个有梦想的人，我们美国人是体会不出有什么差别的，或许中国人，也唯有中国人或许有一天会醒过味来的。

经济上，中国人依靠的是“自力更生”，但并不表示毛泽东拒绝国际贸易和其他国家的商业交往。

“中国先进吗？”

江青自问自答道：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恰恰这也是问题的焦点。讲到不足，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很不均衡。一些经济和科学领域仍然受到忽视而不被重视。”

从 1965 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跟着毛泽东勒紧裤腰带全部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但 196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报》才向全世界报道了一则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息。

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指标，我们都力求做到收支平衡，其实，收支不平衡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领导的国有体制统领全国上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力争做到既无内债，业务外债，明哲保身。

思想上，中国有一个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

一方面，这是一个对马列主义很有研究的政党；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很好地研究马列主义，致使许多的好同志经常受“政治骗子”的欺骗。

我们谈到妇女问题。

江青说：

“封建和包办婚姻在农村仍然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尽管如此，在政治上她们却取得了彻底的翻身。实际上，中国担任领导工作的妇女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

江青刻意在“实际上”，而非“名义上”加重了语气。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可以担任领导工作，甚至是国家元首，但那只是名义上的。

这一点，中国超越了西方国家。

江青接着说：

“在其他方面，中国妇女仍处于落后地位，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思想工作来改变。先进和落后并存反映了妇女工作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发表过违禁作品的作家、出版社进行政治上的批评(清算)，所引起的恐惧蔓延到了其他文化领域，包括电影。

对此，江青谈到了一个其他领导人不敢涉及的问题。

她引用陶铸的例子：

“或许是出于对批评的恐惧，他（陶铸）剪掉了影片中某些特定的人物。他总是这样‘先斩后奏’，他明明知道是要对此负责任的。”

江青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她下令调查他参与过的所有影片。

江青手中的“尚方宝剑”是，不仅是她，而且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都都不希望他或任何人随意篡改过去的历史。

她不满意工作人员（遍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他们表现不良（她认为是政治工作不力所致）的原因，恰恰在于领导人自身（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要为人民以身作则）。

江青承认出版界十分萧条（这点我颇有同感，我还发现，最近由党认可的中国简史在书店里很难找到。这类书籍，图书馆并不对所有老师和学生开放。）

江青解释说：

“对出版社的敷衍了事，我多次提出过批评意见。周总理也对出版社下达过具体的任务。可他们照样我行我素，也许他们是怕犯政治错误吧。”

“你有二十四史吗？”

江青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没有。”

我如实回答。

并解释说：

“美国学者一般都没有这种大部头书籍。”

江青反问道：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怎么会没有专业工具书呢？”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

江青说的话，我难以辩驳。

在美国用于学术研究的图书馆一般只为学者提供基本参考书，而不会提供工具书。

我的话虽让江青感到有些不解和困惑，但她却爽快地答应送我一套《二十四史》。并对我说：

“只有了解了完整的中国历史，当有人在你面前刻意歪曲历史的时候，你才有辨别能力分清是非。”

一套完整的历史书，能帮我打消心中的疑惑吗？

江青不能确定何时能帮我找到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

“如果我的助手不能及时地帮你找到，我会将自己收藏的一套转送给你。”

这话让我很感动。

她让我感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对我的真心实意。

几天后，江青领着我走进了她的书房。

江青指着堆满线装书的书桌说：

“主席同意用他的稿费为你购买一套《二十四史》。”

我听出了江青的话里有些无奈和半开玩笑的成份。

就算她贵为“第一夫人”，手头仍没有几个多余的钱。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的。别说美国人不信，就连中国人也不会相信的。

我俩一起走到了书桌前。

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堆书，是光绪十年（1884年）的版本，还有江青特意为我找到的《清史稿》。

这是一套完整的“官史”。

江青对我说，她准备将这些书直接寄到美国去。（我回美国后不久就收到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史书。）

江青说：

“这些历史书，虽然是封建的，但还是有必要仔细阅读。研究过去对每个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必要的。这些书虽然不是孤本，却

也弥足珍贵。在美国的图书馆你也许能找到，那是周总理赠送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套。远去的历史关系着现在。比如，后汉李固写给黄琼的信，主席曾在 1966 年引用过。”

江青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大堆子，我只记住了后面的几句话。

回美国后，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几本江青推荐给我的关于毛泽东的书。

读书得知，这位传人在生前的讲话和书信中，竟然多次提到汉代忠臣李固。

毛泽东酷爱读史，他在读到《后汉书》的《黄琼传》和《李固传》时，曾多次批注评点，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引用李固语言。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毛泽东真是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神圣？

1974 年 11 月 20 日，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再次提到李固。

毛泽东写道：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生前为什么念念不忘已故一千多年的李固？

无可置疑，是因为毛泽东深为李固公正直言的致仕精神所感染。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是《黄琼传》所记载的李固给黄琼的信。

他不仅欣赏李固的文章，而且也很看重李固的为人。

毛泽东赞誉李固为：“北斗喉舌”。

毛泽东多次引用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干部们要谦虚谨慎，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自己。

4

尽管江青一再坚持毛主席及其周围的人尊重历史，不会歪曲历史，但我仍旧“半信半疑”，顶多“将信将疑”。

江青对我说：

“在我们国家，不仅大学在进行学术研究，也在科学机构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比如说，长沙马王堆的考古工作靠的就是人民群众。无论什么人，也不管他的地位和教育背景有多高，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去看待问题，研究问题。”

江青刻意强调：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文化创作。包括历史、文学和戏曲！”

夜幕降临。

两个人抬进一口大箱子来。

江青一边解说，一边一一打开。

在箱子的上部和四周，有许多装有粉末的小荷包，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据说有药用价值。箱底的一堆碎纸中间躺着一只一瓷瓶，瓶盖微微发光。

江青拿起一包“香料”包，一边向我解释说：

“粉末中的生物碱不能单独被吸收，必须加水煮沸之后才能服用。”

一边仔细演示把一包粉末倒入 300 毫升水中，让水煮沸。并叫我立刻服用。

还好，服用后稍有一些尿感。

下一件物品不记得是叫什么东西了。是在竹筒中加热的海水溶液，并不停地从筒口中溅出。

“它对牙龈有好处。”

江青笑着说道。

最后一件像是晾干了的百合。

当然，江青首先向我解释了它的药用价值。可我对中药向来有所顾忌，更担心到了美国，万一美国海关官员比我对它更感兴趣，后面的事就不好说了。

“那就算了，不要带走。”

江青显得有些豁达，也有些无奈地说道。

说不定，她也担心这东西到了美国会成为坐实她“里通外国”的罪证。

江青失望地让人把它们抬走了。

我们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她的健康问题。

江青的白血球数量失衡，据说经过两年针灸治疗，血小板和白血球已经恢复正常。

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睡眠不好，有时需要服用安眠药。

她向我反复强调：

“饮食和锻炼，是最好的良药！”

8月31日早晨4点钟，她的一名助手低声对我说：

“江青同志已将想说的和能说的都说完了……”

尽管我早有预感，但还是觉得这一天有点儿来的太快了。

不知不觉之中来中国已有数月时间。

通过与江青的交流，通过与周围中国人的接触，通过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逐步了解，潜移默化之中我觉得自己好象已经爱上了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

我爱上了这块土地，爱上了这里的充满着茉莉和檀香味道的空气。

临别时，江青问我：

“这些天，我说的这些，你还满意吗？”

江青就在我身边，近在咫尺。可我有时仍觉得她“远在天边”。有时我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茫然的感觉，江青不但离我很远，而且也站得很高，高不可攀。

我老实回答：

“尽管我一直在作笔记，对你所说的话恐怕也难记万全。在我心中，你（您）不仅是一位独特的革命家，也是我的‘老夫子’（好老师）。我会将这些收获带回去，与我的学生和朋友共同分享的。”

我知道中国人对长辈和敬爱的人喜欢使用敬语“您”而不是直呼“你”。

不是不敬，而是觉得这样说起话来更亲近一些。

“你是一位教授，不，准确地说是一位副教授。但有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会受这些虚拟的东西困惑的。比如说，我有时就不觉得你是一位学者，而更像是我的妹妹，我的美国妹妹。如果有一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像你我之间这样成为好兄弟好姐妹，离‘世界大同’这一天也就不远了。”

尽管这么些天来与江青的接触让我觉得她从未在我面前唱过高调，但此刻从她口中说出的“世界大同”而不是“共产主义”这四个字，仍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世界大同”为国际政治术语，主要指人类对国际社会的一种理想理念

5

就在我要向她告辞时，江青又一次地向我重申：

“美国对台湾的‘霸占’是中美建交的唯一障碍！”

无疑，这话对我的震撼更大。

见我一脸惊愕的表情，江青复述道：

“就算中美能克服眼前的这道障碍建交了，但如果美国依旧对台湾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中美关系也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

此时此刻，我眼前的江青宛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让人肃然起敬。

真的，我觉得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某个人写个人传记。我真想对她说：

“我不想为你写传记了，但我会从你的角度来写一部革命史书。因为你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

但我嘴里说出来的却不是这番话。

说了些什么？

我全然记不得了。

只记得当我的辞别词说完之后，是很长一阵子的沉默，令人难受的沉默！

“你是写作的专家，”江青打破了沉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握手后，她转向离去了。

实话实说，在我中国之行的潜意识里（当局者迷），总认为这个有着几百万监视者和告密者的国度，只保护那些顺从其制度的人。

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中国以外的认识仅限于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怪胎，这当然要让他们产生恐慌。

其实，我错了。

大错，特错。

是江青同志让我对中国有了全新的了解。

是江青同志让我真正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感激的话，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在广东会见的后期，江青的助手和我都开始焦虑起来，不知道在穿越中国边境时，我的笔记、照片、文件和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他们不会在香港抓捕我，并对我所写的材料肆意歪曲？

为了安全起见，我是否应该这些东西都留下，等回来美国后再让他们给我寄过来？

这害怕失去这些个文件（哪怕只是暂时的），我知道，这些材料是我赖以完成心愿的关键，也可以说它们是我的命根子。

我决定“孤掷一注”，豁出去了。

通过助手，江青知道了我的担心，也知道了我的决心。

或许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江青对我说：

“埃德加·斯诺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后，说有一些笔记被中国人扣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些笔记（和你的类似）中的错误和含糊不清之处可能会被无知或恶意者利用。这只是有关部门的担心而已。”

我笑着向她保证：

“我可以保护自己，并且‘随遇而安’”。

我很得意在这段日子里学会的中国成语。

我不知道这些成语中国人是怎么造出来的，只是感觉这句成语中“无可奈何”的成分比中国人更强烈一些。

显然，我俩对“风险”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好在从一开始我俩的会面，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天，我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沈若云来了。

她提到了前一天我和江青同志之间所谈及的“安全问题”，并建议我采用“游击”战术。

她说：

“如何打发贪婪的香港记者，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实就虚’。他问他的，你答你的。能答的就答，不能答的就不回答。”

显然，对于我这位老牌的资本主义记者而言，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担心的不是如何面对香港的记者的“围剿”，更不害怕直面中国安全部门的“审查”。

我担心的只是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和资料能否同我本人一道平安抵达太平洋彼岸？

更担心我费尽心血完成的著作能否顺利地与中国读者谋面？

沈若云特别提醒（警告）我：

“‘江青同志’这个字眼，今后不能再出现在你与任何人的谈话中！”

对她的“警告”我没放在心上，老实说当时也没回过味来。

我此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江青同志写传记的，为什么不能跟人言及“江青同志”呢？

她的话倒真是提醒了我，并促使我想好了书名。

书名就用《江青同志》！

至于后来中国人为什么要将我的书翻译成《红都女皇》？我无法回答。最好，你们还是直接去问中国人好了。

几天下来，沈一直陪同在我身边。

陪同我在嘈杂的汽车里一边游览，一边领略着广东五彩缤纷的街景。

一路上我们谈及的都是一些轻松的话题。

与沈分手后，一位为广东友协工作的年轻的云南籍女人陪同我登上了广东开往香港的火车。

我们之间很少说话，在与她的接触中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是了解我此行的目的的。

我将江青送给我的一朵兰花（十分精致的标本）作为礼物转送给了她。

从她那感激的目光中，我猛然醒悟过来，火车车厢里为数不多的旅客的面孔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这些面孔已经跟随了我几个星期。

我相信，其中有公安局派来“监视”我的，也一定有江青同志派来“保护”我的。

在深圳边境，我被“移交”给了消瘦教练的赖先生。

赖入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情报员。他曾多次护送过埃德加·斯诺和其他外国友人出境。

按计划，我们各自通过罗湖桥。

中国海关没有任何“刁难”动作，让我顺利通过。

一辆等候已久的小轿车将我们带到了先前住过的那家宁静的旅馆。

房门外、电梯旁和餐厅的灯柱后面不时可见身着蓝色西装的“勤杂人员”。他们个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只是我很少与他们的目光交流。

混杂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残留余味的香港，既混乱又喧闹。

在我眼里，既熟悉又陌生。说不上喜欢还是讨厌。

第二天，我在香港被一路护送上环球航空的班机。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江青事先对我说过：

“放心，周总理亲自负责你的安全！”

我知道，这是江青同志给我的特别礼遇。

后来才得知，因为我的迟到，周总理不得不调换了另一架满员飞机上的一位乘客。

第十九章、谁人评说

1

在延安的日子里，江青只是一位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并不惹人注意的同志。

从她对毛泽东的“一见钟情”，到不惧牺牲、不辞辛苦，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她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登上“权力”的顶峰。

也许她没有意识到，从曲折的少女时代到嫁给最高领袖，不仅是她的婚姻，她的显赫地位也是同时代其他女性无法企及的。

当然，这也是她个人奋斗的结果。

在毛泽东身边的她，不仅是作为一个女人，同样也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员，用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影响着主席。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同样，毛泽东还是一个男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寄托的男人。

千军万马之中，江青是唯一的女性。

无穷无尽的会议，马不停蹄的转移，江青默默无闻地用她那双纤细的小手，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主席的日常生活。

人都说：“日久生情”，领袖自然也不例外。

在我们的交谈中，江青对未来的预见果真在后来的事件中得到了验证。

许多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老同志重新复出。

邓小平一度是刘少奇的有力支持者，在 1973 年作为总理（尽管短暂）被重新起用就是这一趋势最好的例证。

这些果真都被江青言中了。

诞生于文革烈火中的样板戏生存了下来，并逐渐被搬上了各省各地的文化舞台。

文化交流仍有风险，中国领导人仍在继续强调：“对‘舶来品’的文化污染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当疾病和死亡不停地侵蚀着共和国奠基人的队伍时，江青的视野越过文化领域，进入内政外交。

面对无情的人事变更和他们心中的革命理念，共和国的领导人每天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

有人选择了利用过去的功绩去博取今日的一己私利；也有人选择了跟随毛泽东“继续革命”。

无疑，他们个人，他们创建的党以及被他们改变了命运的人民，必将随着他们的选择经受历史的最后审判。

从外国人的角度看，江青是一个神秘的女人。

她若隐若现于公众面前，她的个人意志（同其他领导人的夫人一样，除了得到毛的认可，）很难能起到左右他人的作用，更别说是中国的政坛上呼风唤雨了。

尽管她的自我表白同她的行为方式是一致的，但仍遭受许多人的误解。

毛离开北京不久，江青很快高升，象是这个政权的第二人物。

她写了一首很大胆的诗，配上自己拍摄的一幅照片，交给了《中国摄影》杂志的一位编辑。

诗是写一座山的，照片上是一座直插云霄的山，这一巍峨、美丽、端庄而又被低估了的山峰，不是别人，正是江青自己！

这首诗不会获得任何文学奖；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是指她的姓,这首诗摹仿了唐诗,同时也使人想起她在延安时取名“江青”以取代“蓝苹”的事情。

一首唐诗中说:

“江上数峰青”。

如批评家们后来说的,江青写这首“朦胧诗”时,不管她心中是否想到了毛泽东,它表明江青认为自己还没有赢得应有的喝彩。(江青竟使维特克相信,这是毛写的赞美她的诗!)

江青告诉《中国摄影》的编辑,诗和照片刊登时要用“琅琊台”的笔名,这是她的家乡诸城一座古老的名山的名字。

她要暗示人们一经过一番穿过神秘乌云的摸索之后——谁是作者,但她又不想标上自己的真名,公开宣布她的自负和雄心。

江青想在中国伟大的文学和政治传统中找到自己,武则天对盛唐文学确实做过重要的贡献。

她想要提醒那些资深的鉴定家们——当她与毛在延安开始共同生活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知道她的名字取自唐诗——她与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的这种长期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很快就要消亡,而且会被取代。

把诗和照片交给《中国摄影》后,江青又突然把它撤回来。

后来,她改了主意,把它们又送了回去。

她这样来来回回反复了五次,象一只猫决定不了把刚捕到的鱼藏在何处。

最后,她还是没有把它们刊登出来。

也许,毛泽东从长沙回来后,批评了这个使江青如此激动的计划。

更有可能,江青自己神经过敏地改了主意。

虽然她极为自信,但作为女人,她在男人的政治世界里是孤独的。

争当女皇不仅会把自己,而且会把中国共产党(和别国的共产党)的历史带到一个新的领域。

不管是哪一种原因,诗和照片没有发表,说明江青处于一种政治的或心理的、或两者兼有的危险地带。

这是一些人的说法。

毛泽东凭借其政治韬略和家长式神秘可以不出席例行宴会、游行和机场迎送仪式。

江青却有责任出现在众多国家事务中。

偶尔缺席,通常会被外电报导为“失势”、“倒台”。其实,大多是因健康不佳所制成的。

无论作何解释,多年来她一直隐居幕后或官样文章中。

可以相信,她是掌握思想文化领域权力的人。

中国的民族文化从未比文革初更流行或更受人青睐。

同时,包括体育、舞台和银幕在内的行为艺术开始受到国家指导。

这种对思想、形象和大众行为的划一性也是史无前例的。

大众娱乐对每一个伟大文明——玛雅、古希腊、古罗马和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1974年,北京京剧会演10周年。

江青出席了首场演出并致辞。

江青的讲话对革命样板戏充满了溢美之辞，现在已成顶尖的文化成就。

江青在致辞中说：

“革命样板戏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树立了革命的群众观点。它是保障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有力思想武器。”

从 10 周年庆典到江青倒台，她对样板戏的个人支持力度从未衰减。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和党刊上日渐增多的匿名批评（作者当然是代表着不同领导人的思想），在一个夸张的文化诠释中，样板戏仍旧被描绘成“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画廊”。

后文革时期能被接受的样板戏并不多，《半篮花生》是其中一例。

它被拍成彩色影片并受到热烈欢迎。

剧中描写一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拣田间遗漏的花生。

尽管做了许多的修改，党的发言人承认它还有待完善。然而，贫下中农的议论告诉我们：“哲学已经从讲坛上走下来，成为了大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半篮花生》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它揭示了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中见大”。

夏收季节，生产队花生丰收，小学生晓华放学回家时，为队里拣回半篮“地脚”花生，关照妈妈“一颗也不能少”。

妈妈知道晓华爱吃盐水煮花生，意欲把花生煮熟了给她吃。

哥哥东升回来责怪妹妹自私，晓华受了委屈，气得哭闹起来。

晓华娘则认为捡来的花生应该归自己。

为此，母子俩人争论起来，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晓华爹对半篮花生的来历进行了调查研究。

查明摘帽地主王友财利用“地脚”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晓华不了解王友财的用意，也随同他捡了“地脚”花生。

晓华爹发现篮里花生颗粒饱满，就和全家人带着疑问学习哲学，使大家弄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一心为公”的道理。

同时查明，是有人想偷队里花生，收掘时故意把好花生当地脚花生埋在泥里。

误会解除，认识提高，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半篮花生交归集体。

于是，晓华爹根据这种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全家分析了半篮花生所反映的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斗争，教育全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1970年10月—11月，浙江省革委会在杭召开地方剧种改革交流会。

会中，杭州标准件厂李立军、朱富毅编写的独幕话剧《山村开遍哲学花》参加观摩演出。

12月，方元改编成婺剧《半篮花生》；次年2月，何贤芬改编成同名越剧，分别在金华、杭州上演。

4月，浙江省文化局据以上两个戏曲本组织讨论修改提纲，由方元再作修改后金华婺剧团首演。

6月，省宣传部、文化局成立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由曾昭弘主要执笔，再改编成越剧，7月由浙江越剧团在杭州演出。

9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通过电视荧屏观后说：

“这个戏有戏，一家人都很可爱，说明农民不但可以学哲学，而且可以学好哲学。”

11月，中央电视台拍摄成黑白电视片播放。

1972年1月23日，《浙江日报》刊登《半篮花生》越剧本，署名为“浙江省《半篮花生》创作组”。

同年11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彩色戏曲片。

1973年上半年由何贤芬几经修改，拍成送审后，江青提出要加强矛盾的特殊性，突出斗争哲学，下令“要重拍”。

再经曾昭弘执笔修改，于1974年3—5月完成拍摄。

最后越剧本于197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全国多家出版社再版。

像其他领域一样，为保证毛泽东思想在艺术领域的绝对权威，江青在审查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

她的动机（在我的整个采访期间的谈话中她从不隐讳），表明她的权力仅仅只是对毛泽东权力的一种补充。

由于这种“补充”有时过于突出，所以为她日后的政治生涯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隐患。

1974年7月，在第十届北京京剧会演上，江青获得了“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的光荣称号。

这一称号以前只有周恩来和林彪获得过。

初澜声称：

“经过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日渐没落，舞台充满了现代主义、野兽派、阿飞舞、脱衣舞和其他腐朽的垃圾。作品无数，却只有一个特点，毒害和麻痹人民！”

作为样板戏的推动者，神秘的初澜无疑是他们中显赫的一位。

伴随着以新无产阶级文化取代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文化的阵痛，他们让中国处于历史的前卫地位。

与反对古代哲学的运动相呼应，初澜批判了古戏曲中宣扬的“狂热的”孔孟伦理，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对中国在文化领域的优秀成绩，初澜宣布：

“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产阶级 10 年来的努力换来了 17 部样板戏。

江青在文革时期构思与创作了 8 部样板戏。

新增的 9 部是：《红灯记》、《黄河大合唱》、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改编自革命芭蕾舞剧）、《平原作战》（改编自电影）、《杜鹃山》、现代革命舞剧《沂蒙颂》、《草原英雄小姊妹》和现代交响乐《智取威虎山》。

创作的过程是缓慢的。

其中至少有五部样板戏是从以前的作品演绎而来的。

展望 1974 年，初澜决心：

“在下一个 10 年或 20 年里，我们要快马加鞭，加倍努力为无产阶级事业谱写新篇章。”

1975 年秋，在中央负责文革的江青授意重组文化部，并由文化部赞助公演了一批新的电影和剧目。

它的直截了当地颂扬当时的政治活动——包括赤脚医生、鱼雷艇和远洋轮船的生产。

愈来愈多的演员和英雄口号主导了国庆节庆祝活动。

地方剧团表演了民谣、故事、相声、话剧和其他在文革期间被禁的节目。

第二年 3 月，5 个被停刊半年的文艺杂志宣布复刊。

这些艺术形式都很常见，并都无一例外地歌颂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

这一时期对革命历史剧最有影响的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排演的 10 幕话剧《万水千山》

《万水千山》不仅是文革以来第一部受到高度肯定的话剧，也是第一部受欢迎的纪念长征历史的演出。

剧情是政治性的，描写了“毛的革命路线战胜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涛的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

在舞台上表现了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渲染毛的思想和激发了观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在访谈中，江青解释文化交流如何维系上层建筑领域的对外关系。

她知道，文化交流比物资贸易更具风险。

对中国人来说，把他们道德纯洁、艺术庞杂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让外人去评判，并同时输入“资产阶级”文化，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尽管他们同样存在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求。

在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中国人和老鉴赏家们的脑子里，对中国每年生产数百部影剧以及出版数量惊人的图书应该都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初，人们还拥有欣赏古代或外国戏曲、音乐和电影的自由。这些宽松的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突然禁止。

到70年代早期，最轻微的放松也会成为一个渴望更国际化氛围的机会。

当时有两个对外交流的项目最让江青着迷。

一个是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有关中国的记录影片；另一个是费城交响乐团访问北京。

官方对这两件事的记述显示了中国的热情好客和寻求文化纯洁性之间的长期矛盾。

另一些人则被初澜称之为“盲目崇拜外国文化，放松了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警惕”。

文革中并不是任何“舶来品”都会受到抵制，但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去分析西方的传统音乐。

要坚决抵制那些“骨子里崇洋媚外”的人。

对外国文化要有批判性地吸收，原则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江青对音乐的热情似乎有所减退。

初澜对外国文化的竭力否定是得到她授意的吗？

也许是政敌以此来对她进行攻击？

3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关于江青的历史定位问题。

说她仅仅是一个新秩序创建者的配偶，还是应该作为一个领导者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继续革命？

或者说她应该是这两种角色兼而有之？

或许我们可以从她 70 年代的日常活动和哲学辩论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文革前，江青只是担任她的第一种角色。

文革期间，江青进入到政治局并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称呼。

但她的影响力应该还只是限于领导人之间和她的追随者中，她很少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偶尔她也会接待外国来宾，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英国首相希思、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奥斯和非洲的达官显宦。

江青一般不参加实质性的会议，更不会对国家发展重点、对外事务或贸易关系发表讲话。

这些问题仍然由毛泽东、周恩来、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掌管。

作为领袖的妻子（第一夫人），江青招待了一些来中国访问的第一夫人。

其中有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伊梅尔达 1929 年 7 月 2 日生于马尼拉，1953 年参加菲律宾全国选美比赛，同年，经过 11 天热恋与时任自由党议员的费迪南德·马科斯闪电结婚。

伊梅尔达·马科斯曾是国家选美冠军，她的美貌可以说是得到了国际公认的。

她一直关心国外的人权事务，对权力充满了激情。

江青在 1974 年 9 月会见她。

马科斯夫人回忆说：

“一开始我有点儿害怕，害怕她会是那种激进的理论家。后来发现她讲话和气，非常温柔，身上有着一种东方女性的特质，并且非常开明。”

她还披露了“水门事件”后，江青力挺尼克松时所说的话：“尼克松是勇敢的，相信他会挺过去的。”

尽管尼克松最终没能挺过去。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或者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事件之一，其对美国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在 1972 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 年 6 月 17 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 5 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

由于此事，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 8 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

江青失事后，马科斯夫人仍旧高度赞扬她：

“功大于过。”

江青以一种“高贵”的无产者方式陪同马科斯夫人看戏、参观工厂和到天津郊外一个叫“小靳庄”的村庄。

响应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江青让村子里的 600 个农民组成了一个生产合作社，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无产阶级文化乌托邦。

她向客人展示了自己住过的房间和床。

这是她在此地创作无产阶级诗歌、小说、歌曲和舞蹈，对农民进行辅导时用的。

她这样做的目标是，让男女社员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平等。

如果普通民众的革命激情可以像样板戏中的人物一样保持和发扬，他们无疑会创造新的国家历史。

会有几百万英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试图证明革命的继承问题与国家上下都密切相关。

江青承认：

如何掌握和控制海外华人行为的办法，使他们远离外国价值观的腐蚀，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对儒家来说都是个问题。

在思想改造阶段，对外派出高级代表团是有风险的。

当然，外交人员不会像国内的人一样，在纽约和巴黎贴大使和外交部长的的大字报。

为了转移话题，江青引用了一句古谚语：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我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谚语其实是一句双关语。

将在外，如果打了胜仗，自然可以不受君命。但要是打了败仗，那就是“抗命不遵”了。

江青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国外的外交人员不应脱离党的统一领导，特别是现在可以通过电报、电话、飞机进行快速联系。我们的一些大使、参赞或贸易官员只谈论生意，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他们对工作的热忱令西方外交官和垄断资本家自愧不如。一些驻中非和东非的大使馆已有半年未曾进行政治学习，也没有对当前的政治运动提交报告。”

最后，江青抬出了最高指示：

“毛主席告诉他们：‘要多请示，多汇报，不要怕麻烦。如果必要就经常回北京。’”。

可见，对于毛泽东的指示，那些身在外的外交官员经常是有所不受的。

经历了 8 年的创作奇峰时期，1974 年终于上演了几部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其中电影《决裂》（描写对文学思想的贯彻）在国内外受到了大力推介。

《决裂》是一部关于一所农业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的影片，极好的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年轻人是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他认为年轻人要接受平等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不应该采取严格的入学规定，因为这样会把农民和工人排除在外。

在《决裂》中，龙校长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他受命接管一所大学，而这所大学的原主管人不准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入学，龙校长询问年轻人，同意一名热情的青年入学，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工人。

其他的农民则推荐一名革命前曾受一名地主的欺凌，而现在已是一个稻田专家的女子入学。

当龙校长问她是否识字时，她写下了“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这样的字样。

充满胜利的喜悦的音乐于是雄壮的响起，她随即也就被批准入学了。

地方戏曲也开始出现江青倡导的主题。

半个世纪的革命进程让中国的文化创作百花争艳，各吐芬芳。

江青在位时，个人创作是不受鼓励的。

大多作品都是以“集体创作”署名的。

中国也许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用历史和艺术寓意来间接表达政治生活的国家。

人们难道没想到攻击江青一个“专横跋扈”、同时又“充满野心”的最高领袖配偶，不就是对毛泽东（共和国缔造者）的间接批评吗？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几个星期里，他的“继承者”就编造了他与江青关系破裂的谣言，这不就是对新政权投鼠忌器的证明吗？

毛泽东在 1966 年写给江青的信中说：

“我担心反共份子会利用我的话夺取政权。但他们不会得逞，因为左翼力量会掀起全国性的起义！”

毛泽东果然一语中的，华国锋果然没有得逞。

当他上台不久风风光光地去朝鲜过了一把“敬爱的华主席”的瘾之后，回来便被邓小平架空了起来。

结局，便是在自家的后院里种种葡萄，了此残生。

10 年后的 1976 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给江青。似乎是他最后的遗嘱。

江青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生前就已广泛地传阅了这首诗。

毛泽东对江青说：

“你是被冤枉的。今天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顶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毛泽东同样一语中的，道出了江青凄惨的结局。